

目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林有能 (兼)

编务主任

黄荣显

•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杨春贵 (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高齐云 (11)

改革发展新阶段与建设广东现代文明

..... 广东省精神文明研究中心课题组 (14)

•经济•

我国农地产权结构改革必须坚持渐进改革方式

..... 綦好东 (24)

中国国债市场发展的功能与制度分析 高波 (28)

论欧洲货币体系向欧洲货币联盟转变面临的

问题和前景 李翀 (32)

从东亚的崛起看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方式及其条件

..... 周军 (37)

求真务实 别具一格

——评《现代经济理论实用读本》 杨永华 (41)

•历史•

广东历史上的农业开发 (笔谈) (44)

日本侵华期间的地图测绘 朱竞梅 (54)

1997年第10期

录

浅谈宋代妇女的就业 吴旭霞 (59)

•澳门研究•

论 1999 年前后澳门文化特征之保留及发展

..... (澳门) 魏美昌 (62)

早期美国传教士在澳门的活动 (1830- 1844 年)

..... 林 芸 (68)

•文学•语言•

西方古典美学“理想”范畴的研究 王强东 (73)

“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

——试论王绩的佛学思想及其文学实践 张海沙 (79)

改革尝试与学派的追求

——评劳承万教授主编的《文艺学美学丛书》

..... 申家仁 (84)

说“最”

——最、最之分合及其与聚、撮之关系 姚炳祺 (88)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 83815300—283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 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 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 7326

CN44- 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总第 155 期

Persisting on and Developing Marxism in New Practice	Yang Chungui (5)
Prosperousn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Primary Socialist Stage	Gao Qiyun (11)
Guangdong's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n a New Stage of Open and Development by a group of Guangdong Center of Spirit Civilization Research	(14)
Gradual Steps Should be Kept in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al Land Proverty in China	Qi Haodong (24)
An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 and System of Chinese National Debt Market Development	Gao Bo (28)
On the Problems and Future in front of the Change from the European Money System to the European Money Union	Li Chong (32)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ive Methods and Conditions with Which a Government Controls Economy: Referring to the East Asia's Arising	Zhou Jun (37)
A Comment on a New Work 'A Practical Reader of Current Economic Theory'	Yang Yonghua (41)
A Group Essays on Agricultural Exploitation in Guangdong's History	(44)
Japanese Mapping China during Their Invasion	Zhu Jingmei (54)
A Trail Talk about the Employment of Women in the Song Dynasty	Wu Xuxia (59)
How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acao around 1999 (Macao)	Wei Meichang (62)
Activities of the Earl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Macao (1830- 1844)	Lin Yun (68)
A Study of the Category 'Ideal' in Classical Western Aesthetics	Wang Qiangdong (73)
On Wang Ji's (585- 644) Thought of Buddhism and Literary Practice	Zhang Haisha (79)
A Try of Reform and an Endeavour in Forming an Academic School ——a review on 'a Serie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Works' chief-edited by Prof. Lao Chengwan	Shen Jiaren (84)
A Textual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 'Zui' (最)	Rao Bingqi (88)

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 杨春贵

《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于1937年的7月和8月，是毛泽东同志对我党成立16年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是对长期危害党的事业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哲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一条道路所作的哲学论证。可以说，没有“两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成功结合，就不可能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我们党才集合了队伍，并且领导群众，开始了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但是，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为我们提供的是指导原则，而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只有在一般原理、原则的指导下，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形成适合各国具体情况的具体理论，它才能变成现实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列宁说过的一段话：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它在每一个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点，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

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结合得不好，运用得不好。20年代末30年代初，教条主义在党内盛行，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时间长达4年之久，所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所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恶劣。教条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拒绝研究中国的实际，一味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联的经验。这样，就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和失败。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后，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上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在《哲学批注集》中有一段话：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所以要真正纠正一切大的政治错误，也就必须从哲学高度找出它的根源，从哲学高度总结出必要的经验。大家知道，毛泽东1935年写的那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总结政治路线方面的经验，批判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政治策略的，同时批判“左”的政治错误的哲学根源，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圣经》上载了的都是对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进行政治批判的同时，结合着进行哲学批判。一年之后，1936年12月，毛泽东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军事斗争的经验，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在这种军事批判的同时，毛泽东也进行了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就是一个哲学题目：“如何研究战争”。毛泽东强调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论，指出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②强调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途径。在1937年的7月和8月，毛泽东又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是对中国革命16年的历史经验所作的系统化的哲学总结。《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是讲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认识的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标准，我们应当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矛

盾论》的基本思想是讲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认为这是矛盾问题的精髓，强调在矛盾普遍性的指导下，注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进而找到解决矛盾的特殊的方法，强调了列宁的一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两篇著作的基本思想给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根据，或者说为这种结合作了哲学论证，对王明教条主义否认这种结合所作的哲学批判。因此，也可以说这两篇著作给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两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强调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38年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动员、组织大家学哲学。1941年，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党内成立了高级研究组、中央研究组。毛泽东讲，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要学理论，学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在他的倡导下，当时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一书，随后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彻底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我们全党真正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就为召开“七大”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在“七大”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结晶——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不会胜利；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也不会胜利。当然，历史在不断发展，这种结合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到了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又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的任务。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把一个

不发达的国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的又一次革命。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任务要求我们实现新的结合，创造出新的理论。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做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提出了实现新结合、创造新理论的任务，领导我们继续探索，取得了不少的胜利，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和写出了一些很好的著作，像《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但是总的说来，没有完成创造新理论的任务，没有真正找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一直到“文革”之前，尽管有一些正确的思想，但我们还不能说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真正找到这条道路，形成新的理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新的形势下，总结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总结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总结国际的经验，才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的科学体系。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这个理论的历史地位时说，在我们党领导的两次革命过程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两次飞跃，形成了两个理论，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所以，如果说在第一次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话；那末，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结合的结晶，邓小平理论是第二次结合的结晶。这两次结合的哲学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特别是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思想。

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新阶段”这个提法是江泽民总书记在1997年5月29日讲话中第一次讲的。十四大报告对于邓小平理论的规定讲了三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次又加了一句话，这句话加得非常分量，把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讲得更加明确，对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是“新阶段”阐述得更深刻。为什么是一个“新阶段”？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是用“四新”来回答的：第一个叫做“新境界”，第二个叫做“新水平”，第三个叫做“新论断”，第四个叫做“新体系”。这“四新”是我们讲“新阶段”的主要根据。

第一，关于“新境界”。江泽民总书记讲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我认为，这一新境界的开拓，主要是实现了五个方面的破除和五个方面的坚持：即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坚持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和政策，坚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破除离开生产力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坚持把发展生产力、把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著作、某些原理教条化的倾向，坚持根据新的形势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五个方面的破除和坚持，是邓小平领导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思想解放的

基本内容，这是从逻辑上进行的概括。就历史的过程来说，从1978年邓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自始至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使我们的理论和事业能够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思想保证。

第二，关于“新水平”。江泽民总书记讲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所谓“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表明我们原来的认识水平比较低，问题比较多，不那么清醒。针对过去的“不清醒”，邓小平同志作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论断。他讲了许多“不是”，明确否定传统的错误观念，然后提出新的科学论断。比如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最后，邓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一个结论，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这个论断的新意之处，在于它纠正了以往人们只讲生产关系方面不讲生产力方面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片面认识；突破了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不讲解放生产力这样一种传统观念；舍弃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不科学概念。所以，它是有所纠正，有所舍弃，有所突破的。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论断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给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方

向。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贡献就是搞清楚了中国国情，指出我们现在建设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能实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里的基本纲领。

第三，关于“新论断”。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前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变化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理论的新论断很多，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新论断是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认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可能的，世界和平的维持是有希望的，从而纠正了以往的一个不正确的判断，即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加快自己的发展，搞好经济建设。我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就是建立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之上的。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理论是其理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其实际根据，时代的特点和主题是国际条件方面的根据。第二个重要的新论断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针对过去认为学习外国就是崇洋媚外的封闭保守思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现在国际方面有这个条件使我们更好地利用外资和外国的技术，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作出了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第三个重要的新论断就是针对于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正在经历深刻的革命，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强调发展经济要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觉得，邓小平关于国际方面的新论断很多，但时代的主题、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主题、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三个论断尤其重要。邓小平的理论由于其宽阔视野和对国际问题的深刻洞察力，不仅使它能够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适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第四，关于“新体系”。邓小平理论作

为“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哲学基础，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首要问题，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个科学体系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是一个历史性贡献。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个50年，即从1848年开始到1898年恩格斯去世，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为无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在第二个50年，即从恩格斯去世到本世纪50年代中期，列宁和毛泽东分别在不同的国度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的东西变成现实形态的东西，但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的问題，列宁没有来得及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毛泽东也没有解决好。从50年代中期至今将近50年，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发展。邓小平总结国际国内的经验，创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解决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实践证明，邓小平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一个是两个20年的历史比较。从历史上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年，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将近20年，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再一个就是国际的比较。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改换旗帜的国家政局动乱，经济滑坡，人民生活困难。社会主义中国则经受了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因此，江泽民总书记讲，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三、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全面推进我们的事业，首先是一个高举旗帜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历来旗帜鲜明。江泽民同志到中央工作不久，在1989年建国40周年的国庆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经过10年检验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伟大旗帜。”1992年党的十四大系统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主要内容，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指出要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推进我们的各项事业，就要牢牢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最近几年，我们已开始强调社会的全面进步。而社会的全面进步，归根到底取决于主要矛盾的解决，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要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突破性的进展，政治体制改革要深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总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不能因为强调全面进步而忽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第二，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邓小平文选》中有20多处讲机遇问题。目前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既面临着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同时也有一个很好的历史发展机遇。从世界范围看，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我们有条件集中力量搞建设；从经济方面来看，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产业

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这就使我们有条件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各方面的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从国内情况来看，我们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社会稳定可望长久保持，特别是积累了近 20 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我们完全有条件发展得快一点。现在关键是不要去搞那些抽象的无谓的争论，不要瞎折腾，而是扎扎实实地、聚精会神地把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工作抓好。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现在都面临着新的考验。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在世纪之交，在十五大之后，谁能够抓住机遇，谁没有抓住机遇，将来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现在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若在困难和问题面前无所作为，怨天尤人，就会丧失机遇。

第三，开拓进取，而不要因循守旧。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特别是现在，要大力推进和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更需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在总结经验中把握规律，努力探索解决新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江泽民同志在谈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说：“改革的经验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中来。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验。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等是等不来的。回避问题，退缩不前，只能无所作为。”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的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大胆利用一些反映社会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同时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

第四，高举伟大旗帜，推进伟大事业，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首先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其次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把党建设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再次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必须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①《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1093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73 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作者杨春贵，中央党校教授（100091）
责任编辑：冯 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高齐云

邓小平理论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和理论主题而展开的，首先必须阐明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现实基石和理论基石。因此，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所作的报告中重申和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入学习、领会报告的有关内容，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保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和历史任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理论，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已经提出，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作了初步系统的阐述。但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含义，却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1987年4月，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这个论述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指“左”的思想指导下搞的“贫穷的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扭曲，事实上不够格；二是指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

义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不发达，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来要求，事实上不够格。这后一层意思，蕴涵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含义。党的十三大报告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一阐述，也未能明确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含义。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界定，既简要、明确，又内涵丰富。它不仅概括地表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属性和基本特征，并且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起点，即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不发达以及显示了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即比较发达的或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五大报告正是以这个界定为基点，展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和具体目标的论述。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和建设目标，党的十五大报告继续和开展了党的十三大报告的观点。首先，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目标，是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阐述初级阶段的演变过程和具体目标，党的十三大报告从五个层面进行论述，而党的十五大报告则从九个层面展开阐述。这不只是单

纯的数量增加，更重要的是质上的跃进。在党的十三大报告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由此可见，这些新的内容，是党的十三大以来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和具体目标的观点的新贡献、新发展。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的有关的论述，我们对此才能得到全面、系统的理解和掌握。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是我国现阶段的最大实际

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切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可以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去认识、把握。这里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要认识、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的实际。为此，就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的现象深入到本质。例如，虽然经过近 20 年的大力建设，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效率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显得更为突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还不健全，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严重，等等。这些情况无疑是当前不能忽视的实际，但它们还只属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现象形态。我们必须从现象到本质，找出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进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的实际。为什么当前存在、出现上述现象，在于我国还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生产力、经济、文化的不发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是根本原因。因此，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的实际。抓住这个最大的实际，再从本质进一步去认识各种现象，了解本质与现象之间、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可以完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的总体。

把握住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最大的实际，我们就能真正理解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理论、路线、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理论、路线、政策，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是因为邓小平紧紧把握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我国怎样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是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而制定的。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转变以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以党的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且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改革的社会，并且我国过去的社会主义被“左”的指导思想所扭曲，所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以改革为动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如果加以割裂、对立，就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否定，就必然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同样，党在现阶段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等，都是以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为根据而又致力于改变不发达状态的战略性举措。

同样，把握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最大的实际，我们就能区分有益的探索和右的或“左”的干扰。一切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又有利于改变不发达状态的努力，都是有益的探索，应该鼓励和支持。而一切动摇、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四项基本原则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企图，如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大搞腐败或对党内腐败斗争不力等，都是右的干扰。一切扭曲社会主义的原则、制度和怀疑、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企图，如宣扬以反和平演变或两条战线斗争为中心、攻击实行改革开放是搞“资本主义”和“私有化”等，都是“左”的干扰。对此，都应坚决抵制、纠正。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江泽民同志强调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这些论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思。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是由它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复杂性和存在的长期性规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阶级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在结构上极其复杂。首先，它自身内部包含双向的和多层次的矛盾。因为我国的社会生产和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都存在不同的层次，由此形成双向的矛盾。其次，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制约着各个领域的矛盾。因此，它的解决只能是逐步的，这就决定了它存在的长期性。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心急图快、急于求成是不行的，这方面已经有了太多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要求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大胆开拓、勇于创新，以彻底解放和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实践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全面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实实在在地而不是虚幻地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为比较发达的或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

作者高齐云，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510275)

责任编辑：冯 生

改革发展新阶段 与建设广东现代文明

□ 广东省精神文明研究中心课题组

从 20 世纪迈向 21 世纪，是人类历史千载难逢的跨世纪转折。农业文明已成为最后的一抹余辉，工业文明也已滑过如日中天渐成午后斜阳，而现代文明正如一轮朝阳冉冉上升。党的十五大把一个战略性的宏伟纲领展现在我们面前：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这为广东的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一、建设现代文明是历史赋予广东人民的光荣任务

广东改革开放 19 年的实践，基本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1992 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对广东提出了殷切的嘱托。他说：“广东 20 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建设现代文明，也是党中央和历史赋予广东人民在改革发展新阶段中的光荣任务。

（一）建设现代文明是广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广东在第一轮创业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两个突出的矛盾：

一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相对恶化的矛盾。80 年代，广东经济的增长，走的是一条依靠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的粗放型经济发展的路子。据统计，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 1 倍，用电量增加 0.8 倍，原煤消耗增加 0.7 倍，钢材消耗增加 0.7 倍，水泥消耗增加 1.2 倍。我省是资源和

能源都比较贫乏的省分，能源自给率只有 30%，每年约有 70% 的煤从外省调入，燃料油除 1/3 进口外，其余全靠国家安排省外油源。目前广东的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为 2820 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 30%。粗放型发展不仅浪费大量资源，同时也严重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我省近岸海洋环境、江河湖泊、大气都已严重污染，全省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1995 年我省工业废水重复利用率和处理排放达标率分别为 27% 和 57%。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 10%。我省的大气污染严重，全省酸雨频率为 46.5%，成为全国酸雨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环保、生态文明意识非常淡薄，全省年产 700 万吨的生活垃圾，绝大部分未经彻底处理而运到城镇附近堆放或简单填埋，一部分直接倒入江河。环保投入更显不足，我省目前的环境投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0.67%，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可以说，粗放型经济发展路子已经走到了尽头，保护环境，建立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现代绿色生态文明已是实现广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二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相对低下的矛盾。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经济文化科技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人的智力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赖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从目前我省情况看，劳动者的素质仍未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教育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还未形成对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文化力”的支撑。据统计，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为 60 - 80%，而目前广东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 39%。广东的科技人员缺少，每万人口

中的科技人员数居全国第 16 位。劳动者素质的低下,不仅影响到广东的发展潜力,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广东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影响着广东经济的发展。我省经济从 1995 年开始出现下滑趋势,经济发展明显缺乏持续力。粗放型发展引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果继续走下去,不仅广东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可能丧失,而且广东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差距会越来越大,广东 2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建设现代文明是促进广东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十分迫切的任务。

(二) 建设现代文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也是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的。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文明,也反作用于物质文明,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现代文明为其提供文化精神力量。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任何一种新型的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任何一个地区经济的崛起,都需要有一种文化精神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种“亚洲资本主义精神”,如团体精神、成就取向的工作伦理等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迫切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引导人们冲破封闭保守、等级特权、平均主义、安贫守旧等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的约束,培育民主、平等、自主、开放、科学、效率的时代精神,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现代文明为其建立道德规范和依托。

由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所决定,市场经济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和一定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机制发育不成熟、法制不健全、社会道德规范约束力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会诱发一些消极的现象。如:市场经济以功利为追求目标、容易诱发“私欲”“物欲”的恶性膨胀;市场经济的交

换活动以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容易产生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如果被引进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就会导致权钱交易、道德沦丧等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现代文明为其规范正确的道德行为,引导其健康发展,消除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现代文明为其提供心理保障。

市场经济健康运行要求运行主体必须具备健全的心理和人格,否则就会侵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基”。当前,在社会上存在着一些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变异心理,如“不捞白不捞”、追求“宰”的收益、投机取巧、互相攀比等。

这些不健康的心理严重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健康的心理保障,是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任务。

(三) 建设现代文明是人民群众渴望提高生活质量的强烈愿望。

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这些需要有梯度递增的趋向。改革开放后,广东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开始由温饱型向享受型转变。1995 年全省有 22 个县(市、区)通过了小康验收。据全国对 1994 年的经济、社会的各项指标评估显示,经济、社会综合得分最高的前十位城市中,广东有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四个城市,是全国各省中比重最大的省分。这种物质生活上的富足必然带来人们对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人们不但要求物质财富的富足,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的富有和良好的生活空间。求知、求乐、求美、求安成为新时尚。为全国人民提供良好生活环境,“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科技领先、社会安定、风尚良好、环境优美、城乡一体”的文明城区、文明村镇逐步出现。到目前为止,全省各级共评出文明村镇 4.6 万个,安全文明小区 1700 个,高标准文明村镇试点 625 个。现代文明之花在广东大地已结出丰硕之果。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人民群众追求现代文明生活的愿望相背离、与当今社会不相协调的现象仍在一些地方存在,主要表现在:

一是物质上的富裕与精神上的贫困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在一些富裕的地方,物质生活富足了,

却出现了理想的迷失、精神的颓废。一些富裕农村的青年中出现了不打工、不种田、不经商、不读书，成为守在祖业上，坐享其成、游手好闲的“二世祖”。一些富裕的农村，封建迷信盛行。一些地方，在盲目超前消费、铺张浪费的同时却忽视了文化消费。

二是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沉渣泛起，在不少富裕的城市和乡村，再婚纳妾、包“二奶”、婚外情、婚前性行为、吸毒等丑恶现象大量存在，不但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影响了社会稳定。

三是一些地方农民手中有了钱，新房越建越多，越建越豪华，但缺乏整体规划意识，缺乏配套设施；不少城市总体规划落后，特别是管理水平低，城市容貌较差，街上乱摆乱卖，卫生设施简陋，垃圾污水处理能力低，环境污染突出；在不少城市和农村，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人们生活缺乏安全感，等等。这些和社会文明进步不相协调的现象与人民群众追求美好新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说，建设现代文明不仅是社会实践的呼唤，而且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二、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

广东现代化发展所要建设的现代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以实现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为核心，以改变和优化人的生活环境为根本任务，以富裕、安全、民主、公平、进步为主要内涵，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文明。其基本特征是：

(一) 现代文明是比工业文明更高形态的文明。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人类文明的发展迄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逐步走向现代文明。

人类最初的文明，是以自然经济生活方式为基础的、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马克思)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能动性的提高，农业文明必然被高扬

“人是自然主人”的工业文明所取代。

工业文明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增强人对自然的“控制”、“征服”能力，而使经济飞速发展，财富迅速增加。工业化运动使整个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成一体，有力地促进了人类交往和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但以工业和经济的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的工业文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弊端：由于没有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而引发了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精神危机、社会腐败和政治动荡；由于没有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而造成了资源衰竭、大气污染、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由于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人则变成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人格扭曲和人自身的异化，造成人的畸形片面的发展，这一切，都表明工业文明已走到了尽头，必须要被更新更高的文明形态所代替。

马克思以主客体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现代文明演进的必然性。他指出：只有当人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时，才使人类从物役性的必然王国跨入自身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同时进行着两个转变：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工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因此，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而不是一概否定，是超越而不是简单的模仿。要加速工业化的进程，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又要发挥“后发优势”，避开西方“原发型”工业化国家出现的种种弊端，减少发展的代价，这就必须走人、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

(二)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

现代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最根本的标志是从以物为中心转到以人为中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以及全面发展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尺。从人对自然的依附、对商品、金钱的依附，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反映了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客观历程。当今社会的发展，已不主要取决于对资源的占有和资本的投入，而是取决于人的素质和能力，

人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最根本的资源。只有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国家和地区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来说，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则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的最高旗帜。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应该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满足人的基本的合理的需要。人的基本合理的需要是多层次的。人“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人并不仅仅只有这种物质形态的需要，而且还有精神形态的需要。

二是人的素质的不断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也是多方面的，包括人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现代人格。这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三是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人的能力包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思维的创造性和实践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这是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之根本区别。人只有充分发挥其创造能力，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社会和自身的主人，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三) 现代文明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

这里的“社会”主要是指人的生活的环境。人是环境的人，环境是人的环境，人塑造和改造环境，环境也塑造和改造人。如果说，全面发展的文明人为现代文明社会创造了主体条件，那么，建设现代文明社会则为培育文明人创造了客观环境。正是在文明主体和文明环境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得以确立和发展。

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相适应，现代文明要求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全面进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建设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与规律要求的市场文明。

社会主义市场文明总的要求是，既体现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自主原则、自由原则、开放原则，又体现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导向以及公平原则、正义原则、协作原则，并把二者结合起来，贯彻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体制建设、机制建设和主体建设中去。具体来说就是：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作为经济行为的目标；以

“正当求利、利义并举”作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作为处理社会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的准则；以“诚实守信、遵守契约”作为维系市场主体之间的纽带；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调节经济利益分配的准则。同时国家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特别是要建立一套健全的法律体系，以制约市场行为，消除市场自身的弱点和负面效应。

2、建设反映人伦和谐的道德文明。

道德进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和主要特征。道德文明的总的要求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以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和扶正祛邪、抑恶扬善的社会风气。

3、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与法制精神的政治文明。

反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政治文明应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使公民民主权利实现的程度和参政议政的水平不断提高。

第二，民主道德化，即民主原则内化成人们的信念、羞耻心和责任感，是否讲民主，被认为是是否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并用它来对人的行为或品质进行道德评价。

第三，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法律在社会中具有绝对的权威，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凌驾其上，以减少领导人或政策的变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第四，法律社会化，不仅国家生活，而且社会生活和公民的各个基本方面都以法为规，依法运行，形成一个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律己的法制环境；同时让法律知识、法制观念在干部和群众中普及，建立现代的法律文化，以加强全民的法律意识。

第五，建立公正廉洁的执法和司法体制，健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

4、建设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生态文明。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生态文明是人类面临的唯一选择，它的主要标志应是：

第一，生产技术大转变——一切有害于生态

环境的生产技术必须被无害于生态环境的生产技术所取代，逐步实现农业生态化、工业生态化、城市——乡村的生态化。

第二，经济行为大转变——由单纯追求经济目标，为增长而增长转向追求经济——生态双重目标的可持续发展，坚持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第三，价值观念大转变——以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视角，去重新认识人类的幸福，重新明确人类的责任和义务：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不是一个统治者，而是相互依存、互利共生的伙伴；人类要善待自然，任何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破坏，都是对他人及社会的不道德；当代人和代际间公平分配自然资源，切不可只顾自己而“借用子孙的地球”。归结起来就是：以生态工业为支柱，以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为目标，形成经济繁荣和环境优美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人的整体生活质量。

(四) 现代文明是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文明。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总趋势。中国文明为世界文明不断增添新的光辉，世界文明也总给中国文明的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因而，文明的发展既是有深刻的历史继承性，又具有广泛的交融共享性，每一种文明的形成都是各种文明综合创新的结果。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在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形成滚滚潮流的世纪之交，我们要以历史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以更深远的眼光，更恢弘的气度扩大对外开放，博采世界文明之精华，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

从广东现代文明建设的任务来看，一是要注意对东亚文明更加开放，学习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四小龙”)在现代化进程中重视道德教化，秩序整合，人际和谐的有益经验；二是要注意对西方文明更加开放，学习西方国家重科技、重民主、重法制、重环保的现代意识和精神。当然，对外来的东西，特别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三、建设现代文明的主要任务和对策

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时代进步潮流相适应，立足于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现代文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关键是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得力的措施。

根据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综合素质，我们认为，广东建设现代文明的基本思路应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以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为重点，以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为目标，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规律，发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新型的人伦关系，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

(一)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成为我们的中心任务，精神文明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精神文明主动地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这一条经验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的立足点转移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来。

坚持以人为本、弘扬人的主体精神，要以全体人民的幸福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贫穷不幸福，精神空虚很难幸福。人不但要有富庶的物质生活，而且要求有充实的精神生活、良好的人际关系、优美的生活环境和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等等。因此，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满足人们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等诸方面的需要。

坚持以人为本、弘扬人的主体精神，要引导人们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坚持和把握好人的这把尺度。在经济关系中，坚持尊重人、关心人、依靠人的原则，反对把经济原则无限提升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尺度，反对把人的关系简单归结为商品货币交换关系，提倡尊重人格、权利、公平竞争、

共同发展。尤其是在社会的评价标准上，注意并把握好人的尺度。

(二)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形成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是建设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历史大趋势。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有利于抵御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对人的侵袭。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主义国家，封建主义残余仍然根深蒂固，反封建的任务远未完成。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在身分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等等。因此，迫切需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并消除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对人的“物化”和“异化”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民主、平等、独立、公平、正义、法治、理性、科学精神的驱动和依托，与此同时，也需要社会主义人文精神的“矫正”和“辅助”，用以抑制和消除市场经济可能对人带来的负面效应。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有利于消除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当代人的生活带来的机械主义的枯燥、单调，以及高科技所形成的“科技主权”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奴役和压迫。使人寻找人的自身，寻找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以此扬弃“物支配人、物围困人”的生活结构模式的冷漠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文精神标志着对高科技的后工业社会的批判和法治的觉悟。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有利于超越工业文明的历史局限性。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工业文明追求物质增长，把人放到从属的地位，人被当作工具使用，弘扬人文精神，是重新确立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弘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当前应大力弘扬三种精神：

第一，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就是要求人们热爱科学、尊重科学、学习科学、运用科学，告别迷信、告别愚昧，学会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迷信传统、不迷信权威，勇

于创新，敢于试验，开拓进取。

第二，弘扬民主、自主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自由平等观念，人们对民主权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要求参政、议政、参与决策，要求有监督的权力，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中注重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义务意识，树立起自主精神，拓宽其参政议政的渠道。

第三，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邓小平同志说：“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人，关心人，特别是注意保护儿童，尊重妇女，尊敬老人，尊敬军属和荣誉军人，关心帮助鳏寡孤独和残疾人。”^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尊重人的价值和权利，把人当作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二是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建立团结、互助、互爱、和谐的人际关系。三是注重人的现实幸福和全面发展。四是推崇人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弘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要致力于培育共同价值观。

共同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支撑点，是动员和号召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

从大的方面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是我们的共同价值观。但还必须把这一点共同价值观具体化：

——国家至上、社会为先。这就是在处理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时，把国家的利益摆在首位，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

——以人为本、诚信为纲。这就是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立足点，尽可能地满足人的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以人的标准去选择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以诚实守信去处理好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

——能力本位、功绩为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倡导“能力本位”，以个人的才智作为评价个人价值的主要标准。为此，必须为个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创造前提条件和机会，形成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以能力和实绩评价一个人的功过是非。

——正当求利、义利相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倡导“正当求利、见利思义、以义获利”，甚至在特定的条件下舍利取义、舍身取义。反对见利忘义、非法获利和不择手段去谋取个人利益。

——效率优先、公平竞争。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讲求效益，而我们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又讲公平，这就要把两者统一起来。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效率优先，把提高效益放在首位，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兼顾公平，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均等条件、机会，运用社会的调控机制扶持、照顾社会的“弱者”，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三) 大力倡导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

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包括物质技术现代化、社会制度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中人的现代化起着决定性、基础性的作用，而人的现代化关键是观念、意识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的观念现代化大大地向前走了一大步。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真理观和实践标准思想，冲破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又一次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90年代初，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理论，又一次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目前，我们的改革触及到了更深的层次，也触及到了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没有理论的突破，就没有改革的突破。不冲破陈旧的理论“禁区”，就不可能迈开新的步伐。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进人的观念的现代化，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这是我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理论武器。我们必须坚持小平同志强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标准，坚持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群众标准，充分运用好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去选择我们的改革取向、衡量我们的

改革成败。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要大力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和意识，促进权位观念向能力观念转变；个人依附观念向个人独立自主观念转变；自满守旧观念向开拓创新观念转变；等级特权观念向民主平等观念转变；平均观念向竞争观念转变；人情观念向规范观念转变；封闭观念向开放观念转变等等。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进人的观念现代化，还要大力提倡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观念和意识，大力倡导社会文明进步潮流相适应的观念和意识，如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科学理性、兼容开放等等。

从目前广东的现实情况来看，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破除“经验主义”，树立开拓创新意识。

破除“经验主义”，就是要求人们思想和观念从改革开放19年形成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改革开放19年来，广东有许多新的创造，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些经验仍然有借鉴的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条件的变化，有的已经过时，如：“一包就灵”已不灵；“无为而治”已转变为要求“有为而治”；“筑巢引凤”被动地开放已不能适应“主动出击”的新的对外开放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对过去形成的思维定势来一次清理，凡是仍有现实意义的，要在实践中坚持并加以完善；凡是已经过时的则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决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

2、破除“本本主义”，树立实践第一的观念。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坚持马克思主义，并非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所从事的改革是在走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路，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改革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集体实践，会有许多新的创举。但是，有些人还是习惯于从本本中找标准、找答案，用本本去评价活生生的现实，如把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指责为“离经叛道”等，为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本本主义，提倡实践第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坚持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的发展。

3、破除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树立辩证科学的思维方式。

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评价标准就是非此即彼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突出表现之一。在这些人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与私都是绝然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其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形态，在活生生、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仅仅用姓“社”姓“资”的标准去评判是非已无法包揽一切，有的姓“社”，有的姓“资”，有的“社资”共存，也有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这就要求我们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防止片面化、绝对化。

4、破除夜郎自大意识，树立忧患意识。

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社会经济文化在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于是，有些人沾沾自喜，滋生了夜郎自大的意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事实上，进入90年代以后，广东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逐步弱化，广东地价、电价、交通费用、生活指数上扬较快，广东原有低成本的优势已丧失殆尽。广东一些工业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在弱化。假如不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人力资源的开发，势必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处于落伍的地位。

5、破除片面追求物的增长观，树立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位一体的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多元复杂的大系统，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活活动相结合的有机体。在这一大系统中，社会生产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变迁，而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又同时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相互作用的社会构成机制，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必须全面、协调地发展。因此，我们要贯彻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精神，推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

(四) 建立新型的人伦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谋求建立一种以独立人格为核心的、摆脱功利色彩的新型的人伦关系。这是建设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

建立新型的人伦关系，首先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主体之间经济交往关系，也就是要大力加强经济伦理建设。经济伦理是指

社会和个人在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它协调社会经济生活和个人经济行为，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经济伦理是建立公平、守信、有序的经济秩序的保证。经济伦理必须反映市场经济求利原则、等价交换原则、自主性原则以及竞争原则，反映社会主义道德原则。

建立新型的人伦关系，要大力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形成民主、清廉、高效的政治关系。政治伦理是指规范政治活动主体的道德规范。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制衡，使政治行为主体的道德内约得到强化，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职业道德处于社会主义道德主导地位的作用，把教育、规范、典型示范和深化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改革结合起来，树立政府公职人员敬业爱岗、清正廉明的良好形象。

建立新型的人伦关系，要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形成团结、友爱、互助、和谐的社会关系。社会公德是社会一般的基础性的道德，是为了维护正常的公共生活而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建立团结、互助、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城市社会公德建设要重点解决人际关系的冷漠、公共卫生、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问题；在农村则要重点解决封建迷信、赌博、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

建立新型的人伦关系，要加强家庭美德建设，形成重人伦、重亲情，民主平等，温馨和谐的家庭关系。我们要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主张婚姻自主和代际间的平等，反对封建的人伦依附关系；要大胆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重人伦、重亲情的美德，抵御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对家庭亲情的侵袭。

(五) 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推进制度文明建设。

在现代化的内涵中，制度的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制度文明是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制度文明是精神文明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对制度文明的建设有过精辟的见解，他指出要两个文明一起抓，“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③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④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精神；“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使人出工不出力；高度的集权，使人独断专横，不受制约的权力膨胀了人的欲望，产生了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了绝对的腐败；投机的股市，滋长了侥幸的心理；如此等等。制度确实大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心理。

因此，从广东的实际和经验出发，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广东的制度文明建设要从四个层面去进行：第一是建立遵循自主经营、公平竞争、平等交换原则的市场经济制度；第二是建立奉行公平、民主、清廉、高效为原则的政治制度；第三是建立遵循正义、道德、自由、平等原则的伦理制度；第四是建立体现公平、权威的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群众监督机制，依法治省。

（六）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

高科技产业、知识产业和文化产业，是未来社会的主导产业，文化力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资源和基础动力。如果不注重市场经济中文化力的增长，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就不会有持久的后劲。广东能否在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支撑力和后续力。

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转变观念，改变那种把文化当作政治、经济的附属物，当作消闲娱乐、当作公益事业的狭隘观念，树立文化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代意识。文化产业是从根本上提高人的智力和技能，其效益是长期的，带有根本性的。只有转变观念，我们才能把文化产业摆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对待，增加投入，加快发展。

发展文化产业，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把市场机制引进文化生产领域，使之从纯消费型的福利事业，转变为出产宝贵人才、可赢利性产业，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

发展文化产业，要走社会化大生产的道路，

应用现代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把分散的、“小而全”的文化企业群体和生产要素，按照效率、效益等优化原则组织起来，走集团化、股份制的经营道路，创文化“名牌”和明星企业。

发展文化产业，要在适应需求的基础上加以引导，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文化品位。目前，我省的通俗文化、娱乐文化比较发达，而智能型、信息型文化还相对落后。为适应世界蓬勃兴起的信息产业，要及早规划，增加投入，加快发展，将教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型文化与满足社会大众需求的娱乐型文化结合起来，以适应多层次、多方面的社会需求。

发展文化产业，要坚持推向市场和政府的宏观指导、重点扶持、加强管理的方针。精神产品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精神生产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政府对文化精品要给予鼓励，对有害人民身心健康的则给予取缔，对非法的文化生产活动如盗版，要坚决给予打击，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七）创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

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必须认识到人类在任何历史时代的存在都是以人同自然环境的相对协调的关系为基础的。广东建设生态文明总的要求应是：以生态工业为支柱，以生物多样性和持续发展为基础，以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为目标，形成经济繁荣和环境优美的良性循环，不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态需求，提高人们的整体生活质量，促进现代化建设在清新、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态环境中持续健康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要建立资源型集约的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建立以节地、节水和节能的生产体系，节省运力为特征的生活服务体系，要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城市的规划中，坚持科学、配置、优美、适度，余留足够的绿化和休闲活动场地，防止追求“大都市”，以免造成城市的过度膨胀和人口过多造成的拥挤。要大力地发展生态农业，开展全民植树造林活动，运用和推广生态工程。要对城市的废水、废气和噪音进行综合治理，还市民以碧水蓝天。要坚持强化管理、预防为主和谁污染、谁治理的方针，落实责任制，防止先生产、后治理的现象。要强化全体公民的环保意识，共同保护我们生存的空间。

(八)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现代文明中的主体作用和知识分子的骨干作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全体人民群众共同的事业。广东的实践证明，只要思想和方法正确，相信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和自律性，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就一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充满生机和活力。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文明的主体精神，必须选择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和群众愿望的创建内容和形式。如从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发展到“为人民服务，树行业新风”；开展创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活动；从开展创造文明村、镇发展到创建一批“经济繁荣”、“政治清明”、“风尚良好”、“科教领先”、“文化发达”、“规划科学”、“建设美观”、“环境优美”、“管理先进”的高标准文明村、镇和文明城市。只有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创建活动才具有吸引力、生命力。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现代文明的主体地位，要以物质利益为动力，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自己的利益有关。毛泽东同志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要擦亮文明单位的牌子，把文明单位作为一种最高的荣誉并给予重奖。评选文明职工、文明家庭要与干部的晋升、住房的分配、奖金的发放挂起钩来，以经济利益和荣誉为杠杆，调动人民创建

精神文明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现代文明的积极性，要建立一个评价、考核的指标体系，使之具有可操作性。这个量化的指标体系，包括：投入性指标，即领导精力、人、财、物的投入状况；产出性指标，即人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文化生活、基础设施、精神产品、精神生产者的数量、生活质量、社会安全等；否定性指标，即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黄、赌、毒”屡禁不止等等。要通过这些量化的指标，对文明单位加以验收、考核，真正使文明单位叫得响。

知识分子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骨干作用，要高度重视和肯定知识分子和文化劳动者的劳动，要在社会上造成“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风气，要动员和组织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精神文明的积极性。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378 页。

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

③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297-308、333 页。

广东省精神文明研究中心课题组

负责人：蓝 红

成 员：田 丰 顾作义 周 薇

杜新山 章扬定 李振连

责任编辑：冯 生

我国农地产权结构改革 必须坚持渐进改革方式

□ 綦好东

一、渐进式改革在我国农地产权结构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功

始于 70 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甚至被中外经济学家喻为“中国奇迹”。而这一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改革方式。

我国的一些经济学研究文献往往把农业视为国民经济易改革的部位，农业改革视为城乡改革的“第一步”改革或体制外围（外围指国有经济之外的非国有经济）改革等等。这样概括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农村经济自身的改革方式却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实际上，不仅我国整体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农村经济改革也是渐进式的。也就是说，农村这个易改“部位”的改革并没有一次完成，城乡经济改革的这“第一步”也没能一蹴而就，“外围”改革自身并未一步到位而是渐进的。

农村经济改革首先是以土地产权结构为核心展开的，而土地产权结构的改革采取的就是一种典型的渐进方式。这种方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内在性。我国农地产权结构改革，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内生过程，即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主要是农业微观组织及其成员自发要求的结果，而不是出自于政府强制性制度供给。从本质上看，这种内生需求正是原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信号。从“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对人民公社产权制度发起的冲击，到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从“联产到户（组）”到“包干到户”的飞跃，以及后来出现的“两田制”、“集体农场”、“农业车间”、“土地股份合作制”等产权结构类型，多是内生需求的结果。这其中虽然不能排除基层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但政府特别是高层政府，往往只是对已有的制度创新形式加以认可，使其合法化并进行推广，一般所遵循的都是先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的产权制度形成路线。从制度的演进机理看，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诱致性变迁。

2、“帕累托改进”性质。经济改革必然要进行较大程度的利益结构调整。这种利益调整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财富（或资产）存量的调整，二是财富增量（或收入）的调整。就农业领域而言，利益结构调整，实质上就是土地产权结构的调整。而土地产权结构改革是一种十分近似“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改革。“帕累托改进”是指在其他人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使一部分人受益的改革。尽管在存有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中，纯粹的“帕累托改进”并不存在，但农地使用权的均分以及均分基础上使用权的自由有偿转让都充分体现了这种“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使这种“帕累托改进”下的资源配置效率难以迅速达到最优状态，但由于其摩擦成本低、风险小，所以它更符合我国的资源结构、农民的知识、观念状况及对新制度的接受水平。

3、先试验后推广。由于信息不充分等原因，制度创新的结果常常带有很大的不

确定性。因而，先试验后推广成为减少改革风险和改革结果不确定性的有效途径。在这里，我们可把政府的试验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政府并未正式安排，甚至有悖于政府提供的现行正式规则的自发性制度创新。例如，“包产到户”、“大包干”等责任制形式，最初就是农民在暗地里自发创造的。这种自发性创造虽然不是由政府自觉安排的，但客观上起到了政府“试验田”的作用，其信息无意中成了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二是政府自觉进行的试验。即政府有目的、有组织地安排的制度创新。例如，“包产到户”、“大包干”等责任制形式首先在边远落后地区的率先推行，既是扩大了试验区，又是一种局部推广。而国家和地方政府建立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则是政府自觉安排的堂而皇之的试验。先试验后推广的改革思路尽管从表面上看是保守的，但在我国土地的就业和生活保障功能仍居首要地位的情况下，却是适当的、有益的，这样有利于确保农业、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4、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同步。“增量改革”常常被看作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内涵。然而，在中国农地产权结构改革中并没有将这两种改革分开进行，而基本上是同步的。农地使用权的均分、处置权的分割均体现了存量改革的性质，而收益权的分割则是一种增量改革。目前出现的“反租倒包”、“农地股份合作”、“集体农场”、“农业车间”等不同的产权结构都涉及到“存量”与“增量”两个方面。在农地产权结构改革中能够做到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同步，在很大程度上与农地资产的可分性有重要关系。正是农地产权尤其是使用权的可分性能够使其对象化到农户身上，农地使用权变化的同时，衍生出了收益权、处置权的结构变化。而农民的收益权实质是一种剩余索取权（上交国家的税金及集体提留、承包费后的部分），因各个农民在文化技术水平、资金条件和经营能力等方面存有差异，这种剩余索取权所导致的收入（增量）分配结果并不相

同。也正是这种收入分配结构的差异成为激励农民生产经营的动力。

二、农地产权结构重构仍需坚持“渐进式改革”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地产权结构，并非一日之功，坚持“渐进式改革”仍是我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必由之路。

首先，坚持“渐进式改革”是由信息的不完备特性和信息质量问题所决定的。从现有农地产权改革的激进方案看，它们往往暗含着“信息是完全的”这一假设。这些信息常常包括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典作家）的理论阐述、中国农地产权变迁的历史经验等等。农地国有化和私有化改革方案都有激进之嫌。这两个方案所依赖的信息都具有不完备性，而且存在着信息质量问题，它们多忽视了中国的现实国情，尤其是传统集体经济的制度遗产。实际上，对传统社会主义农地产权结构的改革，在世界上至今尚无成功的范例，而别个国家的国情，尤其是人地关系、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又与我国有很大差别。信息的不完全及存在的质量（即可用性）问题必然导致改革结构极强的不确定性。

其次，中国的国情客观上要求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走渐进之路。人口多、土地少、经济不发达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基本国情，现阶段在农村具体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多，非农产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力量不足，土地在多数农村仍是农民的基本收入来源。这些条件决定了在土地产权的配置方面，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进行，应将农民的基本生存权予以优先安排。土地资本的集中不应以剥夺广大农民的生存权为条件，不能走两极分化的道路。因此，机会均等原则绝对化是不可取的。

第三，政治上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环境保证，而渐进改革又是保持这种稳定和安定的需要。我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国家的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能否稳定。由于传统农业集体经济“共有产权”性质的制度遗产及农民“天赋资源，人人有份”的传统观念，使农地的产权结构安排，不宜作激进式改革，尤其是所有权性质的改变更应特别谨慎。农地产权结构的渐进式变迁，因坚持了“帕累托改进”性质，自然就会减少政治上的反对力量，从而有利于保持政策的基本稳定和连续性。

三、“渐进式改革”的缺陷及坚持这一方式的政策含义

(一)“渐进式改革”存在的缺陷

“渐进式改革”虽然在我国农地产权结构改革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今后的农地产权结构仍需坚持这一改革方式，但这并不是说这一改革方式完美无缺。“渐进式改革”也有其自身的缺陷，认识这些缺陷才能在今后的改革中努力使这些缺陷减少到最小的程度。这些缺陷主要是：

第一，各项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同步，易造成制度结构失衡，特别是新旧制度安排之间发生摩擦和冲突，从而导致效率损失。例如，“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一新的制度安排就与农地集体所有的“共有产权”性质发生矛盾，同时也与户籍制度、城乡就业制度发生矛盾；农用生产资料的市场化供给与主要农产品的变相强制收购发生矛盾。

第二，制度供给相对制度需求常常表现出明显的时滞。“渐进式改革”的“诱致性”及“先试验后推广”的变迁路线，必然存在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较长的时间间隔。而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潜在利润内部化的时间自然会迟后，效率损失便难以避免。例如，农户与“集体”之间的产权关系是承包还是承租，承包权转让行为

如何规范等就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制度供给时滞的另一个后果是容易引起的产权纠纷。

第三，“渐进式改革”会不断产生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而这些新的既得利益者常常成为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阻碍力量。如按人均承包土地后，一些已离农从事工商业经营的农户，常常宁肯让土地撂荒或进行粗放经营也不退还集体或转让他人，造成了严重的土地浪费。

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许多学者提出了一揽子的快刀斩乱麻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希望能尽快解决中国的农地产权问题。但中国的国情不容许采取“激进式改革”，因为激进改革很难最大限度地达成“一致意见”，而且有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并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或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中国未来的农地产权结构变迁并不在于改变“渐进”之路，而在于在政策制订和制度安排中尽量使这些缺陷降到最小的程度。

(二)坚持“渐进式改革”的政策含义

在我国农地产权结构重构过程中，坚持“渐进式改革”在政策上主要应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着眼于产权的长期有效性，有步骤地建立起我国农地产权结构的基本框架。土地产权的有效性主要是指能够通过产权的界定和维护来激发人们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并推动积累。在我国，关于农地产权结构基本框架的方案设计，从私有制到公有制都提了出来。笔者认为，单纯地改变所有权的性质未必能够提高产权结构的有效性，如果能在不改变或少改变所有权性质的情况下实现产权的有效性，就大可不必只在所有权性质上做文章。因为产权结构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各项权能能否有机搭配和组合，是否具有自我优化和演进的机制。从世界土地产权结构的现实情况看，所有权性质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其产权效率却表现出差异，而且差异还很大。尽管许多国家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土地产权改革，但一般并不改变所有权的性质，尤

其是避免“推倒重来”，而是尽力使原有产权主体的利益不被剥夺，以便改革顺利进行。我国的国情更要求我们在改变所有权性质上慎重行事，除非这种改变有把握取得显著的效果。

第二，继续坚持“帕累托改进”。实践已经证明，在我国农地产权结构改革中，“帕累托改进”是成功的。信息的不完备性及我国的国情都决定了农地产权结构的未来变迁仍应坚持“帕累托改进”，以减少摩擦成本和改革的风险。当然“帕累托改进”并不是不进，也不能将这一方式当作僵化的教条，应相机抉择，不失时机地推进农地产权结构的优化和演进，但应努力使改革中受损的人数降低到最低限度。事实上，产权改革很难做到纯粹的“帕累托改进”，如果农地产权结构的调整不得已而损害了数量较多的人的利益，应通过建立相应的补偿制度，以弥补利益受损者的损失。而要做到这点，必须着眼于做大“蛋糕”。

第三，坚持制度试验、适时制度供给。“渐进式改革”决不意味着“多变”，恰恰相反，这种变迁方式正是为了减少产权制度的反复或朝令夕改。因此，农地产权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安排必须审慎，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农业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更不能冒然行事，必须坚持先试验后推广的思路。就自发性试验而言，国家的正式制度安排应主要是关于基本框架的，以留出较大的制度创新空间给农民或其他微观主体，允许他们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卓有成效的制度创新。对农民的创新既要允许成功，也要允许失败，关键是要及时总结，经较长时间证实是成功的制度形式，或多家实行结果重叠成功的制度形式，应尽快使其合法化，即作为正式的制度安排进行“强制性”推广。

自发性制度创新的试验尽管是重要的，

也是有效的，但不能停留在这种形式上，政府应自觉地进行产权制度试验，以便于跟踪试验结果，缩短试验期，并及时将试验结果转化为现实效率。自觉性试验的关键是选好试验点，试验点的选择着重应考虑代表性程度，要按照人地关系状况、资源的禀赋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分类选点，以尽量反映各种类型地区的不同制度需求。不但国家在不同的类型地区要选择试验点，地方政府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试验。政府的自觉性试验，伴随进行必要的投入是可以的，但主要的不应是资金的投入，而应该是知识、信息、政策等软投入。只有这样，才能使试验点与非试验点具有大致相同的条件，也才能使试验所取得的成果具有可推广性。政府的自觉性试验，也应该允许有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失败也是成果。一种制度形式被实践证明行不通，就可缩小选择空间，进而减少他人的“试验”费用和效率损失。在自觉性试验中也应更多地进行诱致性变迁，减少强制性，以避免试验结果扭曲，减少摩擦成本。自觉性试验应特别注意试验结果的真实客观性，力戒报喜不报忧、粉饰试验信息的不良情况发生。在一些人的思维中有一个错误的定式，即凡是政府做的事就一定要成功，且必定成功。所以，当事情的结果与预期的不符时，就采取超常增加投入或提供超常政策优惠等措施改变事情的结果，如果这种方法仍不能奏效，就可能采用报喜不报忧的办法粉饰信息。在制度创新中应切忌这种做法。因为粉饰试验结果的信息，就会误导改革的方向，很可能将改革引向失败。因此，继续搞好国家和地方政府进行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并提供真实客观的信息，是降低改革风险的必要条件。

作者綦好东，山东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副教授 (271018)

责任编辑：谭湛明

中国国债市场发展的功能与制度分析

□ 高 波

一、国债市场的创新及其效应

近年来,我国国债市场根据市场经济准则,按照国际惯例,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大规模试验和创新,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促进了国债市场的迅速成长和发育。考察中国国债市场的创新活动,可以认为最具实质性的进展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即国债承销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国债市场化价格机制的形成和完善以及围绕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所推行的一系列创新。总体而言,我国国债市场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推进国债市场结构的完善、促使国债市场功能的拓展以及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效果。

首先,我国国债承销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具备了国债市场发展的基本制度条件。这项制度经过两个步骤而建立起来:第一步是在1991年,我国改变了传统的行政摊派的国债发行方式,推行了承购包销制度。第二步是1993年开始建立了一级自营商制度,当时有13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一级自营商在国债市场上直接承销和投标国债,享有一定的特权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从实践来看,国债承销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国债市场发展的基础。(1)一级自营商制度可以作为政府对国债市场主要经营机构进行监管的一种重要手段,并作为一种调节工具促使一级自营商在国内其他金融市场上产生相应影响。(2)一级自营商作为国债一级市场的主体,通过招标、拍卖机制等承销国债,促进了国债的发行和销售。(3)一级自营商通过发挥在国债二级市场的造市功能,创造出连续性的市场,并促进了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其次,国债发行技术的创新和国债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使国债市场价格机制功能不断增强。我国国债发行技术的市场化创新最初是在1995年8月,财政部从100亿元的记帐式国债发行额度中,划出了30亿元进行以“债款到帐”为标的的国债发行拍卖试点。1996年,在承购包销的基础上,对可上市的八期国债均采取了以价格或划款期为标的的投标式拍卖,并且在“单一价格封闭式竞价”的基础上,11月1日的最后一期可上市国债又推行了“多元价格封闭式竞价”拍卖技术。使用单一价格拍卖技术,所有的每一单位国债都是按相同价格出售,该价格通常是由数量最低的成功竞价者报出的。在多元价格方式下,每一位竞价者按其报出的价格成交。国债一级市场国债定价技术的创新和完善,推进了国债价格确定机制的规范化和有效运行。与此同时,国债二级市场化日益活跃、日趋规范和成熟,二级市场上的国债利率特别是回购市场利率已经实现了市场化。

国债利率已在现行利率体系中率先实现市场化,并在我国金融体系整个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发挥龙头作用。目前,我国国债利率比同期的银行存款利率高,多数学者认为银行存款利率是其他金融资产价格的参考利率,这是由于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额在整个社会金融资产中占绝大份额,在国家作最后担保的条件下实际上拥有很高信誉,存款利率似乎具有基准利率的某种参考价值。但我认为,国债利率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真实原因是银行存款利率是非市场化的,这种行政方式所确定的低利率是不符合存款者的意愿的,而国债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国债市场利率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比较符合国债投资者的意愿。如果银

行存款利率符合市场化的要求并按商业银行的规则运作，则其存款利率将因风险增大而高于国债利率，这就意味着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债利率正在确立其基准利率的地位。随着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深化，国债价格机制的功能将更加增强。

我国按照国际惯例推行国债发行投标式拍卖技术，通过封闭式竞价确定出合理的国债发行价格，并在与二级市场的连接中逐步形成完整的国债利率体系。国债市场的这种创新产生了一些正面效应：（1）我国国债市场上采用的投标式拍卖机制是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一种更有效率的拍卖制度，它使国债发行者的发行成本降低，并将国债评价卖给了最恰当的承销者。由此产生的国债价格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社会资金的紧缺程度，国债市场利率藉此所具备的代表性，成为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2）国债一级市场运用筛选机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符合一定的条件才有可能进入一级市场承销国债，这样促使一级自营商成长为市场结构的主角，并借助于示范效应带动整个国债市场主体的发育。（3）国债市场作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连接体，在推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促使利率市场化方面的作用日渐凸现。（4）从根本上说，封闭式竞价方式是国际通用的规范的国债发行方式，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促进了国债市场以致整个金融市场的规范化。

再次，配合公开市场业务进行国债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创造了国家运用国债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条件。近年来，国债品种日渐丰富，1994年财政部首次发行了6个月和1年期的短期国债；1996年国债品种走向多样化。一方面在还本付息的方式上进行改革，新增了剪息国债和贴现国债；另一方面，在国债期限上作了较大调整，包括长期、中期、短期各种期限，特别是尽可能多地发行了一部分短期国债，以增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国债期限结构也更趋合理。同时，财政部改革以往国债集中发行为按月滚动发行，强化了国债发行的时间匹配，并使发行新债与偿还旧债在时间上较好地衔接。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国债公开市场业务的市场条件基本具备并逐步走向成熟。

二、国债市场的功能不足与制度缺位

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我国国债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了在证券市场上的主体地位。但从整体上判断，我国国债市场功能拓展和制度需求的空间还很大，亟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1、国债市场结构不完善，阻碍了国债市场功能的增强和延伸。从结构上来考察，我国国债市场存在以下问题：（1）国债品种结构比较简单，不能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国债依其在期限、用途和还本付息方式等方面的种种差别，可以适应构成筹资对象的各种社会暂歇资金和游资的特定需求或发挥国债市场特定功能的要求。（2）国债市场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的国债交易98%以上是在场内进行的，场外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事实上对于国债交易来说，健全完善的场外市场要比场内市场显得灵活并具有更高效率。

2、对国债市场投资主体的培育不足，制约了国债市场的发展。在国债市场较发达的国家，国债市场投资者包括国内的各种专业机构和大量个人投资者，以及一定数量国外的各类专业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并且以机构投资为主，个人持有国债比例较低。日本的国债筹资对象主要是金融机构，由银团购买，逐步消化，立足集团持有，个人持有的比例不足30%。德国政府在每次国债发行额度中让出20%由外国银行和证券商承销。在美国，个人持有的国债比例仅为10%左右。而在我国，个人持有国债比例高达60%以上，商业银行的参与程度不够，国债投资基金作为散户投资者的集合也未得到发展，更谈不上对国外投资者开放。我国国债市场的这种投资者状况，造成了国债的流动性差，国债作为一种投资品进行投资组合的投资功能减弱。由于银行机构持债量过小，也不利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运作。

3、国债规模偏小，致使国债市场的多种功能难以正常发挥。从财政的国债依存度来看，国债规模似乎已较大，1995年，财政的内债依存度（国内公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2.6%，按当年内债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加债务还本付

息支出的比重计达 52.9%。这种状况是由于一方面国债扩容过猛,平均期限较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调控能力下降所致(据统计,1980年到1994年,我国财政占 GDP 的比重由 25.7% 大幅降至 11.6%)。但从国债余额占 GDP 的比重看,1995 年我国为 5.7%,而美国、法国、印度、泰国分别为 43.8%、23.7%、56.5%、38.4%,1996 年我国为 5.8%。再把国债发行额与应债能力相比,更显得国债发行不足。1996 年国债发行额仅相当于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 5.1%。

由于国债规模较小,国债市场存在功能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债的财政动员能力有限。国债的还本付息到期应偿债务不断增加,巨大的国债偿还负担,使小规模国债对财政支持能力下降。二是不能适应公开市场业务的要求,国债的政府宏观调控功能不强。开展以吞吐国债为主要操作工具的公开市场业务,客观上需要国债市场达到相应的规模以及国债品种的多样化。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的短期国债通货比率最低时为 11%,日本为 5~6%,若以低限 5% 计算(1996 年底我国的 M_2 余额为 76100 亿元),要实现有效的公开市场业务,仅短期国债规模就要达 3800 多亿元。但是,1996 年底,我国国债市场中可上市流通的国债余额仅为 1460 多亿元,而短期国债仅有 235 亿元。由此可见,目前的国债市场规模是使公开市场业务真正成为有效的、最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从而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由直接手段转变为间接手段的限制因素。三是由于国债总投资规模的约束,国债市场融资、套利功能的拓展受阻。由于国债市场规模还相当小,对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来说,根本不能满足其专业化投资操作和进行投资组合的需要。

4、国债市场缺乏规范化的法律约束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在国债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在国债立法和市场监管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是,迄今有关国债的法规大多是行政部门制定的以及少量中央政府的行政条例,没有一项由全国立法机关出台的、全面和系统且具有一定深度的、规范国债发行与流通的法律。与此同时,管理部门对国债中介机构的监管乏力,导致在国债回购业务中某些机构套取国家信用进行国债的卖空,以及发生非法操纵价格和内幕交易等行为,而对违规

或不符合标准的中介机构不能及时清理整顿。

三、国债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对国债市场的发展产生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国债市场将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不断改革和创新,从而促进国债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国债市场功能的拓展。近期内,我国国债市场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一,继续推行国债品种设计和规模扩张等技术创新,以增强国债市场多元化的功能。从发展趋势看,要从有利于推行公开市场业务,促使利率市场化,增强融资、投资功能和提高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等方面来进行我国国债市场的技术创新。(1) 调整国债期限品种结构,一方面增加长期国债以及 10 年期以上国债的品种,不断提高长期国债的比重,以适应挖掘国债规模潜力并控制依存度的需要;另一方面,大力发行标准化的短期国债,并逐步实现周期化发行,以配合公开市场业务的深入开展。(2) 不断减少凭证式、无记名式实物券国债的比重,逐步实现国债的无纸化发行,使国债走向以可上市记帐式国债为主,从而更好地开拓二级市场的流动功能和融资、套利功能。(3) 长期国债以本息拆离国债为主要形式,既可增强其交易性,又避免了一次还本付息国债的利息再投资风险;短期国债可选择升水国债形式,以便于其标准化。(4) 在设计国债品种时,着重于利率水平的测算,而较少直接设定价格,其发行价格逐步过渡到主要由投资者根据市场条件来确定,以推进利率的市场化。(5) 以中央银行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债券簿记系统为基础,加快国债清算网络的建设,并创造条件将国内清算系统与国际清算系统联网。

第二,开展国债流通的市场创新,促进国债市场体系的完整配套和二级市场的功能化发展。国债流通的市场创新将主要围绕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高效率的大市场和完善国债市场体系而展开。具体地说,可以推行以下一些措施:

一是规范和发展国债回购交易,完善回购市场机制。国债回购和逆回购是促进二级市场流动性的关键因素,也是投资者进行融资或套利的重

要途径，交易商可以借此控制存货，降低造市成本，并提高货币市场的流动性。而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同样是国债回购。目前，我国在发展国债回购市场方面重点要提高市场进入门槛，促进市场效率，不断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加强回购市场监管，杜绝买空卖空。

二是创造条件重新建立国债期货市场，适当发展其他国债衍生产品交易。国债期货作为一种有效的避险工具，具有特定的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功能，对于完善国债运行机制，健全国债市场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在全球 24 小时营运的国债市场上国债期货交易居于重要地位。目前开放国债期货市场，当务之急是要制定国债期货交易规则和健全国债期货交易制度。在重建国债期货市场的同时，可以进行国债再投资受益券、国债投资组合凭证、国债投资基金券、国债本息拆离息票等国债衍生产品交易，以进一步增强国债市场的流动性。

三是加强国债场外交易市场的建设，提高现货交易的效率。在我国，场外交易市场具有场内市场所不能替代的优势，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很大，可以利用现有商业银行的网点基础，适当增加对场外交易市场的硬件投入，重点在方便开立帐户、降低交易手续费、适应多种投资者需求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造。

四是推进国债市场的国际化，适应国际上债券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不再满足于在本国市场上发行国债，已经在欧洲市场上发行国债，80 年代末期全球债券这一金融产品

诞生。根据这种发展趋势，我国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快使国债市场向国外投资者开放，同时探讨我国进入全球债券市场的途径。

第三，推进国债市场的组织创新，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多元的国债市场主体结构。国际经验表明，在国债市场上要有多种市场主体，因此，必须根据我国国债市场的市场主体格局，进行市场组织创新，以增强国债市场的功能。(1) 进一步培植国债一级自营商，加强监管和考核，强化其做市商的职能。(2) 建立专业性的国债投资机构，发展国债投资基金。三是国债投资基金以其自身的实力而具有较强的融资、投资功能，并连接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我国建立国债投资基金的条件基本具备，应尽快进行试点，尽早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四，加强国债市场的制度创新，促进国债市场的规范化、法制化建设。从国债市场发展的要求来看，国债市场的制度建设已刻不容缓。首先，要颁布实施《国债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国债市场的基本法。其次，制定国债市场的专项法规，尽快制定有关基金管理、回购管理、期货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再次，要在《中央银行法》、《财政法》等相关法规中补充、修改有关国债市场的条款。最后，制定规范和统一的国债市场交易规则，建立完善的国债交易制度。

作者高波，南京大学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副教授 (210093)

责任编辑：谭湛明

论欧洲货币体系向欧洲 货币联盟转变面临的问题和前景

□李 翀

一、向欧洲货币联盟转变的进程

欧洲货币体系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成立于 1979 年, 它的目的是稳定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汇率, 为实现欧洲的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奠定基础。

欧洲货币体系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 汇率机制。该体系要求除个别成员国外, 其他成员国汇率的波动幅度不得超过平均的 $\pm 2.25\%$ 。如果实际汇率超过了规定的界限, 成员国需要采用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调整货币供给量、调整利率等方式进行调节。第二, 贷款安排。该体系建立了欧洲货币基金, 当成员国的汇率发生较大幅度波动时, 可以从欧洲货币基金申请贷款, 以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第三, 欧洲货币单位。该体系根据成员国一篮子货币确定欧洲货币单位的价值, 并把它作为成员国之间发放贷款、清偿债务的记帐单位。

虽然欧洲货币体系在 1992 年 9 月发生危机, 成员国汇率波动的界限不得不在 1993 年 8 月调整到 $\pm 15\%$, 但它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首先, 欧洲货币体系在稳定成员国货币汇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 随着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相继加入欧洲货币体系, 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已增加到 15 个国家。再次, 欧洲货币单位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 它不但成为成员国之间官方的清算工具, 而且也在一定范围成为成员国之间民间的清算工具。

为了推进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 1989 年 6 月, 欧洲国家或政府首脑委员会 (The European Council of Heads of State or Government) 在马德里召开会议, 通过了迪罗斯报告 (Delors Report), 提出分三个阶段建立欧洲货币联盟: 第一阶段是进一

步密切成员国之间在经济、财政和货币事务的合作, 实现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第二阶段是建立欧洲货币机构 (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 作为欧洲中央银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 的前期机构发挥作用。第三阶段是建立欧洲货币联盟, 确定各成员国货币转换为新的单一欧洲货币的比率, 欧洲中央银行将发行单一的欧洲货币并制定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欧洲货币基金将转变为欧洲中央银行, 欧洲货币单位将转变为单一的欧洲货币, 即欧洲货币体系将转变为欧洲货币联盟。

1990 年 7 月 1 日, 欧洲货币联盟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第一阶段计划开始启动。1991 年 12 月, 欧洲国家或政府首脑委员会在马斯特里赫召开会议, 并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该条约提出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日程和要采取的相应措施, 按照该条约的规定, 欧洲货币联盟第二阶段计划于 1994 年 1 月 1 日开始, 第三阶段计划最迟于 1999 年 1 月 1 日实施。1994 年 1 月 1 日, 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第二阶段计划如期启动, 欧洲货币机构正式成立。1995 年 12 月, 欧洲联盟首脑在马德里召开会议, 确定未来的单一欧洲货币名称为欧元 (EURO)。1996 年 12 月, 经过招标以后, 欧洲货币机构宣布中标的欧元纸币设计方案为 5、10、20、50、100、200、500 欧元 7 种, 其底色分别为灰、红、蓝、橘红、绿、黄、淡紫色, 分别代表欧洲发展史上的 7 个时代: 古罗马时代、哥特文化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巴洛克文化时代、洛可可文化时代、近代、现代。

1996 年 12 月, 欧洲联盟首脑在都柏林召开会议, 正式决定 1999 年 1 月 1 日为

实行欧洲货币联盟第三阶段计划和使用单一货币的日子。这样，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时间表已明确：1996-1998年底，设计欧元纸币和硬币，起草有关法律文件，制定货币转换方案，决定欧洲货币联盟首批成员国，1999年1月-2002年1月，确定

不可改变的成员国货币与欧元的转换率，成员国货币和欧元可同时用于非现金交易，欧洲中央银行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2002年1月-同年7月，成员国货币转换为欧元，非现金交易强制使用欧元，2002年7月以后，成员国货币退出流通领域，欧元成为唯一的货币。

表 1: 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趋同情况

国家	通货膨胀	预算赤字比重		政府债务比重		长期利率	汇率机制
	(%)	(占国内生产总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		(政府债券年率)	(波动界限±%)
	1996	1996	1997	1996	1997	1996	
奥地利	<u>1.8</u>	4.5	- 3.1	72	74	<u>6.1</u>	15.0
比利时	<u>1.9</u>	- 3.1	<u>- 3.0</u>	132	128	<u>6.1</u>	15.0
丹麦	2.4	<u>- 1.0</u>	<u>- 0.7</u>	71	69	<u>6.9</u>	15.0
芬兰	<u>0.4</u>	- 3.3	<u>- 1.6</u>	62	60	<u>6.5</u>	未参加
法国	<u>1.6</u>	- 4.4	- 3.2	<u>56</u>	<u>58</u>	<u>6.0</u>	15.0
德国	<u>1.4</u>	- 4.0	- 3.2	61	62	<u>6.0</u>	15.0
希腊	8.5	- 8.0	- 7.0	112	111	17.4	未参加
意大利	3.3	- 6.2	- 4.0	123	122	<u>8.4</u>	未参加
爱尔兰	<u>1.4</u>	<u>- 2.0</u>	<u>- 1.6</u>	81	17	<u>6.8</u>	15.0
卢森堡	<u>1.4</u>	<u>0.7</u>	<u>0.5</u>	<u>6</u>	<u>7</u>	<u>6.1</u>	15.0
荷兰	<u>1.9</u>	<u>- 2.8</u>	<u>- 2.2</u>	79	76	<u>5.9</u>	15.0
葡萄牙	3.6	- 4.5	- 3.7	72	72	<u>7.5</u>	15.0
西班牙	3.6	- 4.5	- 3.7	65	67	<u>7.8</u>	15.0
瑞典	<u>0.3</u>	- 5.2	- 3.1	81	80	<u>7.3</u>	未参加
英国	<u>2.1</u>	- 4.4	- 3.7	<u>56</u>	<u>57</u>	<u>7.6</u>	未参加

注：德国的通货膨胀率是原西德的通货膨胀率，希腊的长期利率是1995年预测的利率，1997年数字为预测数字，划有横线数字为符合趋同标准的数字。

资料来源：《稳定的欧洲货币》(A Stable Currency for Europe)，德国银行研究所，1995年，第26页；《欧洲十五国达标情况表》，《国际金融研究》1997年第1期。

欧洲货币体系正有步骤地向欧洲货币联盟转变，欧洲货币联盟能否建成，将直接关系到欧洲经济联盟能否最终建成，从而关系到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因此，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从欧洲货币体系向欧洲货币联盟过渡的进程，然而可以预料，在这个进程中，欧洲国家还将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

二、达到趋同标准面临的困难

理论和实践表明，成员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组成经济联盟的基础就越牢固，经济联盟运转的稳定性就越强。

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按照马斯特里赫条约的规定，参加

欧洲货币联盟的国家必须要达到下述5项趋同标准 (Convergence Criteria)：

第一，从接受审核之日算起的前一年内的通货膨胀率，不得高于通货膨胀率最低的三个国家平均通货膨胀1.5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按可以比较的消费物价指数衡量。

第二，政府年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果超过3%，那么该比率必须是已大幅度持续地下降并且已接近3%，或者该比率是由偶然和意外的因素造成并且已接近3%。

第三，政府债务总额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如果超过60%，那么该比率必须是已发生大幅度下降并且以令人满

意的速度接近 60%。

第四，从接受审核之日算起的前一年的长期名义利率，不得超过通货膨胀率最低的三个国家相应利率 2 个百分点。名义利率以长期政府债券利率或相似的证券利率衡量。

第五，申请国必须是已参加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其货币汇率在前两年均没有超出正常的波动范围并且不存在导致汇率大幅度变化的压力。另外，对其他成员国的双边中心汇率没有因本国的缘故而发生贬值。

这五项指标是相互联系的。如果不把政府的赤字和债务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内，将无法实现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的稳定和趋同，而不能实现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的稳定和趋同，汇率将会波动不安。这样，将难以实现向实行单一货币的货币联盟过渡。

然而，不容乐观的是，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的趋同性并不太好。表 1 说明了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的趋同情况。

从表 1 可以看到，1996 年通货膨胀率最低的 3 个国家（芬兰、卢森堡、瑞典）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是 0.7%，这三个国家的长期利率是 6.6%。按照这些指标来衡量，完全达到了 5 项趋同标准的国家只有卢森堡，达到 4 项趋同标准的国家有比利时、法国、爱尔兰、荷兰，只达到 3 项趋同标准但其余 2 项指标接近标准的国家有德国。但有部分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典、葡萄牙、希腊距离趋同标准相差较大。

按照日程安排，在 1998 年上半年，将由经济和财政部长委员会和欧洲货币机构推荐，欧洲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投票决定符合趋同标准的国家。显然，如果发生下面三种情况之一，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进程将受到影响：第一，如果达到趋同标准的国家过少，由寥寥几个国家组成货币联盟意义不大；第二，如果包括德国在内的若干核心国家加入货币联盟而法国达不到趋同标准，货币联盟也将因缺乏德法两国

形成的经济和政治核心而无法建成；第三，如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放宽对参加国的趋同性要求，人们将会对货币联盟的稳定性产生怀疑，资本将会流出货币联盟成员国，货币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将出现波动，货币联盟难以稳定。

由此可见，要顺利向欧洲货币联盟转变，欧洲货币体系核心国必须迅速调整国内经济，以达到趋同标准的要求。但这样一来，这些国家不得不付出代价。例如，对于那些通货膨胀率较高、预算赤字较大、政府债务较多的国家来说，要达到趋同性标准，就要收缩经济，这将会造成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丹麦已经明确拒绝接受马斯特里赫条约，其他国家将会怎样做？所以，欧洲货币体系能否顺利向欧洲货币联盟转变，取决于有关国家加入货币联盟的决心和达到趋同标准的调整代价。

三、实行单一货币存在的问题

要在欧洲货币联盟内采用单一的货币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没有独立于各国政府的欧洲中央银行是不可能的。因此，建立欧洲中央银行是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关键。

按照日程安排，1999 年 1 月 1 日即欧洲货币联盟第三阶段计划启动的前一年，是为第三阶段作准备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将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确定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手段，通过有关货币转换的法律文件，开始印刷和制造欧元的纸币和硬币。

欧洲中央银行将设在法兰克福，它的执行机构是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Board），执行委员会成员由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通过相互磋商的方式决定，执行委员会负责执行决策机构的决定和欧洲中央银行的日常事务。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是管理委员会（Governing Council），它由执行委员会成员和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管理委员会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当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时，由管理委员会总裁作出决定。除了利润分配以外，各种事务按照简单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利润分

配则需要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加权平均票数 2/3 通过才有效，执行委员会委员无权参与投票。各国中央银行行长投票的权数取决于他所在的国家缴纳给欧洲中央银行的资本份额，而各国缴纳的资本份额又取决于它们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在货币同盟中所占的比例。欧洲中央银行的注册资本为 50 亿欧洲货币单位。欧洲同盟委员会 (EU Commission) 成员和部长委员会主席可以列席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会议，但没有投票权。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则是由欧洲中央银行和各国中央银行组成的系统，它类似于各国的中央银行总部和设在各地区的中央银行所组成的系统。欧洲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通过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来实施。

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它既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的政治机构，也独立于各国政府。另外，欧洲中央银行可以自己制定货币政策和选择实施货币政策的货币手段，为了保证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它的官员的任期较长。执行委员会委员任期 8 年但不允许连任，各国中央银行行长任期 5 年但允许连任。欧洲中央银行的职责是保持新的单一货币的稳定，制定和执行日常的汇率政策，管理成员国存放的外汇储备，对银行和金融体系的管理提出建议。欧洲中央银行负责发行纸币，各国中央银行负责发行硬币，但发行的数量由欧洲中央银行控制。

欧洲中央银行将使用什么货币手段还在讨论之中。例如，常规的货币供给可以利用公开市场业务通过回购交易的方式实现，防止货币市场利率跌得过低可以考虑使用再贴现率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否建立银行的最低准备金制度还存在较大的分歧。

按照日程安排，在 1999 年 1 月 1 日，欧洲中央银行将确定货币联盟成员国货币与单一欧洲货币的转换率和它们相互之间的汇率，这些转换率和汇率是不可改变的。单一的欧洲货币的价值将等于由一篮子货币组成的欧洲货币单位的价值，因而两者

的比例为 1:1。在 2002 年 1 月 1 日以前，单一的欧洲货币可以与各国货币一起用于非现金交易。从 2002 年 1 月 1 日以后，成员国货币开始转换为单一的欧洲货币，单一的欧洲货币进入流通，非现金交易强制使用单一的欧洲货币。同年 7 月 1 日，成员国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在单一的欧洲货币产生以后，单一的欧洲货币与未参加货币联盟的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货币之间的关系仍保留欧洲货币体系的方式，即确定两种货币的平价，并要求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的波动不得超过某一个幅度。

要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和采用单一欧洲货币还将遇到各种问题。

首先，能否采用单一欧洲货币取决于能否建立欧洲中央银行，而能否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又取决于各主要国家是否达到趋同标准。如果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达到趋同标准而加入货币联盟，欧洲中央银行将难以建立。即使欧洲中央银行勉强建立，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其次，采用单一欧洲货币对货币联盟成员国的工业、商业、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各个行业将会及早地作好准备以争取平稳地以较低的成本转向单一欧洲货币。因此，能否按时宣布货币联盟成员国和作好采用单一欧洲货币的准备十分重要。一旦计划被耽搁，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各行业会无所适从，这些国家的经济将会受到不利影响。

再次，欧洲中央银行的建立和单一欧洲货币的采用依赖于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如果某些成员国在转变过程中认为某些措施损害了本国的利益或没有照顾到本国应有的利益而不予以合作，欧洲货币联盟仍面临失败的危险。同时，欧洲中央银行的建立和单一欧洲货币的采用足有赖于广大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但是，目前在部分国家里还有相当多的公众对单一的欧洲货币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如果对公众不进行充分的解释和疏导，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的动荡。

四、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

从欧洲货币体系向欧洲货币联盟的转变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1992年9月欧洲货币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预料，从现在起到1999年或2002年，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困难，建立欧洲货币联盟还会经受这样或那样的考验。但是，尽管向货币联盟转变的时间表有可能有所调整，但走向货币联盟则是不可逆转的。

首先，建立欧洲货币联盟是建立欧洲经济联盟乃至政治联盟的基础和保证。战后的情况表明，欧洲国家要在经济上与美国和日本抗衡，在政治上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唯有走联合之路。而要实现真正的经济联盟，首先必须要实现货币联盟。如果建立起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和实行单一的欧洲货币，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将牢不可分，在政治上也将更加强大。从经济和政治发展战略考虑，欧洲国家将会努力地推进货币联盟。

其次，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可以消除汇率风险和免除套期保值的成本，从而有助于推动成员国之间避免贸易和投资的风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浮动汇率制度取代了钉住汇率制度，汇率波动不安对国际经济活动带来很大的风险。欧洲经济共同体从1972年的蛇形浮动到1979年的欧洲货币体系，一直致力于减少共同体内的汇率风险。在欧洲货币联盟建成以后，由于采用单一的货币，成员国之间的汇率风险不再存在，为避免汇率风险而采用的套期保值无法存在也不再需要，这将有力地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再次，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可以消除成员国之间货币交换的成本，从而有助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在国与国之间从事经济活动必然涉及货币与货币的兑换，因而要支付货币交易的成本，这对频繁的货币兑换造成不利的影 响。欧洲货币联盟建立以后，将实行单一的货币，在成员国之间不再需要进行货币兑换，这将有力地

推动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

还有，建立欧洲货币联盟有助于减少汇率变化和资本流动对成员国经济造成的外部冲击，从而有助于成员国经济的稳定。在现行的欧洲货币体系里，当美元发生波动时，或当大量的资本发生流动时，各成员的货币所受的影响是不同的。为了不超 过汇率波动的界限，各成员国不得不用干 预外汇市场和调整国内经济政策的方法来调整汇率，结果造成国内经济和就业的波 动。建立货币同盟以后，由于实行单一货 币，各成员国不再需要进行这样的调整， 从而减轻了国内经济所受到的外部不稳定性冲击。

最后，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将有力地增强欧洲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实行单一的欧洲货币以后，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将远超越目前马克和法郎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对美元的相对地位。这样，单一的欧洲货币有可能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欧洲国家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要获得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利益，各有关国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利益和代价相比，利益远大于代价。因此，尽管各有关国家在得到多少相对利益和付出多少相对成本的问题上还会有争执和分歧，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目标是一致的。于1997年6月16日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欧洲联盟首脑会议，就消除因德国要求稳定未来的欧元而法国则强调增加就业所形成的分歧，正式批准了《稳定和增长公约》、《欧元的法律地位》和《新的货币汇率机制》3份文件，并就新的欧洲联盟条约即《阿姆斯特丹条约》的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可以预料，欧洲货币联盟或迟或早将会建成。

作者李翀，中山大学国际贸易金融系教授、博导(510275)

责任编辑：谭湛明

从东亚的崛起看

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方式及其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地区的韩国、台湾、新加坡等虽然选择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发展道路，但在经济发展之初，它们都面临着民营企业力量薄弱，各类市场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交易活动欠缺规范，从而市场机制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的问题。在这种市场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东亚国家（地区）政府没有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而是采取了对经济生活积极地加以干预的办法。

尽管东亚国家（地区）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程度存在着差别，但其干预经济的最基本的方式都是一致的。从市场不发达的现实出发，政府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经济进行了干预。

其一，在市场机制尚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代替市场行使了一部分配置资源的职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都有限，特别是现代企业家的人数较少，素质也还不高，还没有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这样，单靠市场机制来引导经济发展，不仅力度不够，而且持续的时间势必较长，稳定性也较差。针对这种情况，东亚国家（地区）政府积极地介入经济生活，行使了一部分配置资源的职能。政府的替代活动，主要表现为由政府选择和确定某些具有动态比较优势和示范效应的现代产业部门，运用政权力量影响其要素投入和配置状况，以促其发展，以及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进农业等部门的发展。其主要办法，一是兴办国营企业并使其有效地运转；二是干预生产要素的价格以刺激现代产业部门和农业的发展；三是通过财政补贴、信贷分配、税制优惠、进口限制等办法，引导私人部门投资于经济发展急需和潜在收益率较高的项目，或通过经营许可、价格限制等办法，防止私人部门中的过度竞争。东亚国家（地区）政府对市场的这种替代作用，在市场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产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二, 积极地培育市场, 为市场发育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从历史上看, 由于种种原因, 东亚地区市场化的进程十分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东亚国家(地区)政府把培育市场作为政府干预的一项重要内容, 采取多种措施力促市场的发育和发展。首先是使社会各阶层都得到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 保护私人财产权利, 鼓励民间的投资热情, 推动民营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要求国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从而培育出健全的市场主体。其次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的同时, 大力培育生产要素市场, 促进有关改善资本、劳动、技术、信息等市场的制度和设施的发展, 建立起多层次、多种类、多功能的市场体系网络。第三是适时地实现由进口替代为主向出口导向为主的战略转变, 建立加工出口区和自由贸易区, 大力鼓励出口, 逐步放松贸易保护, 同时改善投资环境, 吸引外国投资, 从而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第四是有步骤地消除价格扭曲现象, 逐步建立起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由于政府以强有力的手段来加强市场的运转, 东亚地区的市场发育和发展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市场演进中的许多阶段, 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在东亚, 政府不仅行使了部分地替代市场、培育市场和弥补市场的内在缺陷与不足这三种经济职能, 而且较好地处理了三者的关系, 尤其是部分地替代市场和培育市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把培育市场作为市场不发达条件下政府职能的核心, 使经济体系坚定不移地朝市场运行的方向发展, 在部分地替代市场的活动中尽量按市场法则的要求办事; 与此同时, 把部分地替代市场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并通过这种替代活动为培育市场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80年代以后,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 东亚国家(地区)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的政策, 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事实表明, 在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

从部分地替代市场、培育市场和弥补市场的内在缺陷与不足这三个方面对经济生活加以干预并处理好三者的关系, 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方式。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正是借助于这种方式促成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发育程度的显著提高, 使其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跻身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二

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来看, 政府之所以能以有效的方式干预经济, 首先是由于具备了下述政治方面的条件。

第一, 发展导向型政府的建立。发展导向型政府的建立, 是东亚国家(地区)政府能有效干预经济的关键。发展导向型的政府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认为, 在国家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中, 经济发展是最为迫切的问题, 它对于消除贫穷落后, 实现政治稳定, 改善对外关系, 都是至关重要的。1961年韩国政权更迭后, 军政府上台不久, 就确立了“经济发展第一”的指导思想, 林正熙任总统后也一再声明, 在其整个任期内, “我们的最终任务是实现经济和工业的现代化”。^①新加坡独立后, 政府也把谋求经济发展作为最优先的目标。^②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 东亚国家(地区)政府将经济发展作为政治的主要内容和施政的重要目的, 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发展上来。其二是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是东亚国家(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哲学基础, 它主张正视现实、坚持信念和长期目标, 但又主张灵活对待现实中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哲学, 体现了政治的理性化。就新加坡而言, 在这种政治哲学的指导下, 新加坡政府没有被任何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或教条所束缚, 而是在能够为新加坡人带来更好的生活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说中, 随意选择最好的东西为其所用。^③在经济发展第一和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导下, 东亚国家(地区)政府

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选择并实施了最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同时全力抑制和排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

第二，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确定。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是东亚政治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体制在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使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在东亚，行政权力十分强大，立法部门相对弱小，参与决策的主体只限于国家认可的少数人或团体，总统（总理）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国家的力量超过了社会的力量。在这种权威主义体制下，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能够向人民规定义务并在必要时予以强制执行。

东亚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还有助于避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实现基本的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政府有效干预经济的前提条件。在经济发展中，当不同的利益集团提出各自的要求而又得不到良性整合时，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会受到干扰，干预经济的活动也难以有效开展。劳资冲突是经济发展中妨碍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之一。东亚国家（地区）政府认为，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是与发展目标相冲突的，因而运用多种手段遏制劳工运动，使其始终没有强大到影响政府政策取向的程度，同时采取各种措施调节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劳资关系。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下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使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得以有效开展，为东亚持续、高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把民众从政治舞台上排斥出去其弱点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市场还不发达的条件下，这种体制对于政府实施干预经济的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说是有效而正当的。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种政治体制也开始朝民主化的方向发展。相形之下，政府力量软弱，缺乏必要的权威，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不能有效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被缪尔达尔称为“软国家”的南亚

各国，政府不愿对公众规定义务，已经确定的政策也经常得不到执行；在拉丁美洲，以折衷主义和调和主义为特色的民众主义文人政府不能抑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其政策往往是由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均势来决定的；而80年代以后一些非洲国家推行“民主”制度，结果导致党派林立，政局长期不稳，发展目标也只能是流于空谈。在上述不发达经济中，由于政治体制无法确保社会稳定和政府经济的有效干预，因而也就难以实现经济的发展。

第三，有效的组织机构和官僚阶段的形成。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需要具体的组织机构和官僚队伍来承担。而东亚国家（地区）政府之所以能有效地干预经济，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拥有良好的组织机构和高素质的官僚队伍。在经济发展中，东亚国家（地区）政府建立了许多机构，计划、监督、调查等部门得到迅速发展。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把殖民政府的按照法律和命令办事的被动的公共部门，转变为增长导向的富有生气的公共部门，并建立了国家发展部、环境部和贸易与工业部等新的部门。^④在韩国，经济企划院作为政府中地位最高、最强有力的经济部门，则在编制和执行各项经济计划和政策上发挥了中心的作用。适应政府干预经济的需要，东亚国家（地区）政府还建立一支高效精干的官僚队伍。这支队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发展政策并使其不因短期的政治变动而中断。

在东亚，政府为建设高素质的官僚队伍作了不少努力，如提倡廉洁和办事的高效率，对各级官员实行升降考核，注重其能力和实绩，为有前途的公共部门人才提供高度的教育和训练，对腐败行为实行严厉惩罚，等等。结果政府干预中容易出现的腐败和寻租现象在东亚受到抑制，官员的态度和行为也越来越有益于促进组织的效率和国家的发展目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强调政府干预的同时，往往无暇顾及官僚队伍建设，对

行政机构和政府官员强调得较多的是道德的约束而不是法规管束，结果官僚队伍素质效率低下，甚至贪污腐化盛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即便有发展的决心，也缺乏将政策付诸实施的条件。

第四，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密切合作关系的建立。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关系良好，是政府有效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东亚，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紧密合作的关系。就政府来说，政府把建立民营企业制度作为培育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私人经济部门实行保护、扶植和鼓励的政策，力促其发展；同时，政府从国家的总体利益和长期目标出发，也对私人部门实行某些限制，使其服从于国家的发展目标。就私人部门来说，私人部门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亦充分认同于国家的发展目标。在私人企业家看来，“只有使企业的目标和行动同时代要求和国家长期目标相协调，才能取得持续发展和生存。”^⑤这样，在东亚，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协同关系。这种协同关系是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网络来进行的。其中两种渠道最为重要，一是国家领导人与企业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沟通，二是有关经济官僚机构与各产业协会之间的协商。^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提出计划并进行安排和鼓动，私人部门服从并努力进行合作；私人部门提出意见和方案，政府择善而从。这种机制使政府和私人部门融为一体，使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能合理而有效地进行。与此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私人部门不是相互协调，而是处于对立之中。这种对立，主要表现为政府不仅没有为私人部门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反而束缚和压制私人部门的发展。这样，私人部门的热情难以得到发挥，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也不可能有效地开展。

在东亚，政府之所以能以有效的方式对经济进行干预，固然是由于具备了上述政治方面的条件，但是，政治条件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发挥作用，因而，分析政府

有效干预经济的条件，还必须考察社会文化方面的状况。从实际情况来看，东亚国家（地区）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与东亚独特的社会和文化条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东西方价值观念的融合使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易于得到贯彻执行。杜维明指出，在东亚，传统的儒家道德标准已和西方的基督教标准结合在一起，且为基督教标准所改造，从而形成了“新儒家道德标准”。这种新的道德标准可以说是儒家价值观念和西方注重实效、注重经济目标的价值观念的混合物。^⑦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取向的发展道路得到广泛认同，儒家鄙视商业的传统思想受到摒弃，而儒家浓厚的英才统治准则，崇高权威，主张在等级秩序下协调人们的行为，强调对团队的忠诚，重视组织成员之间的合作和意见一致，强调纪律和教育的思想价值观念仍然发挥着作用，为大多数东亚人的行为提供着内在的指针。这样，政府依靠公众对它的忠诚，树立了一种绝对的权威，担负起干预经济的职责，并使相互竞争的不同利益主体从国家利益出发，追求同一发展目标。韩国学者金日坤指出，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秩序，经过长期的体验和教化，形成了一种“整体号召机制”，并把这种机制保持至今，使国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既定目标的能力”。^⑧

其次，东亚地区较强的社会同质性为政府有效地干预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东亚各国（地区）内部具有相同的或相似的人种、语言、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历史上没有种族纠纷，单一的民族占据社会主体地位，宗教势力较为弱小。这种较强的社会同质性，使政府的发展政策容易得到认同和执行。

再次，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所面临的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使政府不能不担负起有效干预经济的历史重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内部面临着殖民统治瓦解和战争破坏后社会经济落

求真务实 别具一格

——评《现代经济理论实用读本》

□ 杨永华

最近，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何顺民、周圣英（已故）主编、温思美、黄均伟、梁桂全、戈晓宇副主编的《现代经济理论实用读本》（以下简称《读本》）。这部书是广东省委组织部等单位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指示精神和中央《1996年—200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以及广东省委《“九五”干部教育培训规划》而组织专家、学者编著的经济学著作，我通读了这部著作，觉得它的意义不仅于此，与目前一些经济学著作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方法，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依据，对流行的经济理论进行审慎地批判和鉴别，选用现代经济理论中的

后、人民生活困苦的局面，在外部面临着冷战背景下的紧张对峙状况。这样，以最有效的方式干预经济以加速经济增长，也就成为政府努力的目标和应尽的职责。

发展中国家是在极不相同的环境条件下谋求经济发展的，其历史起点、文化传统、社会状况、经济体制、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等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而，对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干预经济的经验不能简单照搬，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市场还不发达从而市场机制尚不能有效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的情况，在此条件下，要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同样必须从部分地替代市场、培育市场和弥补市场的内在缺陷与不足这三个方面对经济生活加以干预并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如何从自身条件出发，发

优秀理论成果，构筑自己独特的经济理论板块。

20世纪是中国经济学繁荣的世纪，然而又是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的世纪。如果从《管子》算起，中国本土生长的经济思想产生已经有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然而，中国独特的经济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被西方传进来的经济思想所打败，随之就逐渐消失，西方经济思想就广泛流行起来，逐渐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想的主要部分就是现在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块东西，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夹杂在外来经济学思想的大潮中一起传到了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以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挥好政府有效干预经济的作用，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①⑦转见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0、59—60页。

②③④左大培、裴小牵：《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105—106、110页。

⑤龚长五、沈海军：《大宇财团领袖金宇中》，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⑥参见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⑧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作者周军，武汉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430070）

责任编辑：谭湛明

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教科书》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又像潮水一样地涌进来。于是在90年代，经济学界争论着“苏联范式”、“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版经济学等艰深的理论问题。在这种理论大背景下，几乎凡是干部培训之类的教材，十有八九沿用苏联的《教科书》理论体系，实在不能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时，就加进一章或者二章市场经济之类的内容，这就像一件破烂不堪的旧衣服打上几个补丁一样难看。《读本》编写者勇敢和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没有被传统经济思想所束缚，而是根据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方法，依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审慎地批判和鉴别流行的经济思想，选用优秀的科学成果，构筑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板块，设计了《读本》的框架结构，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也许是编写者们明智的选择。

(二) 编写者们没有沿用某种现代经济理论体系，也没有对某种经济理论进行令人乏味的论证和说明，而是用现代经济理论来生动地分析和解释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实践，把干部们生活在其中的经济生活实例与现代经济理论紧密联系起来，融为一体。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所熟知的一条重要原则，然而真正做起来却不容易，做得好更难。这里的难度首先在于如何准确地把握理论、了解实践及其联系。现代经济理论是一个异常庞大的理论堆积，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到发展经济学，从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派到新古典综合，圈内的人能够提起一长串流派、经典著作，其中不少著作是在世界经济学领域领了数十年风骚的名著。然而，《读本》的编写者们没有被流行的理论体系所束缚，而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到了生机勃勃的广东实践中去，着眼于解释和说明广东“先行一步”的实践，并且用这种活生生的经济生活例子说明现代经济学理论。于是，《读本》的

编写者把眼光投到了发展经济学，似乎对发展经济学情有独钟，发展经济学理论生龙活虎地跳到读者面前，向读者生动地叙述着一个又一个原理。

(三) 编写者们并不是简单地做着理论与实践对号入座的游戏，而是在生动的叙述中对理论界争得面红耳赤的理论热点和焦点表示了态度，对广东改革开放实践中重大问题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见解。

一部著作品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没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有没有提出新的观点。如果一部著作像做游戏一样把一个个现实的理论结论，挂上某个事例作一些解释，这是十分容易的，如果仅仅这样，这部著作的品位不可能很高。《读本》可贵之处在于，在这种通俗的解释中，尽可能地对当前理论界争论的理论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对广东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比如，编写者们认为，苏联《教科书》实质上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解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用《教科书》，而是要用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作为这一理论核心内容的邓小平经济理论（也称之为邓小平经济学），不愧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富民强国论。”（《读本》第4页）中国学术界一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有一种固执的看法，认为古典经济学以后的西方经济学都是马克思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因而是完全没有用的东西，不能用来解释当代中国的实践。《读本》的编写者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理论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规律的一般抽象和理论化的概括，并没有带有什么姓‘社’姓‘资’的标签，学好它，对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利的。”（《读本》第4页）《读本》并没有为通俗著作束缚了手脚，游离于广东改革开放实践之外，而是积极参与广东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并且把全书的立足点放到对广东经济的分

析上来。《读本》第一章分析了广东在新发展阶段中的三大矛盾：原有增长模式与“两个根本性转变”产生的矛盾，不同经济要素或层面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不公、不稳定之间的矛盾，接着提出“广东在新的发展阶段不但要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上述三大矛盾，而且还必须面对新的挑战。”“广东经济新一轮繁荣和发展的抉择与出路恰恰就寓于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化解新发展阶段所遇到的三大矛盾的过程中，其关键在于求得在‘两个根本性转变’中再度‘先行一步’。下面的各章节便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这种抉择与出路的进一步展示。”（《读本》第19、24页）这样就把全书的理论展示紧密围绕着广东在新时期再度辉煌这个中心。这部通俗性的著作一下子把自身的品位提高到论证广东再度辉煌的对策建议上来。而不仅仅是通俗解释现代经济理论。

（四）《读本》别具一格，采用正文和注释、案例、问题四个方面溶成一体的体例，语言生动风趣，读起来生气盎然。

《读本》的注释主要不是对书中一些理论出处的注解，而是当作编写著作的一种形式。编者为了保持正文可读性强，不对复杂艰深的理论问题进行详尽的论证和说明，然而又不能回避经济理论问题，于是就采取了把有关的经济理论放在注释中进行说明和必要的论证。这种解释说明长短不完全相等，一个注释短的几百字，长的2000多字，如最长的一条是解释城市兴衰的“比较资源吸引力”，约2500多字，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比如第五章用了一个案例：“菲利浦沉浮引人深思”，长2000多字，用这个案例来说明企业管理方面的理论，这样可以加深读者的理解。

每一章后面的问题也不是针对书中的内容简单的提问，而是往往例举一个事例，然后要求用书中的理论来回答。我看这种编写方法似乎给我国目前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一个启发，经济学教科书是可以编写得生动一些，可读性强一些，而不是让读者感到乏味。我从来认为，经济学著作似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用经济学范畴术语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的经济学著作，一类是把经济学知识进行通俗的生动的讲解的教科书。第一类著作主要是为了探索新的经济学理论，这类著作的读者圈仅限于专业人士；第二类著作主要是传授经济学知识。写出第一类著作当然是科学成果，写出第二类经济学著作未尝不是经济学成果。然而，目前流行的做法是不承认第二类经济学著作作为经济学成果的，至少算不上高水平的成果，比如在教育系统的评奖活动中，一般不把教材即第二类著作列入评奖范围的。实际上，第二类著作的写作也相当困难，这种著作的意义也很大。在把经济学知识通俗化方面，《读本》作了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当然，《读本》也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广东是综合改革试验区，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先走一步”，这方面有不少东西值得总结，然而《读本》对广东发育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涉及不多；与此相联系，《读本》选择的现代经济理论偏重于发展经济学，选用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份量似乎轻了一些，这可能是一个缺憾。

作者杨永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系教授（510631）

责任编辑：谭湛明

广东历史上的农业开发

(笔谈)

编者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今天的农业规模和格局是历史上农业的延续和发展。广东在历史上虽开发较晚，但以其自然的地理和气候而形成自身的优势和特色。认真地总结广东历史上农业发展的特点，有助于人们对现代农业发展路向的选择。

古代广东农业发展的 若干特点与启示

□ 陈伟明

(暨南大学历史系)

古代广东(包括海南岛地区)自明清以来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回顾广东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历程，有若干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或许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1) 农业起源较早而起点较低

广东是我国最早产生原始农业的地区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了原始农业的萌芽。但是与中原地区及江南地区相比，农业经济的起点相对较低。据张光直先生《中国南部的史前文化》一文的考证，华南地区最先栽培的植物主要是芋类、薯蕷、瓜类、豆类、水生作物，大多是根茎类作物，多为无性繁殖，易于栽培。而中原、江南地区最早栽培的粟、稷和水稻等，多为有性繁殖，需要较高的栽培水平。据此可知广东地区与中原、江南地区相比，最初的农艺水平相对落后，起点较低。

(2) 农业生产发展缓慢

广东农业虽然起步较早，但长期以来发展迟缓。直到唐代，“岭外诸州，居人与蛮僚同俗，火耕水耨。”^①从生态环境的变迁也说明了这一点。宋元时期，广东的农业垦殖仍十分有限，因此天然植被仍相当

茂密，如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仍然是一个草木繁茂的瘴气之区。②南宋潮州，“仍地多野象，数百为群。”③直至明清以前，据《图书集成·职方典》中有关雷州、廉州等地山川的记载，仍有野象活动，这说明古代广东不少地区仍然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天然植被尚未开发，农业垦殖活动迟滞落后。明清时期，广东农业才开始了新的跃进，成为先进的农业区域。

(3) 耕地面积少而复种指数高

广东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耕地面积较少。如宋代，广东地区的垦殖指数与全国先进地区相比，差距很大。根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0、乙表10的数字进行比较，元丰年间，两浙路每平方公里亩数约296亩，成都府路约394亩，而广南东路只有约18亩。尽管南宋后，江河三角洲冲积平原不断扩大，但从绝对数字上来看，耕地面积一直远远落后于中原与江南地区。古代广东要发展主粮生产，只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大复种指数。广东地处亚热带，日照、气温、降雨量均具有复种的条件，因此双季复种自古而然。唐代海南“收稻再稻”，④宋代潮州“地居东南而暖，谷曾再熟，其熟于五六月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⑤多熟复种，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广东地区垦殖指数较低的缺陷，确保了主粮生产的发展。

古代广东农业发展的上述特点，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广东地区背山靠海，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面积较少，在炎热多雨的条件下，各种岩石风化剧烈，使土壤趋于酸化与红壤化，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广东地处低纬，气候湿热多雨，古代地表覆盖着茂密的热带亚热带森林，给广东农业开发带来了很大障碍。但是另一方面，森林江河，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成为古代重要的天然食库，使较为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如采集、渔猎经济能够长期并存，并且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了农业生产之不足。人们以较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业栽培技术，就可维持基

本的食物来源。这使古代广东的农业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的状态。

从古代广东农业发展的特点看，我认为，要发展广东地区的农业经济，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利用优越的气候条件，提高土地的利用程度；二是如何改造自然环境，保护和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土壤质量。

①《唐大诏令集》卷109《禁岭南货卖男女敕》。

②[宋]周去非：《岭外化答》卷四。

③[宋]洪迈：《夷坚志·夷坚丁志》卷十。

④[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

⑤《永乐大典》卷5343引《三阳志》。

广东在传统农业 科技上的全国之最

□ 华农史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室)

广东农业开发较晚，从传统农业的整体上说，较中原地区落后。但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却有不少发明创造，成为全国之最，这里谨举数例以资说明。

一、最早进行双季稻栽培

东汉杨孚《异物志》说：“交趾稻，冬夏又熟，农者一岁再种”。其所说的交趾，包括广东、广西大部 and 越南中北部。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关于双季稻栽培的最早记载。西晋《吴都赋》也有“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之句，有人把吴都定为苏州，也有人把吴都定为南京，实际上《吴都赋》中所说的物产应包括整个吴国的物产，不应局限于都城。从“乡贡八蚕之绵”的“八蚕”来看，所指的产区应该是岭南，因而“再熟之稻”也可能是指岭南。还有人认为这里说的“又熟”、“再种”和“再熟”不一定是栽培于同一块田里的双季稻。我认为，如果光从文献记载看，确需

商榷，但如果把文献记载与 1961—1962 年在佛山澜石出土的“陶水田模型”结合起来考察，这种疑虑便可以打消了。该模型中塑有六个陶俑，有的在扶犁耕田，有的在躬身收割，有的在插秧，有的在磨刀，反映出夏收夏种的繁忙景象，说明当时广东的一些先进地区，确已率先实行双季稻栽培。

二、最早创制和使用耖耙

1963 年在连县附城公社龙口大队的一座西晋古墓（公元 312 年）中，出土了一方犁田、耙田模型，呈长方形（ $16.5 \times 19\text{cm}$ ），分为二块，一块有人驶牛犁田，另一块有一人在驶牛耙田，而所使用的耙，竟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发现的水田“耖耙”。耖耙下方有六根较长的耙齿，上部有横木把手，耕者扶把操作，与今天广东农民驶牛耙田的情景基本相同。后来，在广西梧州倒水也出土过一方南朝时期的陶质耙田模型，所塑耖耙大体相同。这种耖耙，唐以前的文献不见记载，宋代《广韵》中始有“耖”字，南宋楼琬《耕织图诗》中始有文字记载，说明耖耙最早出现于广东，可能是广东人民或岭南人民的创造，宋代才传入长江流域其他地区。

三、最早实行生物防治

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304 年前后）记载了以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方法，说是交趾（包括广东、广西大部和越南北中部）人以草席包着蚁窠出售，“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复一完者矣”。这是世界上以虫治虫进行生物防治的最早记载。继《南方草木状》之后，唐末《岭表录异》、宋代《太平寰宇记》、《鸡肋编》、明代《种树书》、《物理小识》、清代《广东新语》、《岭南杂记》、《南越笔记》等许多文献均有记载。南宋庄绰《鸡肋篇》记载了蚁贩收捕黄蚁的方法：“用猪羊脬（膀胱）盛脂其中，张口置蚁穴傍，俟蚁入中，则持之而去，谓之养柑蚁”。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则介绍了广东土人“取大蚁饲之，种植家连窠买置树

头，以藤竹引度，使之树树相通”，以扩大其活动范围，提高其治虫效果。直到解放后，广东四会柑农仍用竹片在树间架桥，以便蚂蚁来往活动，名为“蚁桥”。根据罗格友·霍华德（1924 年）和贺辅民（1936 年）、陈守坚（1958 年）等中外学者的调查研究，黄蚁对毛虫、蜡象有显著防治效果，对潜叶甲、粉绿象甲、铜绿金龟子和危害柑橘的其他蚁类也有一定的防治效果，但对青羽翅衣、天牛幼虫却没有防治作用，与介壳虫类甚至还有共生关系。因此还不能说它是柑橘害虫的理想天敌。但在古代农药、器械和劳力都很缺乏的情况下，它确曾为我国南方的柑橘生产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广东人民首创的这种生物防治方法，如今已遍布全球，成为国际上害虫防治的主要方法之一。

四、最早施行鱼卵保存和稻鱼混作

唐代段公路《北户录》记载说：“郡人至八九月，于池间采鱼子著草上者，悬于灶烟上，至二月春雷发时，却收草浸于池塘间，旬日如虾麻子状，悉成细鱼，其大如发，土人乃编织藤竹笼子，涂以余粮或遍泥蛎灰，收水以贮鱼儿，鬻于市，号为鱼种。”这是有关鱼苗运输和人工保存鱼卵越冬的最早记载，较之汉代《陶朱公养鱼经》所载的利用天然成鱼自然繁殖，和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所载的在蓺泽陂池中捞取散落有鱼卵的泥土，铺于池底的自然孵化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唐末刘恂《岭表录异》则记载了新兴、罗定一带饲养草鱼的情况：“新泷等州山田，拣荒平处，锄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即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也。”说明早在公元 9 世纪以前，新兴、罗定一带人民已从江河中捞取鲩鱼苗，并把它作为商品销售。这是我国历史上家养草鱼的最早记载，说明当地人民已在生产上利用鲩鱼（草鱼）食草的习性，采用稻鱼混作的方式，进行稻田生物除草。直到解放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低塍田种深水

稻，还利用黑鲩鱼食草不食禾的习性，实行鱼禾混作，达到鱼米兼收的目的。

五、最早的荔枝和龙眼专著

成书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的郑熊《广中荔枝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荔枝专著，记载了22个广东荔枝品种，其中有些品种，如焦核、丁香、大将军、小将军、火山等一直到清代仍有栽培。可惜这本荔枝谱早已失传，幸好其所记的22个荔枝品种仍保存于宋代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五“方物”中。《郑谱》之后88年，即公元1059年才出版了第二本荔枝谱，即记述福建荔枝的蔡襄《荔枝谱》。

《龙眼谱》是清代道光五年（1825年）番禺赵古农写的专著，主要内容是介绍龙眼的别名、产地、品种、栽培方法和加工技术，同时也收录了不少有关龙眼的掌故和诗文，是我国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部专述龙眼的古农书。

广东在传统农业科技上的全国之最还有许多，诸如蕹菜水培法、鱼苗鉴别法、鱼苗运输法、棉花栽培、冬稻栽培……等，这里因篇幅所限便无法一一缕述了。

珠江三角洲沙田地区 水稻栽培制度的变迁

□ 彭世奖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室）

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珠江三角洲已有人类居住，他们从事渔猎、采集和原始农业。秦汉时期，在一些地势较高、开发较早的先进地区，已有双季稻栽培。但在三角洲内部，唐代以前尚未修筑堤围，大部仍属低洼沼泽地带，只能选择一些适合的地段进行“火耕水耨”式的粗放耕作。如果说《史记》、《汉书》等文献仍未指明岭南地区实行“火耕水耨”的话，那么南朝徐陵则已明确指出广州刺史欧阳颍的辖地是“火耕水耨，弥亘原野”^①了。唐代《禁岭南货卖男女敕》也说“岭南诸

州，居人与蛮獠同俗，火耕水耨，昼乏暮饥”。^②“火耕水耨”是一种怎样的栽培制度？至今仍无统一的意见，笔者认为，大体上是一种以火烧草（包括秸秆），不用牛耕；直播栽培，不用插秧；以水淹草，不用中耕的比较粗放的水稻栽培制度。^③由于这种栽培方式的单产较低，所以宋元以后便逐步为其他更先进的栽培制度所取代。但由于它巧妙地利用了水和火的力量，所以劳动生产率却不低，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也曾为广东省的水稻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宋元时期，由于珠江三角洲大规模修筑堤围，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提高了排涝抗洪能力，使不少原来的潮田、坦田变成围田，改单造为双造。广大低沙区，虽然继续实行单季栽培，但已较“火耕水耨”有所改进，如实行小苗移栽，适时排灌，有条件的还进行中耕除草等，从而使稻谷产量迅速提高，使广州成为闻名全国的米市，并有大批余粮支援南宋首都临安和福建等地。^④

到了明代，珠江三角洲又新修堤围181条，总长22万零4百丈，^⑤这不仅扩大了耕地面积，而且还促进了三角洲沙田区水稻栽培制度的变革。大致在元末明初期间，兴起了水稻的挣稿制栽培，即在早稻插秧后15—20天内，将晚稻挣插于早稻行间。早稻收割后，继续培育管理晚稻，直到再次收割为止。这种双季稻套作制，主要是在低沙田地区推行，因为这些地区到7—8月间往往积水难消，难于进行晚造的耕翻和插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多收一造稻谷，人们便创造了“挣稿”这种省工省力的栽培制度。最早记载这种栽培制度的是明代长谷真逸的《农田余话》（14世纪）。按照珠江三角洲的情况，挣稿制的亩产较之单季稻一般可增产100公斤左右，若按解放初期珠江三角洲约有挣稿稻300万亩计算，则每年可增产稻谷3亿公斤，这说明挣稿制的推行确实有其积极的意义。^⑥但挣稿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弱点：其一是株行距太宽，单产偏低，严重浪费土地；

其二是把早、晚稻种在一起，无法按照各自不同的生理特性进行管理。所以随着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它必然要为更先进的栽培制度——双季连作稻所取代。解放以后，特别是1953年以后，人民政府和当地农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兴修水利，调入耕牛、种子和其他有关生产资料，进行水稻改制工作。到1958年，“挣稿改翻耕”的改制工作已全部完成。据调查，挣稿改翻耕后每亩可增产稻谷71—227公斤，若取其平均值则为149公斤。按珠江三角洲原有300万亩挣稿计算，则每年可增产稻谷4亿4千7百万公斤。

上述珠江三角洲水稻栽培制度变迁史，充分说明水稻栽培制度的改进，确是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的战略性措施之一。

①《艺文类聚》卷52引徐陵《广州刺史欧阳顾德政碑》。

②《唐大诏令集》卷109。

③参见拙文《火耕水耨辨析》，见《中国农史》1987年第2期。

④宋代庄季裕《鸡肋篇》：“朝廷所仰，惟二浙、闽广、江南”。《宋史·孝宗本纪》：“淳熙九年正月，余广米赴行在（杭州）。”《宋史·辛弃疾传》：“闽中土狭民稠，岁俭则余于广”。真德秀《真文忠公集》卷22：“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

⑤《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二），第33页。

⑥参见拙文《论珠江三角洲挣稿制的兴衰》，见《中国农史》。

明清广东海洋农业之管见

□ 刘正刚

（暨南大学历史系）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广东自古至今，海洋区域之大，海岸线之长，均为全国沿海诸省区之最。海洋农业因此成为广东社会经济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以海为田的海洋农业开发，主要包括围

垦土地、渔业、盐业、种植业以及相应的加工业等。明清时期，广东沿海地区东至闽粤交界，西至今广西钦廉地区及海南岛。广东文献资料屡有“以海为田”、“洋田万顷”、“咸田”、“潮田”、“沙田”等表述，充分显示出明清时期海洋农业在广东的历史地位非同一般，广东海洋农业开发已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1、经营多样化。明清时期，随着广东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大及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海洋农业开发开始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围垦业、养殖业、捕捞业、制盐业、种植业以及相应的加工业等，各个行业逐步多元化。以养殖业而言，广东滨海地区即有蚝田、蟹田、蚬田、虾田等专业养殖，并且养殖与种植相结合的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等农业经营方式也普遍展开。养鸭业也颇兴旺。

明清时期，广东土地利用的格局已基本定型，其中围垦河汉、海滨、滩涂和浮露沙坦等成为滨海地区的主要土地类型。

2、具有明显的商业化特征。明清时期，广东人的商品意识颇为浓厚，粤人重商已是朝野皆碑之事。这一社会环境助长了海洋农业开发的商业化。这一时期，滨海地带种植甘蔗、蚕桑、水果、花生等经济作物十分普遍。与此相联系，制糖、丝织、榨油等加工业也较为红火。清人云：花生“海滨滋生，以榨油为上，故自闽及粤，无不食落花生油，且膏之为灯，供夜作，今已遍及海滨诸省，利至大”。（《滇海虞衡志》卷10）这无疑推动了广东海洋农业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养殖、制盐、捕捞等行业则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在此基础上，沿海地区一部分居民还逐渐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形成独特的商人群体。作为全国十大商帮之一的广东帮，其主体即是由沿海地区的广州帮和潮州帮所组成。商业化还表现在以海洋贸易来补农耕收入之不足。诚如时人云，广东“沿海人民借开洋生业者不可胜数……借此贸易之赢余，无不少补耕耘之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化典型地反映了海洋文化向外开放的特

性。但由于种种原因，广东海洋农业始终局限于“以海为田”的格局，未能走向“以海为商”的发展道路。

3、由近海不断向远洋发展。宋元时期，广东沿海沙坦的形成与开发，一般多依赖江河泥沙的自然淤积。但到了明清时期，沿海土地开发的人工因素大大增多，开发技术明显提高，人们往往能视水势之缓急，抛石沉海，形成石基，加速泥沙的淤积，不断开辟新田地。“洋田万顷”、“潮田”之类记载，在文献中颇多，出现了稻田轮作或稻鱼共栖的农业景观。伴随沿海土地面积不断扩大，障海堤也不断向海洋深处拓展，由原来护咸田（旧沙）扩展到护潮田（新沙），通过旧沙——新沙——旧沙——新沙的不断良性循环，一方面实现了海洋资源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国土可耕地资源。这一时期，海水捕鱼业也由近海发展至远洋。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广东人积极向海洋拓展生存空间的坚强意志。

4、台风暴潮灾害加剧。广东是我国沿海地区受台风暴潮危害最严重的省分。而滨海地区的农业又首当其冲。明清以来广东沿海各地撰修的文献资料对台风暴潮灾害多有记载。据学者统计，广东的风灾（主要是台风和龙卷风）在明朝以后骤增，造成的灾害也更大。每年夏季的飓风暴潮，不仅使“沿海禾稼田庐多被淹没”，而且还造成无数人畜丧失生命。

5、生产关系日趋复杂。明清时期，由于“倭寇”、“海盗”猖獗，沿海边民起义不断发生及西方殖民者东来等因素，政府的海防观念有所增强。为了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实行了海禁、迁海政策，严重遏制了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发展。在广东，由于围垦沙田利益丰厚，民间争沙纠纷日趋增多，生产关系趋于复杂。政府因此制定了有关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法规，如规定“凡浮生沙坦，悉以入官，官募民耕种”，围垦者要“报税”，“承饷”；规定渔盐户要交纳“渔课”、“盐课”等。

总之，明清时期广东异军突起，迅速

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商业兴旺的经济区域，这与广东人“以海为田”，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发展商业性开放型的海洋农业不无关系。

岭南蚕业的起源 及其技术发展

□ 黄世瑞

（华南师范大学）

养蚕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考古学家曾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半割的茧”（距今约 5600—6080 年），又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一批丝织品（距今约 5260±135 年）。此外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原始社会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不少当时的纺织工具。这些出土文物雄辩地说明了我国蚕业历史之悠久。

至于岭南，目前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至迟到汉代已有了蚕业，其开端究竟在何时，现有文献不足征，有待于今后“地下博物馆”的逐步发现和开发。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古文献记载来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蚕业比岭南地区要早得多。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岭南的蚕业是由黄河流域经长江流域传过来的。但此说并无直接的证据。有人认为，如果说是由黄河流域经长江流域传入，照理应该在传播路线上有一个逐步推移的过程可考，但目前所知岭南与中原的中间过渡地带东汉初尚无蚕桑，而岭南在西汉时即有比较发达的蚕业了，中原蚕业如何飞越过这一中间地带从空而降就不好解释了。

另外从蚕的化性来看，北方品种是一、二化性，岭南多是多化性种（亦有带有南方特性的二化性种）。有人曾把印度、泰国、越南等地的多化性蚕种和半野生状态的桑蚕种同广东蚕种进行比较，认为广东蚕种和印度或东南亚蚕种比较相近而与中国北方的品种差异较大，因而断定广东蚕

的品种和养蚕技术来自泰国、越南等地。

家蚕是由野生桑蚕驯化而来的。先民们最初是收集野蚕茧，用以织作，继而将野生桑蚕带回家中饲养，慢慢驯化为今日的家蚕，野生桑亦经过先民们的精心栽培管理而慢慢变为栽培桑。像这样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利用野生动植物的能力，是各地先民所共同具备的。古代岭南地区的野生桑树野生桑蚕的资源丰富，故不必待其他地方传入，岭南先民自己也会发明养蚕。也就是说岭南蚕业的起源问题不必求之于外，岭南的蚕业应是岭南先民在生产实践中自己发明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北方蚕业技术没有进入岭南，不过那已是后话了。

大约在明代中后期，珠江三角洲蚕区人民创造了“桑基鱼塘”这一养蚕养鱼的生产形式。据《高明县志》记载，这种生产形式是“将洼地挖深，泥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因为珠江三角洲地势卑湿，多低洼之田，易受水淹。而“桑基鱼塘”的生产形式化害为利，深挖洼田为养鱼，高筑基以种桑，不但避免了水涝，收到了“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而且略近于今日所称的生态农业立体农业，收到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它把桑、蚕、鱼、塘泥有机地结合起来，水陆相互促进，环环相扣，构成一个良性循环。蚕屎可喂鱼，污泥可培桑，前一环节的废料可作后一环节的养料，无污染环境之虞，很好地保护了生态环境。桑树枝叶可伸展于塘面之上，充分利用了空间。

“桑基鱼塘”这一生产形式在国际上亦有一定的影响，受到相当的重视。如联合国大学副校长曼斯哈尔德（W·Manshard）参观顺德的桑基鱼塘后说“基塘是一个很独特的水陆资源相互作用的人工生态系统，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他认为“桑基鱼塘”可以“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世界各国同类型的低洼地区也可以这样做”，并主动提出以联合国大学的名义，资助经费，对

“桑基鱼塘”进行研究。

“一生衣食素馨花”

□ 魏露苓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室）

素馨原名“耶悉茗”，由西亚传入我国。据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耶悉茗花、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传入的时间，当在公元前二或前一世纪中国与阿拉伯有官方通交之后，或在更早的民间海上贸易开始之后。①也有人认为是汉代随佛教的传入而顺便被引进到中国南方各地的。②广东省具有湿润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和肥沃的土壤，古代广东人又喜爱用鲜花装饰自己，“无分男女，有云髻之美者，必有素馨之围，在汉时已有此俗”。③这样，“远方来客”素馨花便得天时、地利、人和而在岭南大地安家落户。

据称，“耶悉茗”得名“素馨”，与南汉后主（刘铨）的宫廷轶闻有关。有一位司花宫女名叫素馨，美丽绝伦，喜戴耶悉茗花。宫女死后，后主命人在她的墓上栽种此花。墓称“素馨斜”，花亦因此得名。④宫中偏爱素馨，影响到民间的时尚，从而推进了素馨的种植和发展，使之在栽培花卉中占了优势。当时广东人言“花”即指素馨，如同洛阳人称牡丹为“花”一样。明朝中期后，广东的花卉业形成了商品性集中产区，所种花卉仍以素馨为主：“珠江南岸，有村曰‘庄头’，周里许，悉种素馨，亦曰‘花田’”。“广州有花渡头，在五羊门南岸。广州花贩每日分载素馨至城，从此上岸，故名‘花渡头’。花谓‘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⑤

素馨花与古代广东人民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除装饰秀发之外，还做成各种工艺品，用来美化平日生活，也用于节日庆典或祭祀活动：“广中七七之夕，多为素馨花艇，游泛海珠及西濠、香

□ 张寿祺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浦。秋冬作火清醮 (古时的一种祭祀活动——笔者注), 则千门万户皆挂素馨灯, 结为鸾龙诸形; 或作流苏、宝带蕙蕤, 间以朱槿以供神; 或当宴会酒酣耳热之际, 侍人出素馨球以献客, 客闻寒香, 而沉醉以醒, 若冰雪之沃乎肝肠也”。⑥他们也利用素馨花熏酒、熏茶或从中提取芳香油来制作面脂、头油、香料等。⑦当时的广东人把素馨和当地另一特产——槟榔一同看得十分珍贵, “献客者先以槟榔, 次以素馨”。

⑧

由于用途广、消费市场庞大, 素馨花长期产销两旺。凌晨天未明, 珠江南岸的花农就开始采摘。花商过江购回, 送往市场。“一时穿灯者、作串与瓔珞者数百人, 城内外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 贫者以升, 其量花若量珠然。”⑨清代黄子高有诗云: “黄蜂队队雀查查, 辛苦年来为种瓜, 悔不庄头村里住, 一生衣食素馨花。”显然, 种素馨的经济效益超过种植蔬菜。

清军入粤后, 广东花卉业惨遭破坏。清政府强令人人剃发, 改变了粤人原来的发式, 使得“花无所著”。⑩素馨种植跌入低谷。道光年间,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广东花卉业得以复兴。此时的花卉栽培走上了种类、品种多样化的路子。但是, 素馨仍作为香料原料而占有一席之地。

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南方草木状考补》,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1年1月, 第75-83页。

②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南方草木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农业出版社1990年2月, 第217页。

③⑤⑥⑧⑨⑩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草语》卷27。

④参见清·梁廷楠《南汉书》、清·吴绮《岭南风物记》、《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42“广州府二”等。

⑦参见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四、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草语》。

在封建王朝的士大夫所留下的诗文中, 谈及岭南水上先民, 均说他们不懂农耕。南宋杨万里《户》一诗最为典型: “天公吩咐水生涯, 从小教他蹈浪花, 煮蟹当粮那识米, 缉蕉为布不须纱。……” (据四部丛刊本《诚斋集》卷十六) 认为水上居民连粮米也不识, 莫说种棉花了。清代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一千三百九十八卷“广西总部杂录”也说: “又有人, 世世以舟为居, 无土著, 不事耕织, 惟捕鱼供食……”说法同出一辙。

笔者于40年代起, 先后在广东东、西、北三江, 广西浔江、邕江、柳江, 作过多次实地调查, 行踪远至桂西北三江县与黔东南接壤处。80年代, 更得到以杨振宁教授为主席, 设于香港的“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资助, 集中于珠江口进行4年实地调查。得知水上先民对广东沙坦围垦以及沙田耕作, 均作出过非凡的贡献。

广东沙田构筑和耕作远在公元1世纪经已存在。1973年佛山市澜石东汉墓出土的水田和农艇模型, 便是一个证明。珠江三角洲地段, 江河水流缓慢处, 时时会出现沙坦, 近海江水出口的海滨, 淡水与咸水交汇处, 由于咸淡水比重不同, 更容易淤积成泥坦。在历史上, 把这些泥坦构筑成为一大块一大块基围 (即沙田), 乃由一群群操泥工的水上居民。耕耘这些沙田, 构筑沙田内的排涝和灌溉工程, 概由水上居民为之。他们还养鸭, 以鸭消灭蝗蝻, 消灭蟊螟, 保证禾稼不受侵害。珠江三角洲是个丰裕的粮仓, 这与水上先民的劳动与开拓分不开。(详见拙作《家人》112至122页, 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11月版)

其次, 广东广大农村的池塘养鱼, 水上居民也作出过较大贡献。解放前, 人们

还未能创造出人工培育鱼苗的方法。当时，农村所辟的池塘养鱼，鱼苗乃出自肇庆峡。每年春水涨，南海县九江镇以及三水县、高要县一些水上居民，群趋肇庆峡捞捕鱼苗，再运往九江集散。明末清初屈大均《经高要诸村墟作》六首诗均有所纪述。第二首说：“西截江水，人家半捕鱼。”第三首亦说：“一路鱼花步，江人取不稀。”第五首又谓“九江鱼种户，三水家村。”（见《翁山诗外》卷九）

解放前，岭南人所吃的塘鱼，与水上先民捞捕鱼花（即鱼苗）的劳动固然有关。平常所吃到的河鱼以至大量的咸水鱼，也与广大水上居民的辛勤劳动有关。

从以上所列的事实，可知水上先民对广东农业以及渔业的发展，都曾作出非凡的贡献。

浅谈明清广东山林砍伐 及其经验教训

□ 倪根金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室）

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膨胀、工矿业的发展和玉米、红薯等新作物的大规模引种，使得广东山区开发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并使广东森林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当时砍伐森林活动遍布广东各地。如从化“流溪地方深山绵亘，林木翳茂，居民以为润水山场，二百年斧斤不入。万历之季，有奸民戚元勋等招集异方无赖烧炭市利，烟焰薰天，在在有之，每炭一出，沿溪接艇，不数年，群山尽赭”。（《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八《广东二》）又博罗县：“邑多崇山峻岭，木皆可材……而土人只以薪。罗浮之种蓝，象山之烧炭，焚刈不遗余力，山几秃矣。嗟乎，灵山异境顾令若此其濯濯也哉”。（[乾隆]《博罗县志》卷之九《物产》）在粤西，德庆州沿江两岸，长有茂密森林，瑶人常借林掩护进行抢劫。为此，明正德朝兵部尚书吴桂芳指

出：“所倚者，两江茂林。今惟督兵沿岸开山伐木，且耕且守，制其出没。”朝廷从之，“于是，自南江口下至新村降水一百二十里，各辟地深八十里”。（[光绪]《德庆州志》卷十五《纪事》）加上当地“山民多烧枫桃，淋灰作碱，烧都树槎根为治炭，利之所在，搜剔靡遗，木根尽则山枯”。（同上书卷四）又东安青旗山“树木茂密……康熙癸己，岁大饥。乡人诣庙，乞以山木赈。许之。自是斧斤相寻，遂成濯濯云”。（[道光]《东安县志》卷一）再西宁：“树木丛翳，数百里不见峰岫。广人皆薪蒸其中，以小车输载，自山巅盘回而下，编乘涨，出于罗旁水口，是曰‘罗旁柴’”。（《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至于珠江三角洲，山林砍伐更早更甚。香山县：“自花树坛以东，南台以南，多深山大林……弘治以来，樵夫深入，斤斧以畀……嘉靖中，异县豪右纠合乡民，无所不到，其巨木以为材，其杂木悉以为炭，获利甚富，趋者益众。南台以南，山渐以童，而焚炭之气与日争赭”。（[嘉靖]《香山县志》卷二《民物志》）等等。总之，“到了清末，在广东全省，除粤北山区、粤东地区的东北部山地、粤中粤西的偏远地区、海南岛中部山地和雷州半岛南部等地方还有比较茂密的森林外，其他大部分地方因天然林屡遭破坏，已经成为荒山秃岭，到处童山濯濯了”。（张镜清等《广东森林历史变迁初探》，刊《农史研究》第九辑）

山林大规模砍伐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促进了山区的开发，因为“瘴之起，皆因草木之气”，（《广东新语》卷一《天语》）而砍伐密林，有助消除瘴气。同时，毁林也是迈向山地垦殖的第一步。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度砍伐也带来了不少环境生态问题。首先，它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使沃土变沙石。如从化流溪地区，由于“山木既尽无以缩水，于是溪源渐涸，田野多荒”。（《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又德庆州金林乡，林毁之后，“遍皆沙岗，淫雨比岁，堕颓日甚，腴田大半变沙陆”。（[光绪]《德庆州志》卷四）

其次，导致水患频仍。清代就有人指出：“上游诸山童且崩，泥沙随水入江，江底愈积而愈浅，淫霖为灾，潦至弥速，江浅则容水少，而泛滥之势成”。（[光绪]《四会县志》）又据今人统计，历史上广东水灾，“宋朝约 17.8 年发生一次较大祸害，元朝约每 5 年一次，明朝每 1.7 年一次，清朝每 1.1 年一次”。（梁必骥主编《广东的自然灾害》第 50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其中明清水灾频率倍增，便是这一时期毁林的报应。第三，加剧了一些动植物的灭绝。如香山县“按食货，成化以前犹有蜂蜜、黄蜡，今山林多为薪炭，则久无此货矣”。（[嘉靖]《香山县志》卷二《民物志》）又“生深山乔木上”的孔雀，明代以前在广东分布很广。但到清初，全省仅“罗定山中间或有之”。（《岭南杂记》下卷）“鹿，开州（即罗定州）之初深林丛箐，诸山犹能供鹿祀丁，古有而今无矣”。（[民国]《罗定志》卷二《物产》）另民国《阳春县志》卷一下《物产》也说：“旧志云：‘阳春深山巨谷，林木蔚茂，羽毛鳞介聚族蕃滋……迺者，人烟稠密，日就芟夷。’旧志所纪紫荆、楠、桂、熊羆之属，皆俱乌有矣。即寻常器用亦资他邑，此山童泉涸而货财所以日匮也。”并呼吁：“关心民瘼者乌得不严山泽之禁。”

历史的教训值得借鉴。在南粤经济快速发展，山区开发日趋广泛，同时自然灾害、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日，回顾明清广东山林变迁历史，或许可给我们一些警示和启迪：即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切不可只重经济增长，而轻环境保护；只图眼前好处，而不顾长远利益。否则，终将前功尽弃。

宋代珠玑巷移民 对珠江三角洲的开发

□ 曾昭璇 曾宪珊
（华南师范大学）

宋代有大批北方移民经由梅岭驿道南

下到珠江三角洲地区。今天，珠江三角洲仍有不少族姓认为其先人是珠玑巷移民。

宋代珠玑巷迁到珠江三角洲的移民有以下几种类型：

1、据族谱记载，南下迁民不少是知识分子，即知书识礼的。据杨宝霖统计，东莞进士在宋代有 33 人，属于珠玑巷迁民后人的有 13 位，占全部进士的 39.4%。南宋最大规模一次南迁的领队罗贵，即为“贡生”。同行的麦氏 5 兄弟共 200 多人，长兄必荣是奉政大夫，次必秀是进士。

2、南迁民众贫富不一。富者如中山小榄《麦氏族谱》载，王必雄帝昺时出谷赈济。《易氏前谱考证》亦记：“（易绍文）弃产扶资，入广之城南小市街石亭巷居焉。”而贫者如南海和顺小布庞氏，据《佛山地名志》载，宋末有人来此“搭寮养鸭”，据笔者调查，和顺官窑谢边，亦珠玑巷南下迁民，在滩边搭寮（茅草屋）养鸭为生。又如西樵平沙李氏，据《佛山地名志》载“南雄南逃民李隅公之子，到此开荒耕种（1222 年）。”

南下迁民从分布情况来看，多在平原及河道纵横地区，坦地（新增河边滩地）当时尚未开垦，多为无主荒地，成为南迁人士最理想的立足点。因此，宋代南雄珠玑巷迁民对珠江三角洲的开垦，有如下特征：

（1）集中在河边坦地。

珠玑巷迁民的开垦以坦地为主，因除少数有钱迁民可买土地外，大部分人为了逃避地主豪绅的压迫，多找河边坦地开垦。如罗贵等人誓词即有找“烟瘴地面，土广人稀”的地点，因为这些地方多是“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见市桥《谢氏族谱》）

（2）用筑堤技术抗洪，使坦地保收。

珠玑巷迁民择地安家后，即建堤防洪，这是与建村同时进行的。新会周郡的周、谢、黄等姓，即记合力建村筑堤事。三水白坭村分支南岸立村时，亦记有同时筑堤防洪之事。中山小榄小围亦记有“由珠玑巷十四姓迁民倡修。”

日本侵华期间的地图测绘

□ 朱竞梅

地图的测绘和应用在战争中举足轻重。从 1874 年日本军事人员在我国台湾岛琅玕(今恒春一带) 测量绘制地图^①起, 此后 70 余年, 为侵吞掠夺中国领土和资源, 日本各类机构先后在中国领土上测绘了无数幅地图。这些地图成为历史的缩影, 为我们今天进行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整理分析了北京图书馆几十年来入藏的日本侵华 70 余年间(1874—1945 年) 在中国领土上测绘的部分地图, 总结其专题类型和绘制形式以及测绘机构的性质, 研究测绘活动体现的阶段特征, 指出地图的利用和保存价值, 并为有关学科工作者提供一条资料线索。

一、专题类型和绘制形式

1、多种多样的专题类型

北京图书馆入藏有数百种日本有关机构和人士于明治、大正、昭和年间直至战争结束在中国领土调查测绘的地图。从地域范围来看, 有全国总图, 连省合图, 东

三省及蒙疆各地区图, 京津、河北、山东地区图、华北、华中、华东、华南、中南、台湾等地区图, 可见当时日本在中国大部分领土上都进行过地图的调查和测绘。

丰富多样的专题类型是日本侵华期间测绘活动的主要特征。体现在测绘成果——地图之上, 有政局形势图、中国政府的国际关系地图、战争形势图等政治地图; 有地形、交通等军用地图; 有地质调查、气象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地理图; 有水利、河运、农村、工矿、港口、城市、商贸、流通等经济和资源地图; 有宗教、人口、民族、民俗、语言等历史和文化地图……。还有各专题综合而成的地图册和地图集, 例如 1941 年“兴亚华中联络部”以“支那东部二百五十万分一图”为底绘制的《支那建设要图》, 就包括 21 幅专题地图, 分别反映当时中国东部鸡蛋、猪毛、桐油、棉花、大米、小麦、煤、铁等资源的生产及流通情况, 并与华北事变前作比较; 此外还有反映日本人在华分布、在华主要文化设施分布、军事管理工厂、电力

筑堤的效果很显著, 珠玑巷迁民每有几代即成富户的记载。如东莞翟氏即有记: “凡可以养生之物, 靡不蓄之植之, 不数年, 家益贍饶。”(《琴轩集》) 据史料记载, 宋代珠江三角洲粮食丰收, 可供养南宋朝廷及闽省各地。如《宋史·孝宗纪》云: “淳熙九年(1102 年) 粿广米赴行在(杭州)。”吴自牧《梦梁录》云: “每日街市食米……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

客米来到。”又宝庆《四明志》卷四云: “至取米于广州以救荒。”又真德秀《真文忠公集》云: “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 以给民食。”直至元代初期, 珠江三角洲仍属产米外销之区。《元史·食货志》云: “禁广州官民毋得运米至占城诸蕃出粿”即为一例。今天珠江三角洲之富亦当与宋代珠玑巷南迁人士有关。

本栏责任编辑: 郭秀文

并制铁所、在华金融投资与贸易现状以及反映中国财政建设、交通通讯建设、各类重要工厂、对日资源供给、矿产分布等方面的专题地图。这种综合了多种专题类型的地图集，直观地反映了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和掠夺方策。另外，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全面侵华战争中绘制的大量战局形势图和军事地图，也十分有助于揭示战争中的种种问题。

2、注重实测的绘制形式

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绘制的地图，大部分是在原有中文底图之上增绘其调查和研究成果而最终绘成的。它们的版框规格、幅册大小和装帧形式多种多样，比例尺 1:100 至 1:8000000 不等，并都绘有经纬网。这些地图重视色彩及符号的利用，以细致而丰富的图例，来强调图幅中区域的不同和内容的差异。地图上还往往叠加线状符号，表明事物的动态演变趋势，并附图表说明及文字注释。以上绘制形式，不仅增加了地图的信息量，而且加强了它们的实用性和时效性。

以日本人川端原太郎 1908 年绘制的彩色《营口全图》为例，它是在 1890 年中文《营口全图》基础上加绘而成。二者尺寸大小、比例尺、色彩应用完全一致，但前者在后者基础上加注了营口厅属、英人及日人置买之地，并补注鸭岛。城区依旧图，城郊补注土地丈量底线及占地亩数。图幅空白处又附“营口沿革”、“自营口至各重要港海里表”、“自营口至各驿里程及价钱表”及“近几年港口货物输入输出情况”等图表说明，图背面为企业广告，反映了当时日本测绘事业已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某些机构和人士在中国进行的各种专题性社会调查及地图绘制。20 世纪初期，中国官方尚未充分认识到以数量统计的方式调查和研究本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之时，日本人就已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其调查机构和人员本着“服从于政治”的原则，除了以当前时事问题作为调查对象，还从事经常性的基础调研，企图从根本上了解中国，实现

其侵略中国并进行殖民统治之目的。这些调查结果，以地图的形式描述出来，产生了许多反映当时中国教育、医疗、宗教、文化、民族、民俗、语言、产业、自然条件、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地图，这种社会调查方法对当时中国学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此外，日本人在绘制这些专题地图的同时，还引用了西方一些新的学科理论思想及地图绘制方式。以 1937 年发行的《最新新江市街地图》为例，这是一幅绘制精细的当时“新京”（今长春）城市规划图，是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的指导下完成的，充分体现着后藤新平仿效西方城市规划、注重实用和备战的城建思想。②该图用现代规划设计方法，绘出各类市区道路、居住区、商业用地、市政设施、广场、公园、神社、娱乐场所、工业用地、粮栈、“教育”和“教化”团体设施、邮政、警署、铁路、沟渠、桥梁等各类城市要素的布局情况。总体来看，居住地、学校、“教化”团体分散于新旧城区，商业用地大分散小集中；公园沿水体开辟，并建市内广场；老城区保留，新的城建设施向外发展；工厂和传染病院设在北郊和西北郊，以减轻对城市的污染；道路规范，等级分明。此外，还设有“大陆科学院”、“大同学院”、“中央警察学校”、“商业学校”、“家政女学校”等“教育”机构。以上特点，充分体现了后藤新平把他著名的“文治军备论”③应用到城市规划中的思想。

二、主要测绘机构

测绘机构的性质决定着地图测绘活动的性质和目的。从地图上分析，日本侵华期间在华测绘机构和人员主要归属为三类：

（一）直属日本政府、军部的调查机构或朝野机关。主要包括：

（1）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及其下属分支机构。如满铁驻各地事务所、北满经济调查所、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等。满铁作为

日本侵华最大的“国策会社”，它不仅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而且还具有类似日本政府的职能。其机构庞大，人员广布，有政客、军人、学者、科研人员及浪人各色人等，从事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经济、资源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因而其地图测绘也以这些内容为主。

(2) 部队直属机构。如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冈村部队参谋部、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多田部队测量班等。其地图测绘多与军事和战争直接相关，侧重于交通、地形、驻防等内容。

(3) 日本政府或伪政权直接或间接支配的“学术调查”团体。如东亚同文会、东亚地理调查会、东方史地研究会、中日文化协会、大民会本部宣传部、时局地图普及会等。其地图大多有关文化、自然科学、政治各专题。

(二) 日本政府或伪政权设立的新闻出版机构。如满洲日日新闻社、大阪朝日新闻社、蒙疆新闻社等。其主要在报纸、刊物上发行一些反映时事和战局的形势图。

(三) 日本书院及会馆。如东京伊林书店、大阪屋号书店、三教书院、东京兵林馆等。主要发行历史、文化地图。

总之，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领土上设立了名目繁多的机构，它们派出人员深入各地，收集情报，绘制地图，成果颇丰。从而使地图测绘更加受到重视，地图数量也逐年增多。

三、测绘活动的阶段性特征

如果把日本侵华期间地图测绘所涉及的地区和专题放到战争逐步扩大的过程中考察，可以发现其测绘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暂且把它分为三个时期：

(一) 开拓视野时期 (1874—1905年)

从侵占台湾、吞并琉球、入侵朝鲜到插足东三省，日本帝国主义在武力侵略的同时，成立了隶属参谋本部，负责调查从我国东三省到西伯利亚、库页岛、堪察加

和从朝鲜到我国沿海的地志和政情的“管东局”和“管西局”。早在1874年，日本就曾派遣军事人员在台湾岛瑯琊（今恒春一带）登陆，侦察并绘制了地图，这也许是近代日本官方在中国领土上测绘的第一幅军事地图。^④中日战争时，荒尾精脱离军界，建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并以之为据点收集情报，成为日本在中国调查编制军事地志的雏形。^⑤1898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会继承了其工作性质和方法。这时日本已在中国出版了大量书籍和地图，以至它在1903年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中，要求清政府制定章程，对日人以中文编制的书籍、地图、海图等版权给予保护。^⑥这种要求和规定，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扩充其文化势力的动向。此时期对中国大陆强烈的求知欲望，使日本人集中出版了一些反映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的书籍和地图。如1904年东京文学社出版的《东洋历史地图》，反映中国自周朝到清中叶的历史地理沿革。在其扩张势力范围及开辟租界的过程中，关于这些地区的地图也逐渐增多。如1878年日本陆军文库编制了《清国北河总图》，1898年陆地测量部绘制了《台湾图》等。在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的特殊时期，还产生了大量战争形势图和军事布防图。上述种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中国领土上开疆拓土的前奏。

(二) “开发”东三省及窥探华北时期 (1906—1935年)

1905年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得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以及其沿线支路、煤矿、相关权利等，从而取得它在中国大陆上的第一块基地，并以此作为侵略中国的北翼。此后，日本军队、商人、政客、调查及游历诸色团体，源源不断来到中国，由东三省南部深入到北满、蒙疆各地，从事各种情报的调查收集和地图测绘活动。满铁作为日本侵华最大的“国策会社”，其人员遍布农村、工矿和城市，对各地的农、工、商、矿产、军事情报、医疗设施、民俗、语言等方面作了细致的调

查，并绘制了大量地图。如北京图书馆收藏的1917年《满蒙现势图》，就是满铁为陆军参谋部测量绘制的。^⑦而满铁、关东厅于1926—1932年绘制的系列“满洲国全图”，已经明确划出自成一体的东三省及内蒙地区，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即将策划和炮制满蒙独立、建立附庸于日本的“（伪）满洲国”的阴谋。为在政治和文化上充分实现殖民式的同化、奴化，在经济上榨取掠夺中国人民，它采用所谓的“积极政策”，攫取满蒙新五路，建立经济协定草案，并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进而纠集辽、吉、黑、热河、内蒙汉奸势力，于1932年9月，在日本政府直接指使下设立了“（伪）满洲国”。在此期间，以满铁为中心的日本侵华机构调查绘制了诸如《大连港变迁图谱》、《南满松豆牧流域林相图》、《东部内蒙古支那语言及状态一览图》、《满洲资源调查地域图》、《满洲区别可耕地对既耕地割合图》及《大满洲产业地图》等，使“开发”和“经营”东北地区的情形跃然图上。

其时，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华北地区已窥视良久。1906年大清通运公司发行的《京汉铁路经过路线图》和《山海关内外吞吐量平面图》等有关华北交通和经济的地图，就暗示了日本对华北地区的关注。对于台湾岛及华东、华南沿海，包括山东半岛，也有地图记录下日本在这些地区的调查测绘活动。北京图书馆就收藏有“台湾地质、油田图（系列）”、“青岛港口、城市图”等。1933年热河战役后，^⑧日本侵略军的铁蹄终于踏入关内，并于1935年6、7月迫使《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相继签订。此时，其入侵中国华北的野心便昭然若揭了。

（三）疯狂的调查和掠夺时期（1935—1945年）

从1935年“华北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为入侵华北作准备，日本政府、军部及满铁等朝野机关，争先恐后来到华北进行经济调查，制定出各式各样的“开发”华北方案。“七七事变”后，侵

华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华中、华东、中南的部分重要城镇、道路相继沦陷。为加紧掠夺资源以补充军需，日本政府先后设立了“兴中公司”、“华北事物局”、“华中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华北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兴亚院”、“华中铁道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依照所谓《日满华经济建设要纲》，对占领区经济进行“开发”和统制。这些“国策公司”在其“开发”和掠夺的过程中，绘制了大量地图作为参考。

实质上，此时日本已经“把满洲国的铁路、经济、政治、军事和其它一切方面当作高于保护国地位的性质加以处理”。^⑨在舆论界、出版界、影视界和教育界建立了其文化统治机构，企图使东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迅速趋于殖民地化。为把东北完全变成日本侵华大后方及资源供应地，侵略者加紧了对农村、工矿、城市各种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并着手进行了一些基础建设，同时扩大日本向东三省移民的规模。这时期在“（伪）满洲国”所绘地图，大多有关水力、矿产、农副业、交通、贸易、城市建设等专题。例如《巴彦喀拉盟产业图》、《满洲南部地质全图》、《关东州水资源调查图集》、《满洲开拓农民人植图》、《满洲经济地图》、《满洲森林分布图》、《厚和省国土计划说明略图》等，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强取豪夺的丑态尽展眼底。

华北、华中、华东的内陆和沿海地区，有丰富的煤、海盐、棉花、铁、金矿、皮革、羊毛等日本急缺的战略物资。1935年7月7日，以满铁为中心的“华北事业经济调查团”由长春抵津，预定在平、津、察、冀、鲁、绥等地对贸易、金融、纺织、农业、铁路、矿山、制铁、水道等进行调查。1937年7月战争全面爆发，调查活动也迅速发展至华东、华中占领区，各种“国策公司”加紧了对中国资源大规模的疯狂“开发”和掠夺。地图测绘方面，相应出现大批以经济资源调查、经营和流通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地图。如《北支铁矿硫黄

矿石炭资源图》、《华中铁道沿线资源图》、《中支占据地域内作战用重要资源生产消费及流动概况图（鲜鱼及盐干鱼）》、《上海港计画图》以及1939年东亚研究所绘制的综合反映中国东部锡、锰、钨、锑、铁、煤等矿产及米、牛皮、猪毛、小麦、茶、羊毛、桐油、棉花、麻、蚕丝等资源的分布及生产流通图集。这些地图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疯狂经济掠夺和统制的最真实直观的反映。它们与当时大量的战局形势图相互对照和印证，将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发挥重要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侵华70余年在中国的地图测绘，完全是它发动侵略战争并在占领区进行经济掠夺与统制的反映。各种调查测绘的机构与团体的踪影，直到战争结束后才逐渐烟消云散。它们在中国绘制的地图，连同掠夺到的书籍和文献，战败时部分被运往日本本土，部分被盟军缴获，还有一些毁于战火。现在中国的大连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等图书档案资料中心和有关研究部门，以及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图书馆和档

案资料收藏管理机构都有保存。研究这些地图，我们可以更充分地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的殖民地经营路线，并对回答近代史有关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①⑥⑧⑨《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12、92、377、559页，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②《后藤新平》，（日）鹤见辅，东京，1955年。

③《满铁调查部内幕》，（日）草柳大藏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④1874年在瑯玕（今恒春）登陆并绘制地图的所谓“台湾生番探险队”，实际上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支侵华军（参见《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在此之前，日本官方未能有机会在中国领土上测绘军事地图。故本文有此说。

⑤《满铁调查部内幕》第87页。

⑦《满铁调查部内幕》第203页：“提起满蒙地图，只有陆军参谋部一幅很粗糙的《满蒙现势图》……在调查其风俗和资源的过程中，应同时绘制出一幅适当的地图。”

作者朱竞梅，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舆图组（100081）

责任编辑：郭秀文

浅谈宋代妇女的就业

*

□ 吴旭霞

在中国封建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下，妇女所做的大多是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这种传统经济角色，客观上使妇女失去了社会地位及权利，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宋代妇女也大致如此。但比起前代，宋代妇女的状况略有改观，一些妇女，主要是中下层妇女，开始投入了社会劳动中。本文试图对宋代妇女的就业状况作一分析，以从中了解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

—

宋代妇女就业的种类不是十分广泛，主要局限于服务性、商业性、手工业等行业。

(一) 与农业、家庭手工业相脱离的纺织业等
在宋代，妇女就业在很大程度上仍遵循着传统的“男耕女织”的习俗，即以纺织业为职业，与农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宋人的著作中，

多称她们为“蚕妇”。如《司马光奏议》卷33“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元丰八年九月上）就说：“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这里的“蚕妇”主要是指家庭手工业者，其劳动谈不上是一种职业，只是在家中利用空余时间做的一种补充家用的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许多妇女已冲出家庭，成为与农业相脱离的手工作坊（机坊）主或雇工。《宋史》卷355《贾易传》载：“（贾易）无为人，七岁而孤，母彭氏以纺绩自给，日与易十钱，使从学”。“都昌妇吴氏，……为乡邻纺缉……扫除之役，日获数十百钱，悉以付姑，为薪米费”。①“婺州根溪李姥，……但余一孙，七八岁。姥为人家纺绩，使儿守舍。”②又“（荆湖北路）尝有穷妇负租而逃，公（指黄瑀）宽其期以召之，来则使之佣织于人，以渐偿所付”。③

宋代妇女不但使纺织冲出了家庭，还把诸如缝纫、制鞋帽等发展成为她们的就业门路。在宋朝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相国寺，每月开放5次，让百姓自由交易。其中有两处走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等。④不但如此，甚至养猪也成为妇女们大显身手的行当。《夷坚志》三志己卷二《姜七家猪》记载：“姜七之祖婆，缘在生之日，专养母猪，多育豚子，贸易与人，一岁之间，动以百数，用此成立家计”。

(二) 商业

宋代的商品经济十分繁荣，大大超过了前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宋代妇女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宋代，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很多妇女都投入了商品经济的大潮，开旅店，如“庐多逊南迁朱崖，逾岭憩一小店，店姬举止和淑，颇能谈京华事”；⑤做小买卖，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⑥川东地区“有妇人负酒卖，亦如负水状，呼买之，长跪以献”。⑦经商贩卖的妇女数不胜数，有些人甚至成为富婆。如“宋五嫂者，汴京酒家妇，善作鱼羹，至是侨寓苏堤。光尧召之，询旧凄然，令进鱼羹，人竞市之，遂成富媪。”⑧《夷坚甲志》卷20《一足妇女》记载，南宋绍兴

* 本文所指的妇女就业，采取以下定义：妇女参与家务劳动以外的、有独立计量收入的经济活动。

十七年“泉州有妇人货药于市，二女童随之。”其有助手相随，规模一定也不小。

由于妇女经商人数的不断增加，男人对她们收税有诸多不便，于是在一些税场，出现了专门检查旅程上妇女，以防止她们偷漏商税的女栏头。据《庆元条法事类》卷36载：在池州雁汊、黄州、鄂州等地，税务对商旅洗劫，“或用舟船绞缚棚屋”，谓之“排停”，“令官员家属不以老稚病人产妇产妇并立时驱逼般腾在上，然后上船恣意搜检”，“若有家属同行，即令栏头妻女入船搜检”，谓之“女栏头”。

随着人们对女性服务需求的大量增加，专门从事妇女事务介绍的中间人出现了。这些中间人主要由女性担任，称为“女侏”、“女僧”、“牙嫂”等，成为人们雇用、买卖女性不可缺少的帮手。《梦梁录》卷19《顾觅人力》记载，在北宋首都汴京，“如府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挥便行踏逐下来”，十分方便。赵与时《宾退录》卷七载，孝明皇后之弟王继勳，“强市民家子女以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而食之”，因此，他家买妇女、棺木十分频繁，“女侏及鬻棺者，出入其门不绝”。又“郑公肃右丞侄某，家于拱州。时京东饥，流民日过门。有妇人尘土其容，而貌颇可取。郑欲留为妾。……乃召女僧立券，尽以其当得钱市脂泽衣服”。^⑨女侏、牙嫂、女僧已成为宋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职业。

(三) 由妇女的生理所决定的两种特殊职业——乳母、娼妓

在宋代，许多妇女因为家中贫困，不得不抛弃家中嗷嗷待哺的幼子，而成为别人孩子的乳母。孩子长大后，或回家，或留下来作女佣。如“南城邓礼生子，雇田佣田仆妻高氏为乳母”；^⑩重义郎李枢妻之乳媪，好以消夜图为博戏”；^⑪东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为宣义郎元明乳母。”^⑫

宋代政府还创办了居养院、婴儿局等，收养贫困无依靠的老弱病残儿以及弃婴。对弃婴，官府每年花费一定的钱雇请乳母，在雇请的乳母中选一人为头。如袁甫《蒙斋集》卷12《湖州婴儿局增田记》载：“有弃儿于道者，人得之诘其所从来，真弃儿也，乃书于笈，使乳母乳之，月给之粟，择媪五人为众母长，从乳各哺其儿。又一人焉，以待不时而来者，来者众，则益募乳收之。”

在皇宫中亦常常选雇大量乳母喂养皇子、公主。对于这种乳母，其选择有一定要求。据《司马光奏议》卷十二《后宫等级札子》载，“若求乳母，亦须选择良家性行和谨者，方得入宫”。由于主子的特殊地位，这些乳母能享有一定的特权，有一定的地位。如神宗乳母张氏，被封为“魏国安仁保佑夫人”，神宗还批准她可把此封号传给后代。^⑬又“京师民石氏”之孙女，“嫁一管营指挥使，后为吴燕王孙女乳母，受邑号。”^⑭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一些官吏还要拉拢她们，以为自己的靠山。

宋代娼妓主要有四种：官妓、营妓、家妓、野妓等，她们多半是因为贫穷而被迫卖身的。在商业繁华地段，娼妓十分多。如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妓女，名曰花菜坊。”^⑮“或有路妓不入勾栏，只在要闹处做场，谓之打野呵。”^⑯她们的地位十分低下。

(四) 娱乐业

由于女子善于歌舞的天性，因此，宋代从事娱乐业的女子十分多，她们或为官府乐部艺人，或自由组合民间班组，到处表演。如“慈明杨太后养母张夫人善声，……或导之入慈福宫为乐部头，后方十岁，以为杂剧孩儿。”^⑰据《梦梁录》卷20《妓乐》载，在首都临安的大街上，特别逢节日时，往往“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元夕放灯，三春园馆赏玩，及游湖看潮之时，或于酒楼，或花衢柳巷妓馆家祇应，但犒钱亦不多，谓之荒鼓板。”《梦梁录》卷19《社会》记有“女童清音社”，可能是歌女的一种组织。

宋代女子还从事一种特别的娱乐业——相扑，她们象男人一样格斗，供人们观赏。《司马光奏议》卷6《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嘉七年正月）载：“右臣窃闻今月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令各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扑，亦被赏赉。”不但宫中有女子相扑，在闹市区也有。《梦梁录》卷20《角觝》载：“瓦市相扑者，乃路岐人聚集，等伴侣，以图搏手之费。先以女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杭城有……女占赛关索、器三娘、黑四姐女众，俱瓦市诸郡争胜以为雄伟耳。”

宋代女子就业种类除如上述，还有帮别人做

家事的佣人，从事卖卦、巫术等迷信活动的，以及女冠、女道士等等。

二

宋代广大妇女就业，投入社会，对她们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

宋代妇女之所以可以较广泛就业，与她们有一定财产继承权、离婚改嫁权等有一定关系。在一些城镇中，人们甚至“重女轻男”。据《宋稗类钞》卷7《饮食》记载：“京师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育女，则爱护之如擎珠捧璧。稍长，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择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称”。虽然这些职业都较低下，但毕竟是妇女向社会迈开的第一步。

宋代妇女的广泛就业，增强了她们的经济独立性和生活的自信心，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她们开始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再甘于仅为男人的附属品。在宋代，即出现了许多面临不幸婚姻而勇敢提出离婚，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下去的妇女。宋代的妇女开始从传统家庭角色（照顾家人、扶老育幼）一元化模式演变成兼家庭、社会、自我的多元化模式。

宋代妇女的广泛就业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还存在着许多局限，这与传统观念“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分工模式有关，也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

首先，对宋代妇女而言，就业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还没有成为她们的自觉行为，妇女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她们求解放的第一步。大量的妇女就业，只是因为家庭贫穷或无男人可依靠，否则，她们是根本不屑于参加社会劳动的，甚至认为这是低贱人所干的事。如北宋莱州胶水县主簿董国庆，由于北宋灭亡，不得不弃官回老家，生活无着。“（其妾）性慧解，有姿色，见董贫，则以治生为己任。罄家所有，买磨、驴七八头，麦数十斛，每得面，自骑驴入城鬻之，至晚负钱归，率数日一出。如是三年，获利愈多，有田宅矣。”

⑮又“宋氏，开封民妇也。家贫，卖巾履簪珥以

给夫。”⑯“衡州陈道人以磨镜为业，中年忽盲，但日凭妻肩行于市。”后来“独令妻自行磨镜以取给，而闭户端坐。”⑰可见，许多妇女就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其次，宋代就业的主要是中下层妇女，上层妇女仍养尊处优，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们甚至以此为荣，而以就业挣钱为耻。如两浙地区的妇女，喜爱打扮、吃、喝，但“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者，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⑱真是可悲可叹。

虽然宋代妇女就业存在种种局限性，妇女生产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还很小，但她们毕竟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宋代中下层妇女已经迈出了争取自身解放的第一步，虽然多少有些无奈，但也是难能可贵的。

①《夷坚志补》卷一。

②《夷坚志补》卷四。

③《夷坚志·乙志》卷八《无颜鬼》。

④《东京笔华录》卷三《相国寺万姓交易》。

⑤《宋人轶事汇编》卷四《庐多逊》。

⑥吴自牧《梦粱录》卷一《茶肆》。

⑦陆游《入蜀记》。

⑧《宋人轶事汇编》卷三《高宗》。

⑨《夷坚甲志》卷十三《妇人三重齿》。

⑩《夷坚支景》卷七《李氏乳媪》。

⑪《夷坚支甲》卷二《高周二妇》。

⑫《夷坚乙志》卷九《崔婆偈》。

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七“元丰元年”。

⑭《夷坚甲志》卷一《石氏女》。

⑮《梦粱录》。

⑯《南宋市肆记》。

⑰《宋人轶事汇编》卷三《杨后》。

⑱《夷坚乙志》卷一《侠妇人》。

⑲《宋史》卷460《列女》。

⑳《夷坚丁志》卷二十《陈磨镜》。

㉑《鸡肋编》卷中《浙人讳鸭》，P73。

作者吴旭霞，江西社会科学编辑部
(330077)

责任编辑：郭秀文

论 1999 年前后澳门文化特征之保留及发展

□ (澳门) 魏美昌

一、保留及发展澳门文化特征之需要

在最近三年的澳门过渡期间，人们似乎注重加速解决政治问题，诸如公务员本地化、现存法律的清理和翻译、中文作为行政当局官方语言的扩大使用、甚至土生葡人的国籍等。在经济方面，除了需要解决低科技向高科技的工业转型外，仍需解决的尚有供过于求的地产市场以及改善澳门作为中国第二自由港的基础设施等问题。

毫无疑问，对于澳门的将来，这些都是重大问题，而且在 1999 年前需要有妥善的解决办法。然而，倘若澳门希望在主权移交后有一个美好的将来，那么，1999 年之前，在教育及文化领域仍有一些重大问题是值得澳门内外的人士及有关当局重视的。这是关系到澳门与我们邻埠竞争而继续生存的问题。

澳门是弹丸之地，人口稀少^①，在金融及商业方面不可能与香港竞争，而在人力资源及市场规模方面，更不能与中国其它城市竞争。

澳门于 70 年代由劳工密集型工业的上升趋势到 80-90 年代便渐趋衰落，于是经济学家及其他有关专家试图为澳门另一个模式，不单单是一个赌城，而且更需要成为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一个战略枢纽，在信息、通讯、交通、金融、技术及管理经验等方面加强国际化的程度，以吸引更多投资者和游客。

然而，澳门国际机场已在运作中，日后，当铁路或高速公路能通达中国腹地，深水港能大力改善，那时，澳门能否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战略枢纽呢？答案仍是否定

的。

作为一个城市，如果澳门只对其基本建设加以现代化而忽略对其文化特征的改善，那么，澳门将逐渐失去其文化特征，与中国其它城市没有两样。由于澳门经济能力薄弱，而珠海的面积、人口及资源都比澳门优越^②，因此澳门将轻易地沦为珠海的附属物。那时，在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将完全失去意义。

因此，澳门极需全力保留其文化特征。中葡联合声明及澳门基本法已为此奠定了法律基础。事实上，与邻近城市包括香港相比，澳门的历史文化较悠久，这一点，澳门是占尽优势的。1999 年以后，只要在澳门内外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保留及发展澳门文化特征，使澳门继续成为一个能服务于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联系欧洲及拉丁语系国家的战略枢纽（这个文化纽带是在澳门四个半世纪的东西文化交流之中形成的），那么澳门在与邻近地区的竞争中，仍可发展及继续生存。

二、何谓澳门文化特征

所谓文化特征，就是与众不同、在中国或世界其它地方难以找到的文化独特性。此特征在四个半世纪的历史长河里孕育滋长，是带有浓厚的中华—拉丁色彩的东西方文化之融合，有别于只具短暂历史背景 of 香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亦不同于未向西方长久直接开放的中国岭南文化^③。在土生葡人文化中清楚地显示出来：其语言、烹饪、艺术及风俗习惯，一代一代留传下去，形成一个有别于纯正华人社群或葡人

社群的独一无二的土生葡人社群。他们在澳门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利益得到了基本法④的保证。

自从葡萄牙人利用澳门作为商业贸易中心和传教中心，东西方的元素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相互影响。葡萄牙文化无法同化中国文化，中国人亦无法拒绝西方文化，因为在科学技术领域内，西方占了优势。这种情况与香港的中国人被迫接受英国文化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在澳门我们可体验到的是互相尊重、互相容忍、取长补短，从而产生一个兴盛的文化交流。创办于约四个世纪前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就是一个好例子。这所学院是东方第一所西方式大学。耶稣会士从西方到澳门首先必须学习中国语言、风俗习惯及中国文化，因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汉学家。另一方面，中国人进入此学院修读拉丁文及研究西方文化，成为精通西方文明的第一代专家。虽然学习的宗旨是传播宗教，但耶稣会士和有识之士，例如西方的利玛窦、徐日升、金尼阁、汤若望、南怀仁等神父及其中国学者同道徐光启、李之藻、梅文鼎、何国栋、吴历等等，他们互相合作促成东西方文化交流，藉此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建筑学、医学、军械学、西方艺术等传入东方，并向西方推介东方的哲学、医学、绘画、茶道、瓷器、漆器及许多其它中国文化的精华。

无论在东方或西方，这个广袤而深远的交流对社会的冲击是如此巨大，以至产生重大的社会改革。一方面，这种交流推动了西方的启蒙运动，使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的革命走向巅峰，引发了工业革命，开创了洛可可的新艺术风格。另一方面，中国进步思想家，如洪秀全、林则徐、魏源、梁启超、郑观应、孙中山，都透过澳门而有机会接触外国进步思想，从而逐渐揭开了中国多元化及开放的新纪元的序幕，导致科学技术及教育的新跃进。而圣保禄教堂前壁（牌坊）的清晰图象、雕塑和文字，就是这种文化交流的悠久见证，这个古迹已成为我们城市的标志，象征着共存、

互相尊重和宽容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澳门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传统。这种传统在澳门比在邻近地区更显著，体现出和谐多于冲突，平衡多于对抗，包容多于分离，使澳门社会在多元文化中保持稳定。

分析这两种民族、两种行政及司法体制以及两种不同的政治及思想体系和平共处的悠久历史，就容易理解澳门过渡期的种种问题（包括兴建澳门国际机场的问题比香港容易解决等等）。彼此都能坚持互相尊重、互谅互让，这是中葡两国良好关系的基础，这也就是“澳门模式”，与充满冲突和摩擦的“香港模式”截然不同。这两个模式，一个建基于英式习惯法之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另一个是以欧洲大陆法为基础之拉丁文化。

澳门这个共存、互相尊重及互相了解的模式，强烈地反映在不同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巴哈伊教）之间的关系上。这里不同的宗教在教堂、寺庙进行各自的宗教信仰仪式，教徒以友善方式和睦相处，从来没有发生过流血冲突事件。然而，在中国内地、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波斯尼亚、中东以及世界上其它地方，宗教性质的流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众多宗教的和平共处，可与比澳门还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福建泉州的各宗教和平共处的情况互相媲美，但澳门比泉州更能持久而且没有间断过。宗教自由在基本法得到保证，希望这种状况在1999年之后能够延续。

东西方文化互相渗透，已成为我们澳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异族通婚继续在更广的范围进行，人们往往以中西合璧的方式举行婚礼。一批善男信女既参加花地玛圣母圣像游行，又参加在农历新年除夕朝拜妈祖以求兴旺与幸运。各社群都能一起庆祝东西方节日，并因而带来了比邻近地区更多的公众假期。在公开的仪式上，主教及佛教高僧一起出席为本澳的盛事祈福。这种传统在世界其它地方是少见的。

澳门著名的拉丁风格结合中国传统风

格的城市建筑模式，是文化互相渗透的具体见证。教堂及庙宇、堡垒及塔亭、房屋及店铺、花园及墓地、广场及小巷的建筑艺术，构成了澳门独特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由文化司署特别部门依据周详法例^⑤给予保护。文物保护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规定，并受联合国关注。

我们比香港及中国内地其它地方较幸运，因为这些文化遗产，连同保存在教堂、庙宇、洋行、当铺等属于公共和私人档案的书面记录，以及在内地已经失传的某些习俗，还能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由于历史上澳门所处的特殊地位，成功地避过了世界大战、内战和中国现代史上的各种极端主义运动的破坏。有一部分不久将在澳门历史博物馆展出。

一位境外华人学者在探访澳门时，曾对澳门作出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描述：如果香港已成为“东方之珠”，澳门则是一颗有待琢磨的钻石，经适当加工，其价值及光泽将超过一颗珍珠。

但是，倘若让葡文很快自然消失；若把居住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当作外国人；如果允许现存的文物被折掉或允许彻底改变其历史文化价值；假若中国法律取替澳门法；假如宗教自由被蚕食和限制；倘若就像对待有害的迷信一样，禁止古老的中国风俗习惯流传，等等，澳门将会变成什么样呢？

可喜的是，我们对此不必过度悲观，因为在澳门内外的华人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理解保留及发展澳门文化特征的必要性。中国政府及本地华人社会，在未来特别行政区政府内宜推选或委任一些对澳门文化财富有认识的务实人材担任重要职务，以保留及发展澳门文化特征及建立一个保证1999年后能延续下去的基础，以保证这颗钻石不会蜕变成一块无价值的石头。

三、保留及发展澳门文化特征的良策

经过一连串的讨论及研究，人们对下列各点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共识。

(一) 加强调查研究

目前澳门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详细阐明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是一项跨学科的专门学问。尽管其研究范围仍狭小和有限，澳门文化司署一直鼓励及津贴澳门及海外的学者作此类研究，研究的成果以三种语言在文化杂志上刊登。澳门大学在不久前开始拓展人文学科的研究生课程，鼓励年青学者对澳门的题材作出研究，尽管还有不少困难。澳门基金会及东方基金会向来亦出版不少关于澳门的书籍，尽管其学术水平还不高。《行政》杂志及本地法学、经济学杂志有不少有水准的论文。

为了对澳门的特色及其在本地区的作用加深认识，在澳门举办过很多国际研讨会。此类研讨会是非常重要的，便于世界上更多人认识澳门及其区域性角色、模式及其对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在此刻讨论美国哈佛大学韩丁顿教授关于对下一世纪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即基督教与儒教—伊斯兰教联盟之间的“文明冲突”之推测的时候。澳门模式可以证明，上述推测是不正确的。

(二) 大力推动公民教育

只有当澳门的特征不仅为少数的政治家及学者，而且为各个阶层的居民，尤其是年青一代所认识，并且准备为捍卫它而努力时，这种特色才会得以保留下来。

澳门大部分居民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或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他们在澳门几乎没有扎根，亦没有归属感。虽然土生葡人已在此根深蒂固地成长，但自从1949年甚至更早，他们便不断移居海外，而留下来的人对澳门前途仍存有疑问。过去，公民教育完全被忽略，在余下几年的过渡期间，公民教育应摆在优先的地位，让本地居民，尤其是年青一代透彻理解澳门的特征及其未来，以身为澳门市民^⑥而感到自豪。

对市民宣传澳门基本法固然重要，但还要让他们认识澳门的过去及现在，包括历史、地理、法律及政治制度，文化及宗教等。应该为小学、中学、大学的学生和普通市民撰写教科书及大量关于此题材的文章、小册子，出版有关的刊物。这些题材应作为必修课纳入课程计划，使他们能够对澳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在公民教育方面，有关当局应与本地学校、民间和文化团体保持密切联系，互相合作。也应鼓励公众协助兴建本澳的历史博物馆，它和海事博物馆一样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工具。同时，还应鼓励反映本地题材及事物的绘画及摄影、录影及电影、音乐及舞蹈、话剧及戏剧，并通过比赛、展览和表演加以推动。

(三) 充分利用及改善澳门的文化遗产

澳门政府不遗余力动用巨款，以确保具有极高文化、艺术及历史价值之遗址受到保护。近期岗顶前地及下环街前地（阿婆井前地⑦）已修葺，福隆新街及郑家大屋⑧之修葺亦在磋商中。此外，需要修葺之遗址还很多，要逐步使澳门的老区成为一个活的博物馆以供游客参观，亦可为公民教育作出贡献。这是一项既深具价值，又需要延伸至1999年后的宏伟计划。

从现时澳门经济衰退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旅游业在澳门仍然是一枝独秀，它的大部分收入主要来自赌场及博彩业。但是，本澳居民及政府却很希望改变博彩与文化旅游之比例，发展更多文化旅游性质之项目，藉以增加后者之比例。

近来，主题公园之兴建已成为最激烈之辩论话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先了解应该建设哪一类型公园，是否应该模仿中国内地及世界其它地区现有的主题公园模式，例如香港的海洋公园和宋城、深圳的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或美国、日本、巴黎的迪士尼乐园呢？答案是绝对否定的。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以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为基础，且具有浓厚中华拉丁组合之景点。通过吸收我们的历史

精粹，并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创新，这些景点应结合现代科技及我们的文化特征，具有可吸引来自亚太地区、中国内地、台湾以至西方之不同种类游客的主题。为了避免有限资源的重复使用及浪费，计划之相互协调极为重要，而大部分项目应来自私人投资。

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地发展以吸引游客为目的之主题公园，澳门便可摆脱作为香港旅游“影子”的形象，而变成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一个旅游龙头，具有与亚太其它地区不同的旅游特色。这样，才可以在短时间内把澳门从赌城之形象转变为文化都市。

(四) 使用和推广双语制及多语制

双语的使用是保留我们文化特色的核心。由于有需要保留现有行政、立法及司法体制，而这些体制须以双语确保其正常运作和质素，因此，有必要维持葡语作为1999年后的官方语言，一如基本法所规定的那样。为此，需要对那些决定于1999年后留澳服务，特别是母语为中文之公务员加强语言培训，并在推行本地化进程中合格的公务员晋升至重要职位。

在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特别是澳门历史、文学、艺术及建筑等，亦需要懂葡语。如果澳门希望维持和发展与葡语系的国家之友好关系，以及商业及文化关系，葡语之使用亦同样重要。

总之，澳门有3%的人口操不同程度的葡语，这种珍贵的文化财富，在中国其它地方是无法找到的，所以，无论在质与量方面，澳门都应该维持、扩大及改善葡语的学习和使用。

首先要在中等或高等学校培养一大批教师，为华语学生教授葡文作为第二或第三外语，并为不同类型的研究人员讲授有关专业的葡语，而葡籍老师应着重教授高等程度的学生。

在行政方面，中文使用亦十分重要，必须继续消除在平等使用葡文和中文方面存在的现有障碍。对于那些希望在1999年后留澳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也应学习普通

话，以便改善他们讲、写中文的能力，从而普遍提高他们的中文水平。

很明显，要求所有公务员精通双语是十分困难的。但这方面的不足可由优秀的传译员及优质的翻译精英来弥补。应该为他们提供高级翻译课程，以提高水平。

应该分别编辑一些好课本给初学者和程度较高的学生，如新版词典和各类实用词汇手册。对改进语言教学方法的研究，是一个被忽略了的关键性问题。

澳门既是一个发展迅速的自由港，因此也急需继续加强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教育。另外，还急需培养懂得多种语言的翻译员，他们必须精通普通话、葡语和英语，同时具有即时传译能力。可以预见，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国际研讨会和其它会议在澳门举行，因为澳门是召开这种会议的理想地点。为此，对翻译员应提供特别的培训课程以适应新的要求。

最后，澳门的多语制应予以扩大，并且优先扩大至其它拉丁语言，如西班牙文、法文和意大利文，以葡文为基础学习这些语言是比较容易的。这是由于澳门有需要成为中国与拉丁语系国家之间自然的和特殊的纽带。

(五) 加强与欧洲及拉丁语系世界的联系

分析了澳门的文化遗产及其价值，便可以很容易看到澳门本身具有很大潜力，足以成为能将中国与欧洲及占全球人口 1/6 的拉丁语系国家和地区的距离拉近的中介。中国有需要这样做，因为其对外关系不平衡：过分侧重与英语国家的接触，而将欧洲和其它拉丁语系国家放在次要位置^⑨。中国一直以来都在调整策略，目的是加强与欧洲及拉丁语系国家的联系。

如果澳门可以提供必需的资讯、研究和谘询服务，应该是这个策略下的理想纽带。同时澳门亦已具备达到这个目标的基础，因为它的语言法律、国籍（澳门 1/4 居民拥有葡籍及在欧盟任何一国居住之权利）以及历史或文化关系都与欧洲相近。因此，欧盟选择了澳门作为其远东基地，

并于 1992 年签订了一项优惠协议^⑩，随后又在澳门设立了欧洲资讯中心。

由于缺乏推广，欧盟给予澳门的有关投资、商业、资讯、技术转移及培训等优惠待遇目前并没充分利用，而这些优惠在香港及亚太其它地方是无法享用的。通过更多的研究和推广这些优惠，澳门可以有更大的发展。1996 年 2 月，澳门欧洲研究院顺利落成，它的目的正是推行有关欧盟之研究计划，并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宣传有关欧盟的信息。

澳门作为欧洲与中国的中介角色，已被欧洲跨文化活动所确认和认同，经过两年研究和接触，设立了澳门中欧企业家俱乐部，其目的是建立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以便透过澳门促进中—欧贸易。澳门是中国唯一能令欧洲大陆人在感情上可以找到相近文化的地区，而在香港这种感情往往被严谨的金融和商业规则所淹没。

在下一世纪，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巴西，将会迅速朝着第三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迈进，它现在正努力加强与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之联系。透过对葡国、西班牙即伊比利亚半岛的研究，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联系将会更为紧密。但目前中国仍未有此项研究，而在澳门是比较容易进行此项研究的。

另一项计划是设立中华拉丁基金会，这个机构属私人性质，并可跨越 1999 年，目的是协调和发展以下多项功能。（1）设立有关澳门、中国、亚太地区和欧洲国家的广泛资料库，并且不断进行更新。（2）对澳门—中国—拉丁语系国家与澳门—亚洲—拉丁语系国家之间的关系做双向研究。（3）把澳门建成区域性的语文培训基地，一方面让亚洲人学习葡语和其它拉丁语言，并进修拉丁文化；另一方面让拉丁国家及亚太地区国家的人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成为汉学家。（4）提供咨询，促进中国内地、澳门、拉丁语系国家间的商业及文化来往。

在澳门这个地方，中国、欧洲以及拉丁语世界的人可以就经济学、社会学、工

程学、城市规划、海上交通、商业等方面，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下进行对话，塑造及影响各自的社会。总址设在澳门的联合国大学软件中心（该中心设于1992年，与中国内地、亚太地区及拉丁美洲国家有良好的联系，其宗旨是对全球发展中的国家提供研究和培训）。为达到此目的，我们向来都给予协助的。

要达到这个宏伟目标，我们所余的时间无多了。这个目标就是将澳门这颗钻石雕琢成器，使它发出灿烂夺目的光芒，成为一个吸引来自中国、亚太地区、欧洲及拉丁美洲的学者和游客的地区。这个目标显然不是短期内可以达到的，肯定要跨越1999年。但我们必须在1999年之前的短短几年开始为这个目标奠定基础。

①由1910年开始，特别是80-90年代，澳门土地的增加十分迅速，填海由11平方公里增加到现时的20平方公里。到本世纪末，澳门土地将再增加5-6平方公里。但这些土地的增加，不能和香港（1000平方公里）或珠海（1200多平方公里）相比。由于澳门面积小，资源有限，人口短期内不可能超过50万。（据官方统计，1991年澳门居民355693人，流动居民有4.7万人，到1996年人口只增加16%，即约有45万人。）

②珠海总人口约60万；1983年面积由6.81平方公里增加到15.555平方公里，在1988年增至121平方公里。其国内生产总值在近五年的年增长率差不多是澳门的两倍。1995年，珠海的人均生活总值达2000美元。尽管澳门目前比它高七倍，两地人口相差不多，但珠海有更多空间可以吸纳来自内地其它地方的移民。如果澳门经济不能迅速增长，在10到15年内便会被珠海超越。

③香港及澳门文化都是岭南文化的近代分支，然而，香港及澳门文化各有不同的特征，因为它们直接与西方文化接触。

④请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四十二条。

⑤1976年，澳门当局开始立法以确保文化古迹免受摧毁及拆卸。1982年澳门文化司署设立后，随即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及古迹进行分类，制订严格的法律及规章给予保护，并对那些建筑物的所有人给予赔偿。

⑥澳门人口流动性大，加上有大量新移民，而且他们又缺乏公民教育，因此长期以来澳门的华人自称为“中国人”而很少自称“澳门人”，与香港人自称为“香港人”不同。

⑦位于市政厅后面高地的岗顶前地是古老拉丁风格的典型，有奥斯定圣堂、岗顶剧院（据古典剧院的原始风格翻新）、何东图书馆及视觉艺术学校。阿婆井前地是接近内港的一个最古老的葡萄牙人聚居地，保留着土生葡人家庭曾在此区生活的许多回忆。最近曾将此前地周围进行修葺，并在该处重建一口井（“阿婆井”）。已遍布世界各地的很多著名土生葡人可在阿婆井前地寻找其根源。

⑧Rua da Felicidade，中文称福隆新街，是鸦片战争后的著名红灯区。后来禁娼，该处成为拥有各种传统餐厅的地方。郑家大屋是中国清朝官员郑观应的私宅，他是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以提倡自由贸易主义著称。郑家大屋还是内地失传已久的南方传统风格建筑。

⑨遍布欧洲南部、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的拉丁语系国家、地区和城市超过80个，其中大部分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例如巴西就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世纪第五个经济强国。然而，这些国家只占中国对外贸易7.7%，外国投资的1.2%。

⑩该协议为期五年，可续期，并期望延续超越1999年。

作者魏美昌，澳门文化研究会理事长，此文曾于1996年3月18-19日在澳门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宣讲，发表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陶原珂

早期美国传教士在澳门的活动

(1830—1844年)

□ 林 芸

澳门自1557年被葡萄牙人占据，到19世纪初，已逐渐成为中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枢纽及天主教在东方传教的中心。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贸易的进一步开展，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陆续来到了中国。最早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英国人罗伯特·马礼逊（R. Morrison）于1807年抵达中国，在澳门活动达20多年。受马礼逊的影响，第一批美国新教传教士于19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并以澳门、广州为基地开展传教工作。本文拟就美国传教士在澳门的早期活动作一个粗略的论述。

一

受美国海员教友会和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后改称公理会）派遣，大卫·雅裨里（D. Abeel）和艾利亚·裨治文（E. D. Bridgeman）于1830年2月25日到达广州，他们是第一批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而第一位以澳门为基地开展传教工作的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W. S. Williams），他于1833年来到澳门，创办印刷所，帮助在广州的裨治文。

来华的美国传教士通过一段时间的传教后发现，在中国，单纯地进行福音布道工作相当困难。首先，清政府禁止外国人公开传教。自清朝初年颁布了禁止天主教传教的禁令后，清政府对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基本上是禁止的，对传教士在广州、澳门的活动也作了严格的限制，他们的工作只能秘密地进行。裨治文和其他人不得不“关门”，而且经常是“锁门”为中国人举行宗教仪式。^①第二，不同的文化背景及文化差异也给传道工作造成了障碍。基督教宣扬的人类原罪与孟子性本

善观念形成的反差，使普遍信仰佛教、道教的中国人一时很难改变原来的信仰。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传教士开始寻找新的传教方式。他们主张把重点放在出版印刷、医疗、教育等工作上，以此作为福音布道的补充，并认为以上述工作为手段，再进行师道传教比单纯的讲道或许更易于吸引听众，最后为当地人所接受。由于以上原因，美国传教士在澳门的早期活动主要集中在出版印刷、医药、教育等方面。

二

1、出版印刷

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于1817年在澳门出版了第一卷《华英字典》，这部六卷本的书籍于1823年出齐。该书仅从康熙字典收进的汉字加以英译的就达4万多，是新教传教士在澳门出版的第一部重要书籍，它对中西文字的沟通起了先河作用。

裨治文于1832年5月在广州创办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月刊杂志，1839年5月该刊迁到澳门出版发行，这是美国传教士在澳门出版杂志之始。该刊在澳门发行了5年，1844年迁往香港，后又迁回广州，1852年12月停刊。该杂志共出版20卷，每月1期，每年1卷，共刊出各类文章1378篇，内容涉及中国政治、自然史、地理、语言文学、贸易和商业、对外关系、亚洲各国状况、宗教等30个方面。《中国丛报》不仅以通俗的形式向外国人介绍了中国的历史，而且还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20年间中国的现状。它不但对西方人了解中国有帮助，而且至今仍是研究该段历史不可

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裨治文精通中文，除了创办《中国丛报》并担任主要撰稿人外，还撰写传播福音的小册子，并翻译出版有关中国文化、世界历史和地理的书籍。1841年，他在澳门出版了《广东方言撮要》一书。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中文、商务、机械、建筑、农业、矿物等17个章节，是美国人写的第一部以英中文对照形式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它对沟通中美语言文字有开拓之功。”

②

为出版印刷书刊的需要，美国传教士还建立了一些印刷所。鸦片战争前，最有名的是卫三畏负责建立的“布鲁因印刷所”(The Bruin Press)。该所主要出版了《中国丛报》及一些教会宣传的小册子等。

卫三畏除了具有高超的印刷技能外，同时具备了学者的才智。他在澳门期间，除担任《中国丛报》的主要撰稿人之外，还写了一些书、词典和指南。其中最著名的是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这本书是美国人写的第一部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英文版书籍。该书概括地叙述了中国政治、地理、人口、民情等状况。虽然该书有一些与史实有出入、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但在当时仍具有较深的影响，曾被美国许多大学采用为中国史课本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卫三畏同时也因该书“确立了他作为中国问题权威的地位”。③

2、医疗

1820年，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一名外科医生利温顿(J. Livingstone)合作在澳门创设了赠医所，次年扩大为医院，以治眼疾为主。这是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医院。1827年，东印度公司的另一名外科医生郭雷枢(T. R. Colledge)又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实行免费治病。由于郭雷枢热心地为当地群众解除疾苦，赢得了多方面的赞扬和感谢。“中国人常以水果鞭炮等为酬。”④这所医院由于缺乏人手，被迫于1832年关闭，并迁到广州。

美国第一位医药传教士伯驾(P. Parker)受美国公理会的派遣，于1834年

到达广州。1835年11月，他在广州开设了“广州眼科医局”。医局成立之初，人们对它的目的表示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顾虑打消了，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6个星期就有450人到该院就医，行商伍敦元向该院捐款及提供院址。

根据办这家医院所取得的成果，郭雷枢写了一份呼吁书，要求尽可能多派遣传教医生到中国来。“请医务界的善士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⑤1838年2月21日，在郭雷枢的倡议下，伯驾、裨治文一起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并担任主要负责工作。该会的宗旨是鼓励在中国行医，由此消除与中国人的隔阂，最终成为“病人”的恩人。

应“中华医药传教会”的要求，伯驾于1838年7月5日在澳门开设了一所眼科医院。这是美国传教士在澳门开设的第一家医院，伯驾也成为第一位到澳门的美国医务传教士。医院建立没多久，就博得了当地人的信任。从1838年7月5日到10月1日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共有近700名病人接受了伯驾的治疗，平均每天77人。尽管开设的是眼科医院，除眼疾外，其他各科疾病也在伯驾的治疗范围之内。三个月后，伯驾因广州眼科医局的重新开张而离开澳门，医院暂时关闭。

不久，英国伦敦传教会派遣了一名资深的外科医生威廉·洛克哈特(W. Lockhart)来澳门接替伯驾的工作。此外，为协助洛克哈特，1839年美国公理会又派医务传教士威廉·迪弗(W. Diver)、伦敦传教会派本杰明·霍布森(B. Hobson)医生来澳。1840年8月1日，医院重新开张。迪弗由于健康原因，于1841年返回美国。洛克哈特亦因有新的传教任务离开澳门，医院便主要由霍布森负责。从1840—1841年7月，共有1457位病人到该院就诊，⑥到1842年7月，已达到5265人。⑦病人不限于澳门，邻近市县及外省也有慕名而来者，其中有中下层百姓，也有政府官员。

1843年初，这家医院迁到香港。

美国传教士们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开设高级医院，免费为群众看病，其最终目的是想博取当地人的信任，吸引更多的人归顺上帝。然而，他们毕竟为数千例患者解除了痛苦，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3、教育

早期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最著名的首推美国牧师赛米尔·布朗 (S. Brown) 于 1839 年 11 月 4 日在澳门设立的“马礼逊学校” (Morrison School)。这是美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

在这所学堂里，学生们接受了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私塾的教育。首先，布朗制定了一套紧凑的作息制度，使学生们感觉像在家里学习一样。这种教育形式对孩子很有吸引力，很少有学生违反纪律，因而极少需要老师对学生进行惩罚。

布朗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持批判的态度，认为中国的教科书极少介绍一些科学知识，中国学堂“把科学排斥在外，独立思考的精神受到压抑”。^⑧因而，布朗参照当时欧美教育的模式并结合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教学的课程表。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基督教义、各种近代西学知识和中国汉语。近代西学知识包括算术、代数、几何、生物学、地理学、历史学、化学等课程。

在教学方法上，布朗也一扫封建私塾死读硬背、不求甚解、模仿作文的旧习，而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并对学校的教学质量严格要求。加上学生们的勤奋好学，绝大多数学生掌握了所学的知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教学各门课程中的成绩，甚至达到了高一级中学水平。”^⑨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则使人感到“仿佛那些学生生来就是说英语似的”。^⑩其中一名学生用不到 15 个月的时间，将一本英文版的《西方经济手册》译成了中文。

马礼逊学校在澳门办了 4 年，1842 年 11 月 1 日，该学校迁往香港，1849 年由于经费无着而关闭。尽管马礼逊学校办学时间不长，规模也不大，但它是第一个在中

国出现的正规的传播西学的洋学堂，并培养出一批掌握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人才。中国近代著名的改良思想家，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第一位留英学生黄宽（回国后成为中国西医学的奠基人）都是该校的高材生，还有一批学生在清政府的驻外使馆中充任译员。“学生们在学业事业上的成就，说明他们在马礼逊学校所学的近代西学知识是牢固的。”^⑪

布朗夫妇因健康原因于 1846 年回国。布朗在中国办学 8 年，首次有系统地向中国学生传播西学，并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布朗同时又是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的促成者，为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此外，还有几位美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过学校，规模都较小。1835 年，美国浸礼会派遣传教士叔末士夫妇 (J. L. Shuck) 来澳门传教。他们是美国最早到澳门传教的浸礼会教士。叔末士夫妇先在澳门设立教堂，宣传教义。1839 年，叔末士夫人在澳门开办了一所义校，极受欢迎，“它甚至博得一个吹毛求疵的观察的赞许。”^⑫1844 年 10 月 22 日，另一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 (A. P. Happer) 抵达澳门。他在澳门一身兼多职，既讲道又教学，同时还行医。在澳门期间，他开办了一所学校，招收了 30 名学生。他在向学生讲授科学知识的同时，还不忘向他们宣传基督教义。1847 年 3 月，哈巴安德转到广州传教后，这所学校随即迁往广州故衣街。^⑬

4、殖民主义活动

在早期中美交往中，能够通晓中国语文的美国人绝大多数是传教士。他们通过翻译、著书等方式把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带到中国，同时又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因而，传教士在沟通中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因为他们精通汉语，在早期的中美外交活动中，多半被任命为使团或使馆的秘书及翻译，为本国制定对华政策，充当侵华的工具。

在中国的澳门，美国传教士最早卷入外交的例子可追溯到 19 世纪 30 年代。当

时，美国朴茨茅斯的一位商人埃德蒙·罗伯兹 (E. Roberts) 曾想方设法使美国政府任命他为公使以便照看美国的亚洲商务。当他于 1832 年 11 月访问澳门时，裨治文便主动出任他的主要随员和情报人员。^⑭ 不仅如此，传教士还通过办报刊等形式向美国介绍中国的情况，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服务。裨治文、卫三畏主办的《中国丛报》，曾用大量的篇幅翻译和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农业、科技等。这些都成为美国政府了解中国的重要情报。

伯驾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致力于医务传教的同时，政治上也是个热心的参与者。他在广州时担任美国政府驻广州领事的助手。鸦片战争后，他认为美国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分一杯羹。他向国务卿韦伯斯特 (D. Webster) 递呈意见书，要求“立即派遣全权公使迳驻道光的宫廷”。^⑮

不久，美国派海军司令加尼 (L. Kearny) 率领两艘美舰到澳门，以保护美侨生命财产为名在中国东南沿海游弋。而裨治文则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在中英《南京条约》刚签订时，他就怂恿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妄图攫取英国通过条约所获得的一切权益。1844 年 2 月 24 日，美国政府委派以顾盛 (C. Cushing) 为全权代表的使团来到澳门。顾盛任命了传教士裨治文、伯驾、卫三畏担任他的顾问兼秘书。“因为这几个人具有比当时在广州的其他任何欧洲人都好的语文知识，具有对中国仪节和思想方法以及美国对华关系早期历史的更好了解。”^⑯ 而由于伯驾在广州的名声及与美国政界的关系，顾盛对他更是“推心置腹，没有任何秘密”。^⑰

裨治文和伯驾不仅通晓中文，且对中国的国情也颇有研究，他们为顾盛制定了与清政府谈判的策略，并让顾盛确信，在中国人“没有和外国政府进行较量的愿望或企图”的时候，恫吓的手段是有效的。^⑱ 于是，顾盛在澳门停留期间，多次以进京面见皇帝要挟清政府，并且将美国军舰开到广州洋面进行武力恫吓。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愿外国使臣进入北京城，便派遣耆英作为钦差大臣来到澳门与顾盛谈判。而作为顾盛秘书的裨治文、伯驾、卫三畏在谈判的过程中既充当了翻译，又不时地为顾盛出谋划策，拟定条约草案。1844 年 7 月 3 日，中美之间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美五口贸易章程 海关税则》，即《望厦条约》。美国学者丹涅特说：“的确，从中国丛报和望厦条约的仔细比较之中，可以看出顾盛在 1844 年的交涉不但多亏裨治文的翻译工作，而且还多亏他作为顾问。条约中的一些条款似乎都是直接出诸中国丛报的先期讨论。”^⑲ 后来，伯驾被任命为美国使馆头等参赞，从 1846—1857 年间，美国约有 6 次让伯驾负责驻华使馆的工作，1855 年又任美国驻华专使 (Commissioner)。

鸦片战争前后，还有一些传教士到澳门进行专门的福音布道工作。1837 年，传教士罗孝全 (I. J. Roberts) 来澳门传教。他于 1826 年组织了“罗伯兹基金与中国传教会”，并以这个教会的名义来华传教。罗孝全在澳门传教达 7 年之久。“有一段时间他对一群麻疯病人讲道。”^⑳ 1840 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 (W. J. Boone) 来澳门传教。他毕业于美国医学院，是美国圣公会最早派来中国传教的人之一。他在澳门传教两年后又转到福建厦门。1842 年 5 月 27 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娄理华 (W. M. Lowrie) 来到澳门。在澳门期间，他一边学习中文一边为在澳门的欧洲人和美国居民讲道。^㉑ 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后，娄理华出于接近更多的中国人的目的，离开了澳门转到宁波。

三

美国传教士早期在澳门进行的活动，主要是想以澳门作为一个传教据点，为进一步开展传教做准备工作。因而，在澳门的传教工作带有短暂性。尽管美国传教士尝试通过医务、教育、出版印刷等形式来吸引群众，宣传教义，但收效都不大。19 世纪 30 年代，澳门的新教徒不过十多人而已。鸦片战争后，新教的发展仍比较缓慢，

分析其原因, 主要是: 1、正如前文所述, 鸦片战争前, 清政府严厉禁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为传教工作带来了困难。2、澳门当局及澳门天主教也排斥新教。澳门自葡萄牙占据以来, 一直是天主教在东方传教的一个重要据点, 势力庞大。3、鸦片战争后, 新教传教士可以直接到中国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传教, 不必借助澳门这个跳板, 因此, 澳门也就被忽略了。从 1807 年到 1851 年, 共有 150 名新教传教士来华, 其中有 7 名美国传教士把澳门当作基地进行传教。从 1844 年哈巴安德来澳门后到 1851 年间, 没有一名传教士长驻澳门, 而是全部集中到五个通商口岸及香港。^{②②}到 1845 年左右, 中外贸易集中于广州、上海、香港等地, “澳门开始成为被遗忘的角落,”^{②③}澳门同时也成了被传教士遗忘的角落。4、澳门作为华人集聚之地, 基本上信奉传统的佛教和道教, 对新教的兴趣不大, 因而新教的传播受到阻碍。

尽管美国传教士在澳门所进行的活动在吸引教徒上没有多大成果, 然而这种活动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传教士最初来华时正处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向东大肆扩张时期, 因而, 尽管有一些教士是抱着纯粹的宗教热忱和动机来华, 但总的来说, 其殖民主义的性质是确定无疑的。例如, 在裨治文、伯驾、卫三畏提供信息情报并协助下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的有些条款比《南京条约》更加苛刻, 从而扩大了领事裁判权, 破坏了中国的司法独立, 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美国传教士在澳门所进行的活动客观上对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传教士通过办报、著书立说等方式把中国的大量信息传到美国, 使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19 世纪的大部分期间, 美国人是通过传教士的眼睛来观察亚洲的。”^{②④}同时, 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也为鸦片战争前后先进的中国人了解、认识、学习

西方提供了必要的知识来源。林则徐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后, 为了“探访夷情”, 制定相应的对策, 曾组织人员翻译从澳门收集到的《中国丛报》、《广州周报》等英文刊物, 并将其编辑成《澳门新闻纸》。而译员中就有中国第一位新教牧师梁发的儿子梁秩, 还有布朗创办的马礼逊学校的学生袁德辉。《澳门新闻纸》的翻译, 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林则徐比较及时和确切地掌握“夷情动态”, 直接为其领导的禁烟运动与抗英斗争服务。

①③④⑧韩德:《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第 28、30、33、34 页。

②梁碧莹:《早期中美文化交往》, 中山大学史学集刊, 第二辑,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343 页。

④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第 71 页。

⑤《中国丛报》Vol. IV, PP388—389。

⑥《中国丛报》Vol. X, P465。

⑦《中国丛报》Vol. XI, P659。

⑧《中国丛报》Vol. XIII, PP631—632。

⑨⑩《中国丛报》Vol. XV, P609, P608。

⑪乐正:《早期中美文化关系史的一页》,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 1983 年第 3 期, 第 64 页。

⑫⑮⑳赖德烈著, 陈郁译:《早期中美关系史》, 商务印书馆 1963 年, 第 111、124、92 页。

⑬郑炜明、黄启臣著:《澳门宗教》, 澳门基金会 1993 年, 第 74 页。

⑭⑲⑳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 商务印书馆 1959 年, 第 126—127、473、474 页。

⑰章文钦:《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 澳门基金会 1994 年, 第 38—39 页。

⑱《中国丛报》Vol. XIX, P494。

⑲《中国丛报》Vol. XX, PP513—519。

⑳费成康:《澳门四百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第 309 页。

作者林芸, 广东省社科院港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510080)

责任编辑: 郭秀文

西方古典美学“理想”范畴的研究

□ 王强东

从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古典主义美学思想开始，到18世纪末德国古典美学的终结，前后2400多年西方各国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习惯上统称西方古典美学。

“理想”，是西方古典美学中常见的重要范畴。不同的美学家对它有不同的理解、阐释和运用。进入当代，由于人们的生活实践、艺术实践以及科学实践日趋丰富和节奏增快，美学焦点、形态、方法，以及美学的话语亦随之不断转换和变化，从而使得古老的“理想”范畴几乎已被当今的美学家遗忘，“理想”似乎已经消失。但是，“理想”的价值终究不能抹杀或淹没。时代呼唤“理想”，古老的“理想”范畴应该也正在放出新的光芒。因此，在新的社会背景、新的生活实践、新的美学环境和新的美学基点上，重新审视西方古典美学“理想”范畴的内容、特性和演变，吸取其理论营养，对当代美学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指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他进一步指出：“《诗学》是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今至前世纪末叶一切美学概念的根据。”^①事实也的确如此，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对“理想”范畴进行直接的专题论述，但是在其奠基性的美学名著《诗学》中，却以明确揭示艺术理想化内容和创作的理想化规律开了“理想”思想的先河。他说，“像画家和其他形象创造者一样，诗人既然是一种摹仿者，他就必然在三种方

式中选择一种去摹仿事物，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照事物为人们所说所想的样子去摹仿，或是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②第三种，即“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的艺术创作方法就是“理想化”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是推崇并赞赏这种方法的；用这种理想化方法创作的艺术形象就是“理想”形象。同时，他还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诗人与历史家的差别不在于诗人用韵文而历史家用散文——……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③“已发生的事”即事实或现实，“可能发生的事”即想象或理想。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点明了艺术（诗）同历史的区别，指出了艺术可表现的理想性内容和艺术创作的理想化方法。他认为，只有“描述理想”和“理想地描述”，才能“把人物原形的特点再现出来，一方面既逼真，一方面又比他原来更美”。^④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家达·芬奇也天才地意识到了绘画艺术中理想化创作和创作的“理想”的重要性，他说，“画家应该研究普遍的自然，就眼睛所看到的東西多加思索，要运用组成每一事物的类型的那些优美的部分。”^⑤他还劝画家，“每遇到田野里去，须用心看各种事物，细心看完这一件再去另一件，把比较有价值的东西选择出来，把这些不同的东西捆在一起”。^⑥在这里，“多加思索”、“选择”和“把这些不同的东西捆在一起”的方法就是理想化的构思和创作。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和达·芬奇上述美学观点还仅仅是美学“理想”范畴的思想萌芽的话，那么，

从鲍姆嘉通、狄德罗和莱辛等开始的西方美学，则直接用“理想”一词来阐述美学的“理想”范畴了。

狄德罗比鲍姆嘉通大一岁，是法国启蒙运动三大领袖中最杰出者。狄德罗的美学贡献主要表现在戏剧艺术、造型艺术和美学理论三个方面；而其美学建树的标志则是“美在关系说”。其实，其美学功绩还在于他对“理想”概念的表述中。

狄德罗撰写过一篇《谈演员》的论文。狄德罗说，要想表演得美，就得“凭思索，凭对人性的钻研，凭经常摹仿一种理想的范本，凭想象和记忆”。^⑦在此，所谓“理想的范本”，就是理想模式或理想形象；这理想模式、理想形象或理想范本是通过演员的“想象”、“记忆”、“思索”和“钻研”而形成的，按照这个“理想的范本”表演，表演才会成功，才会给人美的享受；而“最伟大的演员就是最善于按照塑造得最好的理想范本，把这些外在标志最完善地扮演出来的演员”。^⑧在文中，狄德罗还推崇了著名的表演家克勒雍，他说“她自己事先已塑造出一个范本，一开始表演，她就设法按照这个范本。毫无疑问，她心中事先塑造这个范本时尽可能地使它最崇高，最伟大，最完美。”“由于辛苦钻研，她终于尽她所有的能力，接近到她的理想。到了这个时候，就已万事俱备，她就坚决地守着那个理想不放”。^⑨在此，狄德罗已经把“理想”的主要美学性质点出来了：“理想”是属于审美主体的（譬如演员）；理想具有指导实践（譬如指导表演）的功能；理想是在“想象和记忆”、“思索”和“人性的钻研”等的基础上形成的；“理想的范本”的实现，标志着美的诞生。

狄德罗还在该文及评论马黎艺展的论文《沙龙》里提出了“理想美”和“现实美”的概念。^⑩其所谓的“理想美”，就是指艺术家对现实材料有意识、有目的地选择和理想化而创造的艺术形象。从“理想范本”到“理想美”，狄德罗已有了“理想美学”思想的萌芽。

莱辛在《拉奥孔》的续编也论述了美学意义的理想：“身体美的表现就是绘画的目的，所以身体的最高美就是艺术的最高目的。但是身体的最高美只有人才有，而人之所以有这种最高美是由于理想。这种理想只以较低级的形式存在于动物界。植物界或无生命的自然界都见不出这种理

想。”^⑪理想是美或人的美之所以成立的原因，莱辛《拉奥孔》里表现的这一思想同狄德罗《沙龙》里“理想美”的提法一样，亦是“理想美学”思想的一种表述。

西方古典美学的两座高峰是康德和黑格尔。他们的美学思想博大精深，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美学研究和审美实践。

康德与狄德罗及莱辛同代，是德国古典哲学及美学，特别是“形式派美学”的开山祖。康德在《判断力的批判》“美的分析”一章中剖析了审美的四个契机，得出了美只涉及形式而不涉及利害、欲念和概念的形式主义结论。在这一章中，康德专设了一节“论美的理想”，这是以往所有美学专著中从未有过的。在这一节中，康德说，“审美趣味的最高范本或原型只是一种观念或意象，要由每个人在他自己的意识里形成，他须根据它来估价一切审美对象，一切审美判断范例，乃至每个人的审美趣味。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概念，而理想则是把个别事物作为适合于表现某一观念的形象显现。因此，这种审美趣味的原型一方面既涉及关于一种最高度的不确定的理性概念；另一方面又不能用概念来表达，只能在个别形象里表达出来，它可以更恰当地叫做美的理想。我们虽然原来不曾有这种理想，却努力在自己心里把它形成。但是它只能是一种想象力方面的理想，因为它不基于概念而基于形象显现”。^⑫

康德在此点明了“美的理想”的形成和本质特点。康德认为，“美的理想”或“审美趣味的最高范本”或“原理”从本质上说不是理性概念或观念，而是“表现观念的事物形象”，是一种“意识性形象”。这是“由每个人在他自己的意识是形成”的，人们审美时，就把它当作标准，“根据它来估价”“一切审美对象，一切审美判断”和“每个人的审美趣味”，鉴定其美丑。

由康德关于“美的理想”的论述还可看出，康德的“理想”范畴具有一种对立统一的性质，即非观念和含有观念的对立统一，理性概念和感性形象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最终是统一在“每个人自己的意识里”。所以，康德的“理想”范畴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特征。

康德随后又谈到了“美的理想”所包含的观念和目的的性质。他说，“不论一个理想是在何种评判的根据里，必须有一个理性的观念依照着一

定的概念做根据。这观念先验地规定着目的，而对象的内在的可能性就奠基在它上面。”他又说，“美，若果要给它找得到一个理想，就必须不是空洞的，而是被一个具有客观合目的性的概念固定下来的美”。^⑬由此可知，康德的“美的理想”所包含的“观念”就是事物本身具有的“客观合目的性”的概念。这种概念在物那里是由先验性的观念（犹如柏拉图的理式）规定的；而在人这里，则是由先验性的观念和人的自我意识合成的。所以人与物的理想概念是不同的，所以紧接着康德说“美的花朵、美的家具，美的风景等的理想是不可想象的。”^⑭“只有人，他本身就具有他的生存目的，他凭借理性规定着自己的目的，……所以只有‘人’才独具有美的理想”。^⑮也就是说，物只有“先天”的目的（即上帝造物的目的）；而人既有“先天”的目的，又有“后天”的目的（即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康德进一步得出结论，“美的理想，由于上述的理由，我们只能期待于人的形体（形象）。在人的形体上理想是在表现道德，没有这个这对象将不普遍地且又积极地令人愉快”。^⑯

康德“美的分析”一章中，从这种“理想是在表现道德”的特殊结论（“美的分析”一章中其它三个结论全是形式主义的）到后一章“崇高的分析”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发挥，认定美的最基本要素就是其人道和人性的内容。于是，他明确而又矛盾地再次得出了“美是道德精神的表现”和“美是道德的象征”^⑰的结论。这正是康德其擅分析而不擅辩证统一的美学体系的固有矛盾所在。

二

黑格尔是其先前西方哲学和美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其最高成就者。就美学的“理想”范畴来讲，黑格尔也有着比前人更精深、更系统和更辩证的阐发。他的《美学》四卷，其全书的序论和第一卷都直接论述了美学的基本范畴——理想。第一卷是整个四卷的核心和基础，主要阐述美学的“基本原理”，其余三卷则是第一卷的具体展开。而第一卷用了很大篇幅，从哲学和艺术的角度论述了“理想”。

首先，黑格尔论述了“理想”的本质，阐明了“理想”与理念和概念的关系。

“理念说”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灵魂和基础。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也由“理念说”来阐释理想范畴的本质，这是黑格尔美学的起点和基点。黑格尔写道，“理想就是和实在统一起来的理念”。^⑱而“理想就是符合理念本质而体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这种理念就是理想”。^⑲联系到艺术，他说“艺术的现实就是理想”。^⑳也就是说，从外在形象上讲，理想就是感性地表现出来的艺术；从内在意蕴上讲，理想就是“具有确定形式的理念”。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黑格尔所谓的理念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精神现象（意识、思维等），而是一种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体，即理念“就是概念，概念所代表的实在，以及这二者的统一。”^㉑在黑格尔的美学著作里，概念和理念都不是单指精神，而是指概念和理念与其自我生发的实体这二者的辩证统一体，是“正”（精神）“反”（精神生发的实在，即精神的对立面）“合”（精神与实在的对立统一）的三段式过程。因此，在黑格尔眼里，理想的本质就是理念，是概念与实在的统一。

关于理想与美的关系，黑格尔分析指出，“我们已经把美称为美的理念，意思是说，美本身应该理解为理念，而且应该理解为一种确定形式的理念，即理想”。^㉒换言之，“理想，即美的充分体现”。^㉓具体地讲，黑格尔认为美有二种，一是自然美，二是艺术美。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黑格尔又认为美只有一种，即艺术美，“美的领域就是艺术的领域”，“美学亦即艺术哲学”。^㉔

也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认为，自然作为外在于人的存在（黑格尔的“自然”亦非通常所理解的自然界，它指的是整个外在于人的世界，即外在于个人主体的自然物质存在和社会存在这一总体外在世界。这种外在世界就其本身来说，只是一种“自在”的存在，而不是“自为”的存在，即是一种无思想无意识的存在。所以，自然与人有意识创造的艺术美即理想（“自在又自为”的存在）是对立的。因此，黑格尔得出结论，自然美是非理想的美，非充分体现的美，有缺陷的美：“自然美只是属于心灵的那种美的反映，它所反映的是一种不完全、不完善的形态”。^㉕“自然美只是为其它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

的意识而美”。^{②6}

黑格尔认为，与理想同自然美的间接和对立关系不同的是，理想与艺术美的关系则是直接的和统一的。他说，“艺术美是作为理想来看的”，^{②7}而“就艺术美来说的理念并不是专就理念本身来说的理念，即不是在哲学逻辑里作为绝对来了解的那种理念，而是化为符合现实的具体形象，而且与现实结合成为直接的妥贴的统一体的那种理念”，^{②8}也就是说，艺术美和理想指的是一个东西，即“符合现实的具体形象且与现实结合成为直接的妥贴的统一体的理念”。称之为“艺术美”，是从美学角度而言，称之为“理想”，则是从形象角度而言的。所以，黑格尔在后文中就直说，“理想，即艺术美”。^{②9}

对理想本身的内外特性，黑格也作了详尽的分析。首先，黑格尔认为，由于理想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理念，所以，理想内在的最基本的特性就在于表现意蕴，表现精神，表现心灵；“理想的本质就在于这样使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因而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③0}这种表现从成分上讲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理想“首先要把神性的东西当作它的表现中心”^{③1}。第二，“神的心灵所凭附的凡人，例如圣徒，殉道者，以及一般信徒，也就成为理想艺术的适宜对象。”^{③2}第三，由于理念可以外化为具体实在，“神的东西”亦可转化为“尘世的存在”。所以，“人的全部心情连同一切感人最深的东西，人心里面的一切力量，每一种感觉，每一种热情，以至胸中每一种深沉的旨趣——这种具体的生活就形成了艺术的活生生的材料，而理想也就是这种生活的描绘和表现”。^{③3}

就外在的形式特性而言，黑格尔认为，理想也有三个方面的表现。首先，它表现于“整体一律，平衡对称，和谐”等抽象的外在形式，以及颜色，音质，线条等“感性材料”的形式。其次，它表现于同外在环境（自然和社会）的协调性，与物质和精神（如宗教，道德）的协调性。再次，它表现于与受众即欣赏者的协调一致。对于这后一点，黑格尔深刻地指出，“理想的艺术作品”“尽管自成一种协调的完整的世界，它作为现实的个别对象，却不是为它自己而是为我们而存在，为观照和欣赏它的听众而存在。”^{③4}从这个美学观点可以看到现代接受美学的思想萌芽和根源。

另外，从更深层的形式方面讲，理想的特性还要求其“心灵的表现”，不但可以从其形象的整体看出来，还可以从其形象的每一部分显现出来，“艺术把它的每一个形象都化成千眼的阿顾斯，通过这千眼，内在的灵魂和心灵性在形象的每一点上都可以看得出。”^{③5}这种“通体生气灌注”的特性就是理想的特性，也“由于这个缘故，理想才真正是美的”。^{③6}

在《美学》第一卷中，黑格尔还着重论述了理想与生活，理想与人的实践，以及理想与社会环境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黑格尔说，“理想的完整中心是人，而人是生活着的。……属于生活的主要是周围外在自然（即物质存在和社会存在）那个对立面，因而也就是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在自然中的活动。”^{③7}他还说，“具体的生活就形成了艺术的活生生的材料，而理想也就是这种生活的描绘和表现”^{③8}也就是说，理想在于表现生活，而生活就是人与外在世界（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及在外在世界中的活动。若进一步追问，理想与生活，或人与生活的统一又表现在哪里呢？黑格尔指出，其统一在于“人的实践”。他说，“人还通过实践的活动来达到为自己，因为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③9}关于理想与社会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黑格尔分析道，整个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背景就是一种大环境，即“一般的世界情况”（或通常所称的社会时代背景），它是“理想”的普泛的、一般的基础，这是一。第二，“一般的世界情况”的具体化就形成“情境”，即理想具体生成的环境，这是小环境。第三，大小环境还是外在的，还是“理想”存在的外环境；“理想”存在的内环境就叫“情致”，即外部环境在人物内心内化成的思想情感状态。理想与这大、小、内环境的对立统一就是理想与整个社会环境的对立统一。理想就是在这种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生成和发展的。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的理想范畴思想已有了进步的社会观、历史观和实践观。

西方古典美学关于“理想”范畴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给当代的美学研究以宝贵的启示。

第一，纵观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理想”观点和“理想”范畴的出现，无疑反映了人们对艺术和美的认识的深化和进步。

譬如，古希腊最早的美学观点是“美在物体形式”，美在审美对象其整体与各部分的比例配合；并由此派生了诸如“数的和谐”、“黄金分割”、平衡、对称、整齐等形式美规则。这种对美的早期认识一方面有客观的原因，因为古希腊典型的艺术是建筑、雕刻、绘画等造型艺术；这些造型艺术自然给人以直观的形式感受。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讲，人们凭感官从这些造型艺术的形式上得到感觉，而且觉得这种感觉是不加思索的；所以，就主观地认定美在物的形式，从而忽视了形式所凝聚和所代表的内涵。其实，这是人们在美学早期阶段对美的表层和片面的认识。

其实，一切现实事物（包括美的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所谓“纯形式”只不过是其形式表现内容的程度较弱，或人们还未意识到形式的意蕴罢了。对于这一点，后来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休谟分析指出，即使是“平衡对称”这种所谓的纯形式，其后面也蕴含着“安全”的内涵，因为不平衡对称就会倾倒。所以，“平衡对称”的美感来自“对安全的同情”。不管休谟之说是否真理，但有一点却是对的，即美或艺术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而“理想”则是“具有意蕴的形象”。因此，理想范畴的出现就从思维的角度反映了人们对美和艺术的认识有了从形式到内容或从形象到内蕴的这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进步。

第二，“理想”观点和理想范畴的出现，还体现了美学思想由物（自然）及人的历史性转变和理论升华。

由于“理想”是人的生活与人的心灵的结晶（神也是人，天上的人）所以，“理想”思想和“理想”范畴的诞生就给艺术和美带来了一种人的灵气、人的情感和人的活力，给“物的影象”注入了人的能动性，人的想象力和理智。因为自然是物性的，而理想是人性的，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化摹仿”——“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

去摹仿”的思想、达·芬奇“思索加选择”的理想化思想、狄德罗关于“理想的范本”的思想、康德和黑格尔关于“理想”范畴的论述等，从今天来看，虽不完全正确，却都体现了从“物”或“自然”到从“人”或“人的生活”来把握艺术和美这样一个重大的认识转变，体现了从以物为中心的美学到以人为中心的美学这样一个重要的认识升华。这是美学思想的质的飞跃。

第三，美学思想中“理想”范畴的诞生，还标志着社会观、历史观和实践观进入了美学的大门，开拓了美学的视野，提升了美学的境界。这一点，在康德和黑格尔对“理想”范畴的论述中尤为突出。譬如，康德论“理想是道德精神的表现”，论“美是道德的象征”；黑格尔论“理想”与“一般世界情况”、“情境”及“情致”的对立统一关系，论“理想”与“生活”和“人的实践”的关系等等。

第四，“理想”观点和“理想”范畴的提出，还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方法在美学中的成功运用。在康德和黑格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理想”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个别形象”和“理性概念”的统一（康德），是“具体形象”与“理念”的统一（黑格尔）。其次，“理想”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概念，概念所代表的实在，以及这二者的统一”（黑格尔）；是“人性的目的”与“人的形体”的统一（康德）。再次，“理想”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感性形式与‘理性观念’的统一（康德）；‘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除此之外，在黑格尔对“理想概念”和“理想实在”之间“正、反、合”三段式的论述中，在其对“主观内容”和“客观形式”之间“对立、矛盾和矛盾解决”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逻辑阐发中，我们也看到了“差不多是关于辩证法的最好的阐述”。（列宁语）

四

西方古典美学关于“理想”范畴的思想是美学史中重要的理论发明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诞生之前，它较好地解决了美学的核心问题，即人在美的本质中的主导地位问题；较好地阐释了美学中的三大矛盾统一问题，即感性与理性的矛

盾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统一；较好地导入了关于美的三个基本观点，即社会观，历史观和实践观；较好地运用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美学思维方法。这“一个方法”“一个核心”“三个矛盾统一”和“三个基本观点”就是“理想”范畴主要的美学价值所在。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康德的“理想”是建立在“人的意识”之上的，是意识产生理想，这表现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特征；而黑格尔的“理想”则来自“理念”，来自“绝对精神，”这又表现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

“理想”的真正基础和最终根源在哪里？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其基础和根源只能是物质世界和人的实践。“理想”产生于人的生活，反过来又指导人们创造理想的新生活，创造美的未来。这种生活——理想——理想的新生活（美）的循环反复和螺旋上升，就是“理想”的美学历程或公式（参见拙文《论生活、理想与美》、《学术研究》1996年增第6期，或中国人民大学《美学》复印资料月刊1996年第12期）。“理想”范畴的根本美学意义也在此。

另外，在西方古典美学中，康德将“理想”等同并局限于“人的美”；而黑格尔等人则将“理想”等同并局限于“艺术美”。这也是不恰当的。实际上，“理想”并不是美本身，而是美的一种蓝图，一种因素，理想的实现才是美。另一方面，“理想”的天地广阔得很，除了有关于“人本身”、

关于艺术的理想之外，自然、社会、家庭、道德伦理、科学技术、家庭等凡是人涉及的领域都有理想的存在，也都有美的存在。

①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缪灵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4、129页。

②③④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2、28、50页。

⑤⑥达·芬奇，《绘画论》，载《西方美学史》上卷，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1979年版第159页。

⑦⑧⑨⑩狄德罗，《谈演员》，载《西方美学史》上卷，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7-268、269、268、269页。

⑪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页。

⑫⑬⑭⑮⑯⑰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0-71、71、74、201页。

⑱⑲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1、92、195、135、356、3-4、312、5、91、91、171、201、223、224、224-225、335、198、202、313、225、39、159页。

作者王强东，广东省社会科学院(510620)

责任编辑：陶原珂

“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

——试论王绩的佛学思想及其文学实践

□ 张海沙

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是由隋入唐的著名诗人。在初唐诗坛尚笼罩着梁陈余习、盛行绮靡与雕琢之风之时，王绩却明确地提出诗歌创作旨在“会意”的主张，并且形成自己平淡疏野的诗风，创造出悠远的意境，在初唐诗坛独树一帜。达到了他人所不及的思想与艺术的高度。《四库全书总目》以为王绩之诗“气格遒健，皆能涤初唐俳偶板滞之习。置之开元天宝年间，弗能别也。”

①作为一名初唐的诗人，其文学活动却能突破时代的樊篱，开创新的风气，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位隐逸诗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并未得到应有的肯定，这使我们觉得更有研讨之必要了。

一、适意的生活选择及思想基础

王绩出身于一个儒学世家。其《游北山赋》②中曾自述其家世：“地实儒素，人多高烈。”唐·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也记述其家“历宋、魏，迄于周、隋，六代冠冕，皆历国子博士，终于卿牧守宰，国史家牒详焉。”王绩之兄王通乃隋末硕儒，聚徒河汾，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名重士林。而王绩，却选择了一条与其兄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这与王绩经历了不同的时势有关，而更取决于兄弟二人不同的思想性格。

王绩的第一次隐退，是在隋末扬州六合县丞任上。考其原因，他当时的处境确有危险。“君笃于酒德，颇妨职务。时天下将乱，藩部法严，屡被勘劾。君叹曰：‘网罗高悬，去将安所？’遂出受俸钱，积于县门外，托以风疾，轻舟夜遁。”

③此次隐遁，象多数文化士子在仕途受挫，处境危急之时选择退隐一样，王绩的直接目的是全身。但，在退隐之前，王绩曾在朝任秘书正字，与多数文人士子不同，他并未表现出政治的热情，却是请求署外职，只因“端簪理笏，非其好也”，④

也即嫌官场礼数烦缛。对于他的这一特性，作为儒学大师的王通颇为了解、也颇宽容：“通知绩诞纵，不婴以家事，乡族庆吊冠昏，不与也。”⑤

入唐之后，王绩又有过仕隐的经历。有唐建国伊始，君臣一派励精图治的气象。统治阶层也表现出思贤若渴，重用人才的倾向。对具有传统思想的知识分子而言，这实在是个一展雄才，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其时，王氏兄弟也颇有在朝者：七弟静为武皇千牛，兄凝为监察御史。⑥然而，待诏门下，王绩所恋的不过是良酿三升而已。从武德中待诏至贞观初，数年间，王绩没有做过干进的努力。贞观中，王绩因太乐府史焦革家有佳酿而求为太乐丞。但因太乐丞非士职不入清流有司不许。经王绩再三请求，竟破例授予，且从此以后，太乐丞成为清流，由此亦可见王氏兄弟在朝中的声望与作用。

王绩很清楚唐初国家走向大治这个历史背景，对其才学亦很自信，以王氏兄弟的在朝势力及朝廷公卿与王家的关系，他的仕途是可以走得相当顺利的。但他却自觉地选择了归隐的道路。如果说隋末乱世的归隐有保身的思想，则唐初治世的归隐却是一种率性自适的追求。这种率性自适的生活道路的选择，有别于当时主流文人的生活选择，它反映出王绩具有一种与传统思想有异的主导思想，这自然也会使王绩的文学活动表现出与当时的主流文学不同的风貌。

王绩的诗文中，多次有意地强调他的归隐是治世的归隐：

“管宁存祭礼，王霸重朝章。去去相随去，披裘骄盛唐。”（《赠李徵君大寿》）

“葛花消酒毒，萸蒂发羹香。鼓腹聊乘兴，宁知逢世昌。”（《食后》）

其《答处士冯子华书》更是清楚地分析了他归隐的背景、表现他归隐的趣向：

“乱极治至，王途渐亨。天灾不行，年谷丰熟。贤人充其朝，农夫满于野。吾徒江海之士，

击壤鼓腹，输太平之税耳，帝何力于我哉！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礼乐：元首明哲，股肱惟良：何庆如之也。夫思能独放，湖海之士，才堪济世，王者所须。……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适。琴歌酒赋，不绝于时。时游人间，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于北山，松柏群吟，藤萝翳景，意甚乐之。箕踞散发，同群鸟兽。醒不乱行，醉不干物，赏洽兴穷，还归河渚。蓬室瓮牖，弹琴诵书，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治世的归隐，区别于乱世，此种选择并非简单的避祸保身，而是有更深厚的思想基础。有的研究者谈到陶渊明与王绩归隐时论曰：“他们都逢乱世，无缘实现他们经世济时的理想。‘遇乱世不为苟存，不如避之以洁吾行’，在崇尚老庄，崇尚自然思想的支配下，都将急切入世建功立业转化为终于出世，归隐田园。”^⑦这种论断，无论是对陶渊明或对王绩，都有失偏颇。实际上，王绩在唐初的归隐，便并非乱世的生不逢时；其次，从现存有关王绩的文献资料中，也看不到他曾有过从急切入世建功立业到出世归隐的思想转化。那么，王绩归隐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这一问题可从王绩的诗中得到说明。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他的《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

“伊昔遭丧乱，历数当闰余。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余及尔皆亡，东西各异居，尔为培风鸟，我为涸辙鱼。”此开头一段乃是回顾隋末乱世的遭遇。“逮承云雷后，欣逢天地初，东川聊下钓，南亩试挥锄，资税幸不及，伏腊常有储。散诞时须酒，萧条懒向书。朽木不可雕，短翮将焉摅？”此段写他在新朝的归隐，写出这种归隐是他萧散性格的选择。“故人有深契，过我蓬蒿居。曳履出门迎，握手登前除。相看非旧颜，忽若形骸疏。追悼宿昔事，切切心相于。忆我少年时，携手游东渠。梅李夹两岸，花枝何扶疏。同志亦不多，西庄有姚徐。尝爱陶渊明，酌醴焚枯鱼，尝学公孙弘，策杖牧群猪。追念甫如昨，奄忽成空虚。人生讵能几？蹙迫常不舒。”此段追忆隋大业年间与兄王通隐处之时。其时，从兄受业者相趋成市，绩亦常携二三子游于山水之间，那种文化氛围，那种自然之乐，给过王绩多少陶醉，可风云变幻，倏尔兄逝，门人四散，良游不再。世情变幻与人事奄忽使王绩产生深深的感慨，引发出

深深的悲凉。这种心境，王绩曾多次表露，如《游北山赋》：“地犹如昨，人多已矣。念昔日之良游，忆当时之君子。佩兰荫竹，诛茅席芷。树即环林，门或阙里。姚仲由之正色，薛庄周之言理，触石横肱，逢流洗耳。取乐经籍，忘怀忧喜。时挟册而驱羊，或投竿而钓鲤。何图一日，邈成千纪。”如此深重的人事无常，生死奄忽的人生悲凉，如何得到解脱呢？前诗继续写道：“赖有北山僧，教我以真如。使我视听遣，自觉尘累祛。何事须筌蹄，今已得兔鱼。旧游倘多遇，同此释纷拿。”原来王绩是从释家思想中找到了解脱法门。

王绩学真如于北山僧，其结果是遣去视听、祛除尘累，悟得真谛后，甚而可脱离文本教义，由此可见出，王绩从北山僧处学的是大乘禅法。

禅法随佛教初传中土时，多为小乘，重实践、轻理论，如坐禅数息、作不净观等。自鸠摩罗什（343-413）、佛驮跋陀罗（359-429）来中土，将禅观与空观结合，融贯大小乘禅法，禅法表现出与大乘义学相结合的倾向。在禅定中观诸法实相（如如空性）、观诸法作用。对这个由定发慧，以至遣视听，祛尘累的过程，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⑧中是这样表述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文句简约而赅摄般若深广之义，在唐代广为传诵。玄奘译本在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出，然此译本既附有姚素鸠摩罗什所译之《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一卷，则罗什或亦译有《心经》，只是译本失传亦未可知。

关于王绩的阅读书籍，《新唐书》本传及《唐才子传》都依据王绩《答处士冯子华书》中所言：“床头素书三帙，《老》、《庄》及《易》而已，过此已往，罕尝或披。”以为仅此而已，实则不然，除老庄而外，儒家及释家经典，王绩都有涉猎，甚或读得颇为深入。他能从儒释道三家著作中吸

取思想养料。“昔孔子曰：‘无可无不可’，而欲居九夷；老子曰：‘同谓之玄’而乘关西去；释迦曰：‘色即是空’而建立诸法：此皆圣人通方之玄致，宏济之秘藏。实冀冲鉴君子相期于事外，岂可以言行诘之哉？故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践迹’，老子曰：‘夫无为者，无不为也’，释迦曰：‘三灾弥纶，行业湛然’。夫一气常凝，事吹成万；万殊虽异，道通为一。”（《答程道士书》）。在运用三家圣人之语录以说明自己超然物外，随顺自适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时，王绩真可谓得之于心，应之于手。

初唐时期，历史兴衰与人事变迁的感叹普遍地弥漫。将人生看得变幻无常，有许多文人士子归依了道家。特别是自南朝葛洪《抱朴子》将内丹外丹之说相结合后，道教徒众们游于方外，居于山林，修性炼丹，养生服药，其长生之术吸引了朝野不少人士。有许多隐士亦以成仙、登仙作为超脱的目的。唐初隐士卢鸿一便如此。其《期仙磴序》云：“期仙磴者，盖危磴穹窿，迴接云路。灵仙仿佛，若可期及。儒者毁所不见则黜之，盖疑冰之谈信矣。”^⑨其词表现出作为山中之人的神仙之好。对于道家的登仙之想，成仙之术，王绩屡有批评，《田家》：“阮籍生年懒，嵇康意气疏，相逢一饱醉，独坐数行书。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草生元亮径，花暗子云居，倚杖看妇织，登垅课儿锄。回头寻仙事，并是一空虚。”《赠学仙者》：“采药层城远，寻师海路赊。玉壶横日月，金阙断烟霞。仙人何处去？道士未还家。谁知彭泽意，更道步兵耶？春酿煎松叶，秋苏泛菊花。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

较之于那些看透人事却看不透人生、追求精神超脱却又执着于个体生命享受的一部分道教信徒，王绩的虚无观更为彻底，王绩的解脱也更为透彻而自在。“张衡赋《四愁》，梁鸿歌《五噫》，慷慨□□□，憔悴将焉如？纷吾独无闷，高卧喜闲居。世途何足数，人事本来虚。三王无定策，五帝有残书。咄嗟建城市，倏忽观丘墟。明治若不足，昏暴常有余。寄言忘怀者，归来任卷舒。”（《端坐咏思》）在《游北山赋》中，他有这样的语句：“但水月之非真，譬声色之无佛。过矣刘向，吁嗟葛洪。指期系影，依方捕风。谁能离世，何处逃空。”这里所表露的，分明是《金刚经》的思想了。《金刚经》云：“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

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尊曾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王绩的虚无观非以空灭色，乃即色是空：王绩的解脱非以成仙为途径，而以率性自适为通达。王绩的归隐，更多地是接受了释家思想的影响，在释家思想中，又主要表现为大乘禅学思想。

二、会意的文学主张及其实践

王绩所接受的是大乘禅法的影响。王绩所处的时代，达摩传下的禅宗正处在道信时期。此时的禅师，一般已不再象从前行头陀行，而是定住山林，且广聚徒众。到道信，禅宗以《楞伽经》传授，注重于领悟佛语心，禅法的宗旨是“忘言、忘念，无得正观”，贵领宗得意，不拘于文字。^⑩

王绩亦有诗表现他的禅法思想：“万里疏烟壁，千龕对日宫。瞻颜犹不暇，合掌更难穷。岭路横镌断，山心暗凿勇（通）。真如何处泊？坐费计人工。”（《观石壁诸龕礼拜成咏》）诗中对凿壁龕佛、合掌礼拜的形式表示不以为然。真如在于心灵的领悟，它不滞于具体的事物，这种思想，与后世禅宗的发展有相同的旨趣。^⑪重意趣——即率性保真的意趣，轻形式——包括生活方式的选择、交往的礼仪及言语的表达，这便是王绩的主导倾向。

以这样的主导倾向为基础，在“琴歌酒赋，不绝于时”（《答处士冯子华书》）的烟霞山水生涯中，王绩明确地表露了自己文学创作的主张：“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答处士冯子华书》）所谓“会意”，即文学艺术的创作，重在创作主体主观意兴的表达，即使描写客观事物，也重在把握对象与主体心境相符的整体特征。以这种创作思想为主导，作者一般不会对客体事物作外形上的细致描绘，而是将自己的感兴融汇到客观事物中，从而创造出浑然的意境。王绩在初唐时期所选择的生活道路，并非是主流文人的选择，而王绩在初唐时期所提出的创作主张及其创作实践也与主流文人迥异。但王绩的作品，却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它是唐代诗歌对意境追求的先行者。

清编《全唐诗》将王绩所存诗编为一卷，计

55首，残篇4。可以肯定这决非王绩作品的全部。而就在这现存的作品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不同于南朝文人诗作雕琢藻饰的另一种气象。他把握景物的神韵，融入自己的人生体验，使得作品生趣盎然。

《题黄颊山壁》：“别有青溪道，斜亘碧崖隈。崩榛横古蔓，荒石拥寒苔。野心长寂寞，山径本幽回，步步攀藤上，朝朝负药来。几看松叶秀，频值菊花开。无人堪作伴，岁晚独悠哉。”这首诗以崩、古、荒、寒修饰榛、蔓、石、苔，并没有对景物的外形作细致地刻画，而是把握景物崩塌、悠古、荒漠、寒峭的神韵，以此作为作者心境的象征，表现他疏于人事，散诞纵逸的个性。在此基础上写出幽径与野人的两两相得。这种写意的手法，使诗歌含意隽永。在初唐诗坛，王绩首开风气。

王绩诗歌的总体风格是一种写意的疏放，这种风格表现出的是重意会而离形迹的审美追求。王绩最受人称道的是《野望》一诗：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还，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此诗所表现的是一种少有的人生悲凉与冷漠的超脱。它似乎在写作者的心理历程：薄暮远望、徙倚何依，表现出的是人生的觉醒和对精神归依的渴求。秋色千树皆是，落晖万山染遍。这里作者渲染一种悲凉气氛，它是作者心中空幻人生、悲剧人生的外相。牧人猎马，驱犊带禽，是世人因循的生活，于平常中留有一种温馨。可是，超越于生活的作者，感到的是孤独与悲凉。全诗以秋暮为背景，写出生命的悲剧意识。

王绩诗歌以传神的手法写景，在诗作中注重主观意趣的表达，在诗歌创作中，标志着南朝以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南朝文人诗的创作，由谢灵运开其新风，一变魏晋的古朴，而开始追求声色。谢灵运的诗歌较之陶渊明，由写意转到摹象，由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语言。^⑫谢灵运的山水诗与其佛教思想的关系已有人作了初步的研究。^⑬我们以为，如果说从陶渊明到谢灵运是诗歌由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转变，则从谢灵运至王绩，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王绩开始，中国诗歌开始了意境的自觉追求。既将写意与摹象、象征与写实的手法相结合，将主观的情感与客观

的景境相融合，创造出情景交融、主客体融贯的艺术境界。而谢灵运的模山范水与王绩的心物交融的艺术方式的形成，与各自所接受的佛学思想之不同有很大关系。

谢灵运与佛教有很深的关系，在禅学方面亦颇有造诣，他曾作有《辨宗论》，阐发当时名僧道生的“顿悟成佛说”。^⑭但谢灵运主顿悟说与后世禅宗南宗不同，他强调顿悟之前的积学。顿悟由积学而至，同时强调依教起信，并非教外别传。积学与依教，是悟入的条件。在这样一种总的思想指导下，谢灵运对于形式甚至是仪式，都是较为注重的。

据汤用彤先生考证，^⑮谢灵运于18岁那年参加过慧远、刘逸民等123人在庐山立誓往生净土的盛会，可见谢灵运对弥陀净土的信仰。慧远闻说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龙所留之影，便欣感交怀，听西域道士叙其光相，便背山临流营筑龛室，妙画佛影。谢灵运秉慧远之旨，作《佛影铭并序》，其辞曰：“夫大慈弘物，因惑而接，接物之缘，端绪不一。……因声成韵，即色开颜，望影知易，寻响非难。形声之外，复有可观。观远表相，就近暖景，匪质匪空，莫测莫领。倚崖辉林，傍潭鉴井。借空传翠，激光发。”^⑯这种重形迹的观点与王绩大不一样。

谢灵运在禅定中，将佛作为清净相好的观想对象，通过对彼岸世界的清净观，一步步地移性入境，最后达到内外寂照的顿悟。而自然山水则成了清静境界的化身和象征。谢灵运对自然山水的声影形色细细地观览、品味、体悟，在自然中久久地留连、依止，他的自然山水诗便是这种心境和禅境的表现。

谢灵运的山水诗，最醒人眼目的是他对颜色的运用，这一点似少有人论及。实际上，颜色在谢灵运笔下有着某种象征和启示意义。

《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闻汾水游，今见尘外。鸣笳发春渚，税釜登山椒。张组眺倒景，列筵瞩归潮。远崖映蓝薄，白日丽江皋。原隰夷绿柳，墟囿散红桃。……”^⑰这首诗中，谢灵运将黄色作为世俗崇高象征，并为名教所用，而与之相对的尘外境界，却以蓝、白、绿、红的颜色绘出。谢诗中，常将白与绿、红与绿对偶或连用，以绿色为基调（或接近于绿色的青、蓝

色),以这种冷色调造成宁静而富有生机的效果,配之以白色,增几分清澈与空澄,配之以红色,增几分秀美与艳丽。

我们无意说谢灵运在其山水诗中描摹西方净土变,但在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中,从构图以至着色,寄托他的净土向往也是极为自然的。谢灵运所处的时代的确是灾难深重、生命朝不保夕的时代,净土思想曾给过人们极大的精神安慰。谢灵运终在广州被弃市,临刑前,他作了一首《临终诗》,表达他对来生解脱的希望。^⑩

王绩有幸由隋入唐,处身在他称之为“盛世”的历史时期。在初唐宽仁怀民,广开才路、励精图治的统治政策感召下,文人士子洋溢着举宏图、创大业的热情步入仕途。而王绩却选择了退隐,他并非是为保己身或修来世,而是追求率性自适,追求个性的张扬。因此,仕途上的退隐就并非是消极的人生退缩,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对人生的积极追求与进取,体现出在大唐盛世这个历史背景下,对个体生命的肯定,对主体意识的注重的积极精神。也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王绩提出,诗歌以“会意”为功,实际上也就是让诗人的个性、主体意识在诗歌创作领域得到张扬。客观的景物,只有融汇了诗人的主观情感、经过诗人的心灵浸染之后,才会带着诗人鲜明的个性特征在诗中描绘出来。比较起南朝诗人对景物的细致刻画、对事物之外形与色彩的玩味,王绩的诗歌代表了一种新的风气,它标志着唐代诗歌创作已开始了对意境的追求。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②本文王绩之作品均引自《王无功文集》。

③吕才《王无功文集序》。

④吕才《王无功文集序》。

⑤《新唐书》卷一九六。

⑥唐初公卿中,多有王通之门人或旧游,如温彦博、杜淹、魏徵、陈叔达等。贞观初,王绩兄凝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王代兄弟皆抑而不用。但有杜淹与魏徵屡在朝奏称王凝之朴忠,侯君集反状不久也明后至诛伏。因此,兄凝之得罪长孙太尉,对王绩并未有直接威胁。

⑦《陶渊明与王绩的归隐比较研究》,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

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又称《心经》有唐代的好几种译本;玄奘译本;般若与利言等译本;智慧论译本;法成译本。

⑨《全唐诗》卷一二三。

⑩参见吕《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⑪开元中,南岳怀让禅师对常习坐禅的沙门道一说:“汝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见《五灯会元》卷三。

⑫参看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大出版社1987年版。

⑬齐文榜《佛教与谢灵运及其诗》,《文学遗产》1988年第三期。

⑭《广弘明集》卷一八。

⑮《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一章,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⑯《广弘明集》卷一五。

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二》,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⑱《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

作者张海沙,暨南中学中文系文学博士(510630)

责任编辑:童 轩

改革尝试与学派的追求

——评劳承万教授主编的《文艺学美学丛书》

□ 申家仁

劳承万教授继《审美中介论》之后，接连推出了《审美的文化选择》、《人类审美深层结构论》、《诗性智慧》（节奏韵律论）、《美学文艺学逻辑体系探索》等卓有影响的著作，取得可观的学术成就。出任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后，积极罗致人才，同时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扶持、提高教学科研水平，使偏于南国一隅的湛江师范学院出现一个文艺学美学研究群体，陆续推出了一套《文艺学美学丛书》10本。

这套《文艺学美学丛书》内容涉及中文系各学科。其中有写作研究，如刘海涛的《主体研究与文体批评》和梁家尼的《散文本体论与创作》；有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如林衡勋的《中国艺术意境论》；有西方文论研究，如李璠平的《西方文学评论方法演进》和赵志军的《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研究》；有比较文学研究，如蔡茂松的《比较神话学》；有当代文学研究，如李干的《超越与流变中的思索》；有政治文化与新文学研究，如黄水源的《政治文化与中国新文学》；有诗学、美学、文化哲学研究，如刘士林的《语言与它的梦》；有美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研究，如劳承万等人的《文学与语言的现代探索》等。丛书的总序披露，丛书编辑、出版来源于他们对大学中文系科研与教学如何结合的思考，是他们进行教学改革尝试的成果。

长期以来，大学中文系的基础理论僵滞于社会一历史学派的残缺框架上，无视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发展和大量成果，同时，教师个人的科研与教学严重脱节。劳承万和他的同事们非常不满意这种现状，决心进行教学改革，一方面刷新教学内容，一方面建立教学科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的教学体系与机制，把学术成果转化到教学上。

在建立教学一科研新体系新机制方面，他们首先尝试以一种现代形态的基础理论作为学术基础，建立自己崭新的文艺学美学理论体系。为此，他们在充分吸收主编劳承万的美学文艺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沟通各家各派之长，融汇时代精华，缩多为一，编出一套（3本）“美学—文艺学—写作学”教材。他们认为：“美学是属于哲学（最高层次）领域，它从基本原则和逻辑起点上，指导文艺学体系的逻辑建构；文艺学属于文艺理论（中间层次）领域，它从基本原则和逻辑起点上，指导写作学理论的建构；写作学属于文艺理论的操作技巧（第三层次），它从基本原则和逻辑起点上指导审美主体（写作个体）的操作性、实践性技巧体系的运演”^①。同时，他们又从一到多，从美学、文艺学、写作学基础理论向外辐射，向内开掘，进行各种基础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特别是在文学史学科，以论阐史，以开放的理论眼光和新的研究方法在阐释的层面上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把科研课题和成果纳入教学系列，开设出各门选修课，让学生在多个领域、专题、角度、侧面深入学习，开阔眼界，开动心窍。我国高等教育本来有着教学科研结合的优良传统，解放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的课程往往就是他们的研究课题，在教学中出科研成果，把科研成果拿来教学。只是解放后受苏联的影响，才出现教学科研脱节的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如今，劳承万等人尝试使高校回归到原先的优良传统上来，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从学术价值的角度来看，这套丛书有

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富有理论的启悟性。这套丛书每一本都有较强的理论价值，能给人以启悟。因为，作者们都力图求“生”、求“深”、求“新”。求“生”即研究别人不曾涉足或涉入不深的领域，直接从文学现象或创作实践中总结出理论。例如刘海涛的《主体研究与文体批评》，除了论述文学创作主体的机制与特性、主体运思的方式之外，还深入研究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从大量作品范例中总结创作规律和写作技巧，发人所未发，无论对微型小说的写作与阅读都有指导意义。特别是他对微型小说的“意外结局与反转样式”、省略构件与遮掩谜底”等情节技法的精彩总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此，微型小说界佩服刘海涛的写作理论，誉他为“微型小说研究专家”。黄水源的《政治文化与中国新文学》对“周恩来文艺现象”进行深入剖析，从中寻找权力政治与文艺生活的契合点，建立“权力政治与文艺”的分析模式，也是别人不曾做过的工作。

别人研究过的问题，不等于就失去了研究价值，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求新的研究，同样有理论的启悟性。例如，“意境”问题，古往今来的研究可谓多矣，但林衡勋不避其熟。他在梳理“五四”至“文革”的意境研究成果之后，独辟蹊径，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和系统方法，对中国美学之网的“网上纽结”——意境进行了四个维度的综合研究：“意境与中国独特文化关系研究”探讨意境与中国哲学、中国语言文字的深层次关系；“意境历史研究”，分析意境生成的自然历史过程，确认意境是中国美学、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意境逻辑研究”探讨意境的共时结构，考察其包含的各种要素、规定的关系，揭示其如何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矛盾运动；“意境与现代美学及艺术现代化关系研究”分析意境论的永久生命及其现代意义，从而写出了煌煌 38 万字的《中国艺术意境论》，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把意境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高度，得到国内意境研究同行的高度评价。

求“深”则是向理论的深度掘进，集中力量突破性地研究某一专题。这套丛书的一些专题研究是有相当理论深度的。例如《文学与语言的现代探索》里劳承万教授所写的《论节奏感的分化过程与物化》一文，就节奏与人的节奏感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透彻的专门研究，揭示了从现实世界中节奏性活动到人类大脑结构中积淀的“节奏感定型”的历史演进模式，剖析了节奏性的几个要素，论证了从“节奏性”环节过渡到“节奏感定型”环节再到节奏感物化（外化）的链型结构，从而归纳出“节奏感 = 人的艺术存在”的双向互逆关系，阐明节奏感成熟的历史，就是人作为艺术存在的成长史。像劳承万这样深入研究节奏与节奏感的，在国内美学界还不多见，因而这无疑有理论的启悟性。

第二，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例如梁家尼的《散文本体论与创作》，从本体论视角对散文概念与观念的流变和散文的内在特质，以及创作主体的本质自由进行深入阐述，所以体现出与其它散文理论不同的独家面貌。李瑀平的《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演进》也不像其它关于新方法的著述那样孤立地阐释各种方法，而是选取“演进”的视角，“把本世纪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重大进展与 19 世纪以前的文学评论方法所奠定的基础联系起来考察”。并且给自己的研究立下三条原则：整体性原则、转折性原则、内在逻辑勾连原则，“在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变的过程中，寻找导致方法论发生转折或变化的关节点，抓住西方文学评论方法的整体走向，同时在各种方法之间仔细寻绎他们之间的联系，证实它们之间联系的接点及其相互间的互补性，从而让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整体脉络显示出来”。因此，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称赞此书“与那些拼拼凑凑的书不同，有力度和深度”（见该书《序》）。关于新方法的书我也读了不少，但最受启发的当属这本有自己独特视角的论著。蔡茂松的《比较神话学》，则把一个本来很容易弄得浮泛的比较神话课题写得集中而深入，成功的关

键就在于他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这一视角展开研究。

第三，具有理论的开放性和综合性。从书作者们所运用的理论武器，除了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之外，我们还可以见到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审美发生学、认识发生学、经验美学、生命哲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现象学等等，他们所运用的方法，除了社会—历史方法、逻辑方法之外，还可以见到系统方法、比较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数学方法等等。这套丛书是研究文艺学美学的，但其中渗透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字学、语言学、心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学科知识。劳承万和他的同事们，在丛书里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成果，运用多种理论武器，多方寻求理论支持，采用多种新方法，表现出广泛的学术容受力，使这套丛书体现出强烈的开放性和综合性特点。例如，《文学与语言的现代探索》中翁家禧的《魏晋诗歌的生命情结》一文，运用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说为武器，探视魏晋诗歌的生命底蕴，其中又吸收存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魏晋士人对待死亡的心态，把魏晋士人的心态和魏晋思潮的社会心理根源分析得颇为中肯。又如林衡勋在审视了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叶维廉、吴战垒、钱仲联、吴奔星、胡经之、叶朗、张少康、劳承万、兰华增等几十人关于意境的观点，广泛吸收理论营养之后，这才确定自己的研究坐标和突破点。后继者总是以前行者为参照系和前进基础的，丛书的开放性和综合性特点，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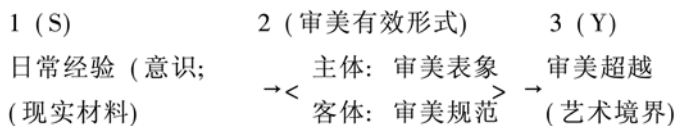
这套丛书还体现着劳承万和他的同事们对建立学派的追求意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形成了以劳承万为核心的学术群体。这套丛书的著者有20多人，其中有多部学术著作的有10多人，这是一个有相当实力和梯队结构的学术群体。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这套丛书是各人充分发挥自

己的主体作用和学术功力的结果，但大家都肯定主编劳承万的组织指导作用。不少人在论著前言后记中特别提到劳承万关于建构新的教学—科研体系的设想，以及他对自己完成专题研究的促成作用。

二、前述三本一套一体化的教材（《现代美学原理纲要》、《现代文艺学原理纲要》、《现代写作学原理纲要》），其“美学抓住主体形式感与客体形式结构的互逆（双向生成）结构，文艺学抓住语言·形式感内化—外化—交流与互补，写作学抓住语言·形式感外化的操作性技巧”^②，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可以简称为形式美学体系。我们读这套丛书，不难发现作者们程度不同地认同了这一形式美学体系。例如，大家都偏重于艺术形式的本体研究：如本体诗学研究（刘士林）、艺术形式本体研究（赵志军）、微型小说的本体研究（刘海涛）、散文本体研究（梁家尼）、意境本体研究（林衡勋）……等等。刘海涛在论述创作主体的机制与特性时说：“凡是和艺术家的气质、性格、情绪、情感、理想能够吻合同构的生活信息，便被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同化了，而成为凝结了创作主体的本质力量、体现艺术家个性色彩的艺术对象。……没有这种审美心理结构，创作主体的本质力量就不能发挥，艺术生产的对象就不可能形成。”这里就是运用他们的理论体系来分析问题的，只是把“主体形式感”换成“审美心理结构”这个更常见的概念罢了。从书中劳承万的《论节奏感的分化过程与物化》一文，则更是运用其理论体系来研究美学专门问题的一个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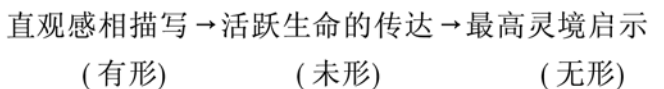
三、劳承万是以《审美中介论》崛起于中国美学界的，擅长运用中介思维。这套丛书的作者们受主编的影响，也自觉运用中介思维。例如，赵志军在审视俄国形式主义关于“形式消灭内容”（材料）这一论断时，运用中介思维指出其片面性：“形式对材料的克服、变形，实际上就是审美超越，而审美超越在劳承万先生看来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从图表上看,从S系统到Y系统,必须经由审美有效形式这一中间环节(中介)俄国形式主义在研究文学创作这一审美超越形式时,只涉及了审美有效形式中的审美规范这一项,即只研究节奏图式、格律、情节分布构造规律。……”又如刘海涛在专著的《文学与语言现代探索》一章中也提到他是在中介思维启发下入手研究微型小说写作规律的。从书中有些作者虽然没有明说运用中介思维,但他们实际上也成功地运用了中介思维解决问题。如蔡茂松抓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一中介环节比较各民族神话,梁家尼、李干分别抓住创作主体的心理结构这一中介环节研究散文和报告文学,等等。

四、常见劳承万所喜欢采用的公式、图式论述方式。大凡读过劳承万美学论著的人都知道,他很喜欢采用公式、图式来简化和概括自己的观点与结论,他还把自己的这一论述方式引进到集体编撰的三本一套的教材之中,使之成为集体风格。丛书与教材不同,是个人论著,但也可以常常见到公式或图式的简化、概括方式。例如,梁家尼在评述宗白华“因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描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个层次”的三层次观点和王夫之“有形发未形,无形君有形”这句话,对意

境的层次结构作哲学概括时,便使用了一个图式把宗王二人的观点的相通之处揭示出来:



从而得出“因此我们创作散文的意境,必须作好这三个层面的营构”的结论(《散文本体论与创作》)。又如,赵志军在论述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时,为了说明“陌生化程序(手法)根据潜在形式的要求对潜在材料进行选择加工、变形,然后制成文学作品”这一过程中,也用图式加以简化。此外,刘士林评述结构主义诗学时也用了简明图式,刘海涛剖析《文心雕龙·神思》的结构与主旨时也用了简明的图式,蔡茂松在归纳人类起源神话和各国的开天辟地神话时也都用了简明的图式,等等。这些公式、图式的运用,使阐述与论证的问题与观点变得更为简明、显豁,也更富于理论概括性。

正如劳承万在丛书的总序中所说的:“丛书编辑的成功,表明了在经济大潮日夜拍打、‘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地方,仍有‘智慧的痛苦’,仍有纯洁而高贵的精神求索,仍有‘合目的性’的灿烂星光。”

①《美学文艺学逻辑体系探索》,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②劳承万主编《现代文艺学原理纲要》前言,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作者申家仁,佛山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陶原珂

说『最』

二一「取、最之分合及其与聚、撮之关系

“殿”则变为劣绩,不但无功无赏可言,且要受罚。如《汉书·宣帝纪》:“课殿最以闻”;《后汉书·百官志》:“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史书有些“最”字虽明指军功,实际上包含骁勇善战、率领有方,与“犯取”之本义关系极为密切,如《史记·周勃世家》:“汉王赐勃爵为威武候,从入关中,拜为将军...,攻槐里、好畤,最。北击赵贲、内史保于咸阳,最。...攻曲逆,最。”对三“最”字若不囿于古注“军功”,联系“最”字的本义考虑,理解当更为具体、明确。

除殿最字外,“最”字的常用义为表程度之“极也”“最也”,此“最”字亦为由本义之引申再引申而得,即由犯取一军功等级一优劣一程度之最。“最”字表程度,迄今仍沿用,且为常用词,不过由实词通过引申使用而演变为虚词,盖有一逐步虚化过程。例言之,前述周勃“攻××,最。”之“最”,看似指军功(名词),实为奋勇破敌之精炼概括,基本上包含了“犯取”本义。“军功上曰最”之“最”,已由“犯取”义动词,变为“军功”义名词,引申脉络明显可见。“课殿最以闻”,“最”字虽仍为名词,但已较含糊、抽象,不象“军功上曰最”之最那样具体、确实。晋束皙《饼赋》:“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凝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最”字是动词“为”后的宾语,虽仍属名词(实词),但已相当虚化。至如王羲之书《黄庭经》(字帖):“五藏为主肾最(最)尊”,以及苏东坡书《醉翁亭记》(字帖),“年又最高”,二“最”字已完全虚化成为修饰形容词之副词。今天常用的最大最小最好最坏之“最”,与王、苏字帖之二“最”字,正是一脉相承,可见“最”字之完全虚化为副词,已使用千年以上。

至于义为“都凡”“概要”“总括”“总计”“聚会”之“最”,就字理而论,则应为“撮”字。《说文》:“撮,积也,从冫从取,取亦声”,与从曰从取之“最”音义皆别,本属二字,只因形近,汉以后即混同不分,经典史籍遇“撮”义字亦皆以“最”字代之。按,“撮”字从冫从取,冫者藏也,取而覆藏之则日渐增多,故训为“积”,与聚积之聚,音义并同。《史记·殷本纪》:“帝纣...好酒淫乐...大撮乐

“最”字,《说文》训为“犯而取也,从曰从取”。读为冒突之冒,从曰从取,会意为冒突而取,亦即《段注》所谓“犯而取犹豕而前也”,豕亦冒义,豕而前即不顾一切而前之意。犯而取之“最”盖来源于军事行动,具体指冲锋突前。徐锴《系传》所注“军功上曰最下曰殿”,即指犯取敌阵所建之军功,“最”指突前,“殿”指护后,突前即犯取之意。殿最字史书习见,本来“最”与“殿”都属有功之将,只是“最”为上功,“殿”为下功,等级不同而已,后经演变情况即有所不同。“最”、“殿”之表军功,是直接由犯取本义引申而来,再由军功引申至政绩,由上功、下功再引申为优、劣,“最”属优等,固当有功受赏,而

戏于沙丘…为长夜之饮。”徐广曰：“最一作聚”。《管子·禁藏》：“冬收五藏，最万物”，唐·尹知章注曰：“最，聚也。”《管子校证》：“最万物，丁（士涵）云最当作最”。是皆可证“最”为聚积之义。由聚积引申为总计、总括、概要、都凡，如《汉书·严助传》，“愿三年计最”，颜师古注引晋灼曰，“最，凡要也”，（凡，总计。要，概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最从高帝得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索隐》：“最，都凡也，谓总举其从高祖攻城克获之数也”。又，《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最大将军青，凡七出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师古注曰：“最亦凡也”。又，《资治通鉴》（汉武帝征和二年）：“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胡三省注曰：“最，大要也”。诸“最”字，义或为总计，或为概括，或为大要，本为“最”字之义，因最、最混同，而以“最”字代之。

《说文》篆文最、最二字虽分列部居，义不相涉，但解释二字的训释词则最、最混同，且与经籍一样，遇“最”义字皆以“最”字代之，如二部“凡，最括也”，人部“儻，最也。”最括即最括，总括之意。儻字，《广韵》曰：“聚也，”（最、聚古通用）。是凡、儻二字之训释词“最”，按理均应为“最”。为何同一本书会有这种前后抵牾，字义相混的情况？是许慎疏忽抑或后人妄改？《段注》本将二“最”字径改为“最”，并于“凡”下注曰：“最，各本作最，最者犯而取也，非其义，今正”，于“儻”下注曰：“各本误作最，今正。”既然“各本作最”，惟有《段注》本改为“最”，是否各家皆误，只有段氏慧眼独具？对这类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审慎衡度，窃意是否可考虑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看：从微观就字论字来看，段氏对二字之分辨析释实有必要，且对学者理解最、最二字之分合关系很有启发，但是改字则可不必。其实如就宏观，结合最、最二字的实际使用情况从全面看，则《说文》凡下儻下之“最”字解，并不为错，因为最、最不分相沿已久，在实际使用中，“最”之义已包含在“最”字之中，一般读者、用者也只知有“最”而不知有“最”，《玉篇》距《说文》

时代不远，也只收“最”未收“最”，曰：“才会切，最，齐也，聚也”，“聚也”即“最”字之义，说明最、最早已混同。《说文》与后世字书不同，它不仅为读经服务，且为当时今古文经之争服务，许慎为古文经学派，基本上不沾讖纬，而专注字之古形、古义，据字之形、声，析释字义之所从来，故《说文》为专析汉字本义之字书。既如此则最、最二字之形和义当然要分别部居加以析释。而用以解释最、最二字的训释词则不同，以今语释古语，以俗语、时语释雅言，以通语释方言殊语，则为《说文》常例，最、最二字在使用中既通用最，则训释词当然只用最而不用最。

这一点前代治《说文》者也并非没有顾及，如徐锴《系传》凡、儻二字和大徐本一样皆以通用之“最”字训之，而于曰部“最”下则曰：“最，犯而取也，又曰会，军功上曰最下曰殿”。说“又曰”乃谓另有一义，会者聚也，指“最”之义，说明“最”字包含有犯取和聚积两主要义项。“军功上曰最下曰殿”乃承犯取而言，说明军功之最、殿之称，盖缘自犯取。这一注解言简意明，对后世理解最、最混同后最字其实包含有“最”义极有帮助。但段玉裁却不以为然，谓“一曰会”乃“浅人增之”，其惟一根据是《韵会》引《系传》此文并无“又曰会”三字。此说即使有理，孤证也不足为据。又，段氏于“最”下之注，也有可商，《段注》曰，“古凡云殿最者皆当作从冫字，项岱曰：‘殿，负也。最，善也’。韦昭曰：‘第上为最，极下为殿’。孙检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樊哙传曰：‘攻赵贲、下郿、槐里、柳中、咸阳，灌废丘，最。’此皆殿最之最。张晏曰：‘最，功第一也’。如淳曰：‘于将帅之中功为最也’。”祺按，殿最字缘自“军功上曰最，下曰殿”，乃直接由“犯取”之“最”引申而来，不应改为“最”。“最”义为聚积，军功之“最”非由各次军功聚积而来，实指每次战役所建之功。表示建功之积累则为“阅”字，非“最”字。《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古者人臣功有五品…，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又，王运《武提督碑》，“缘江转战，曾不半载，收安庆、庐江、无为、巢、和、含山，上功皆最，积阅阅，记名总兵、褒号‘振

勇’”。“最”字分指安庆、庐江、无为…等每次战役之军功，故碑文于“最”前加“皆”字修饰，“阅阅”乃指建功之积累。段氏之误在于混淆最、撮二字的不同概念，其所引材料，经查对，原文都是“最”字，材料本身并不错，经段氏改“最”为“撮”，则变为谬误。清·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曰：“今所引诸书最字并改为撮，不免遗误后人”。钮说是也。

因撮、最混同，撮字在传世文献中已难得一见，但“撮”义之应用仍延续未湮，除合并于“最”中之外，主要转移在“聚”字和“撮”字之中。撮与聚古多通用，前引小徐本之“一曰会”之会即“聚”之义。撮、聚二字声、韵皆同(同为 d z i o)，义也相通。所谓相通并非完全同义，仅指二者有部分义项相同。聚字之本义为古之邑落，《说文》曰：“聚，会也，从众取声，邑落云聚”。“会”为通义，“邑落”乃具指，聚字从形符“众”见义，邑落为人聚居之处，故邑落也可称聚，《说文》聚下所说“邑落云聚”当有所本，殆为当时的常用语。撮字之本义为“积也”，“积”亦通义，具体言之则特指财、物之聚积，故其直接引申义为总计、合计，再引申则有概括，大要、都凡等。所谓聚、撮古通，主要是指所含聚会、聚合这一义项两字相同，故相通用。“撮”义之转入“聚”，也仅为聚会、聚合这一类义项。其余“撮”字之义则大多转移于“撮”字之中，如《史记·太史公自序》：“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撮要谓概括综合而摘取其要，撮乃“撮”之义。《文心雕龙·明诗》：“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明矣”，撮，概括之意。《文心雕龙·序志》：“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撮题，概括提示。又，《元典章·户部八·契本》：“认定门摊，与日收税，撮算比附，每月额办”，撮算，总计核算。上引“撮”字皆“撮”之义。尚有音韵术语“撮口呼”，撮口，聚口使圆，撮义为聚，亦撮字之义。“撮”义转移入“撮”也只限于如此之类的部分义项，不可系联太宽。这里牵涉到形声字的声符表义问题，一般而言形声字的声符多数只起标音作用，只有一部分声符兼表义，甚至有些形声字的含义，如单就该字之形符析释则不得其解，如从声符探求便会豁然贯通。如

前引“撮题”、“撮算”之撮，如单就形训，或求之于《说文》所训“撮”之本义，皆难得确诂，如考虑撮之声符受义，因声而求义，则可知撮字所含概括、总计之义原为声符“最”所受，亦即来源于“撮”义。但是，用声训要严谨，如牵扯过宽，则过犹不及，容易引致谬误。如《庄子·秋水》：“鸱鸺夜撮蚤”，有的注家据《释文》：“撮，崔本作最”及许慎注《淮南·主术篇》：“鸱夜撮蚤蚊”曰：“鸱夜聚食蚤虱不失也”，就以撮作最而解为聚，此即牵扯过宽之误。“撮蚤”之撮之声符只起标音并无受义作用，撮蚤即捉蚤或抓蚤，至于捉蚤为何用“撮”，则应从撮字之本义考虑。按撮字，《说文》曰：“四圭也，一曰三指撮也，从手最声”。“撮”为古表容量之称，六十四粒黍之容量曰圭(见《广韵》)，四圭叫一撮，即三指所撮取之黍粒之量，三指撮与四圭为同义。可见撮之内涵一为与手有关，故形符为手，二为仅用三指说明所花之力小，所取之量少。《庄子》之文是以鸱鸟作比，言物性之不同，谓鸱鸟白天即使怒目也不能见丘山之形，夜晚则视觉能辨毫末，连跳蚤也能轻易抓到，撮义包括抓和不费力，和撮之本义吻合。可见解撮蚤之撮，无需用声训，《释文》所言“崔本作最”，可视为通假，即崔本假最为撮，不一定要扯到声符受义。

王力《同源字典》分别收“撮、聚”和“最、撮”为同源字，按，撮、聚古为同音，义之大类亦相同，向多通用，固属同源，但是“最、撮”一组，似有可商，愚以为所谓同源非止音同(或音近)、义同外加书证，尚涉及字形的历史演变和字义的分化转移，《同源字典》第496页所列最、撮材料除定二字之字音关系为“精清旁纽、叠韵”外，余皆失之粗疏，主要是最、撮二义混淆，最撮相对应之口径也不合，无从证明最、撮二字为同源。如所引书证最字首条列《说文》：“最，犯而取也”，此为“最”之本义，下引之书证四则(公羊、庄子、管子、贾谊鹏鸟赋)皆属义为聚也之撮字之义，本书既收有撮、聚同源，此处又将聚义之撮混入最字之中，最、撮二义混淆不清。第497页所列撮字例，除引《说文》撮外，尚有书证二：一为《家语》之“撮徒成党”，撮义为




聚没有问题,但此属撮之声符所受之聚义,而此声符最乃最字。二为引《庄子》之“撮蚤”,解撮蚤之撮为聚,并不准确。可见谈最、撮同源需顾及最、撮之分合情况,犯取之最与“撮”义基本无关,所谓最、撮同源也仅限于“撮”义为“聚”、“总计”、“总括”、“概括”等有限义项,属这类义项之“撮”乃由撮之声符“最”受义,此声符最非犯取之最,实为最、最混同后包含于最中的原义为“积也”之最。至于引《释文》:“撮,崔本作最”和王念孙:“撮之言最也,谓聚持之也”而将撮蚤之撮解为“聚也”属误解,对“撮之言最也”、“崔本作最”,只能理解为最、撮相通,看作通假,不能视为同源。所以要谈最、撮同源,必须顾及条件和范围限制,不能笼统言之。

综上所述,可见我们今天于文献史籍所见之“最”,除个别例外,其义皆包括原最、最二字之义。合一后原最字之义并未因“最行而最废”而湮没,除并于“最”中之外,尚以转移方式转移到原与最字音义关系较为密切的“聚”、“撮”之中,从而得到充分的应用和发展。最、最二义之分合和转移虽较复杂,但若认准其本义,理清其引申脉络,及其在形、音、义方面的相互关系,并以文献资料相印证,则亦不难分辩。因最、最原属音、义俱别之二字,故各有其本义和引申系联,彼此互不相涉。大致是:

最 一积也(聚积) 一总计,总算、总括一概括、概要、大要、摘要一都凡。

最 一犯取一军功之最一殿最之称一优劣(“最”为优,“殿”属劣)一表程度之副词“最”。

文献中所见“最”字究属最、最二字何字之义,大致可据上表对照领会而得。如二者均不合,则要考虑与他字之通用关系。本文所论及的与最、最二字有关之通用,大致有四种情况:一为同源关系,主要指最、聚同

源。最、聚二字从其本义看各有特指:“最”,具指财、物之聚积;聚则指邑落人众之聚集。二者之直接引申亦即抽象义则同为聚或积,二字形符虽不同,造字取向则一致,此为就形义析释而言,声则同为从取得声,形声义三者均关系密切,又向属通用,故最、聚属同源。二为声符受义,主要指最与撮相通。义之转移至撮中,主要是通过撮之声符受义,而此声符最乃合并前之最字。此类主要特点是,具有总计、概括、聚合等义之撮,与撮字之本义及引申义均无关联,只有通过声符受义才能得知最、撮二字之相通。三为通假,所谓通假仅指二字音同或音近而通用,与义无涉。本文所论及的《释文》所谓的“撮,崔本作最”以及许慎《淮南·主术》“撮蚤”之注,“最、撮”属与义无涉之通假,不可与同源或声符受义相混淆。犯取之“最”与“撮”,绝无义之牵扯,两者通用,只能是通假。四为二字因形近混同而合为一字,或因形体讹变而误为二字相通用,前者如最、最,后者如凡、舟。前者上已详论,不赘。后者则以本文前引《说文》:“凡、最括也”简析之。按,凡字为古代“盘”之象形字,甲骨文作,金文或作或作,与小篆舟船之舟形似相混而误用为舟字,于是古舟、(盘)二字相通用。这种相通既非音相近,亦非义相关,与音、义俱别之最、最一样,皆属形近混同而相通。上述四种为本文涉及的相通类别,虽同为相通但性质各不相同,不容混淆。本文所提到的错析、错释之例,多因未能过细审察和分辨最、最之分和合及其与聚、撮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上述四种相通关系所造成。

作者姚炳祺,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510303)

责任编辑:陶原珂